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

IPP Quarterly

郑永年 主编

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化危为机：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第十二届IPP国际会议精华回顾

2025/03



2025年9月3日，北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空中护旗梯队通过天安门广场，26架直-19武装直升机组成“80”字样。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

IPP Quarterly

2025 年第 3 期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编委会名单

主 编：郑永年

编 委：陈佳慧 戴明洁 郭 海 蒋余浩 李明令 李 婷

李海滨 林辉煌 刘 佳 卢克玲 徐伟钧 杨庭轩

杨丽君 余 荔 赵 巍 张心旂 庄文越 朱雁翎

(按姓氏音序排列)

编 辑：刘 深 李彩霞 周浩锴 刘昕冉

主管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主办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2025 年 9 月

目 录

【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	郑永年 - 1 -
中国为何必须超越西方以构建更先进的人工智能？	郑永年 - 10 -
边疆、地缘政治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郑永年 - 18 -
驱动国家“软力量”建设的思想引擎	郑永年 - 29 -
数智时代的知识变革与知识创新	郑永年 - 34 -
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及如何构建	郑永年 - 39 -

【化危为机：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香港再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内生发展动力的重构	赵巍、杨庭轩 - 46 -
当城市从“建设时代”迈入“运营时代”	林辉煌、李婷 - 63 -
高技能人才，从何而来	张若梅、蒋余浩 - 68 -
就业优先，还是社保优先？	李婷 - 77 -
如何更好地服务“新就业群体”？	李明令 - 84 -
《哪吒2》火爆，中国文化产品如何更好出海？	朱雁翎 陈佳慧 - 91 -
如何破解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内卷？	庄文越 - 97 -
消费降级，线下社区商业如何发展？	杨庭轩 - 102 -

【第十二届 IPP 国际会议精华回顾】

重塑现代化：中国与全球南方——2025 年 IPP 国际会议观点综述	- 109 -
杰弗里·萨克斯：重塑全球社会的五大变化	- 118 -
IPP 动态（2025 年 6—9 月）	- 125 -
研究院简介	- 129 -

【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

——《人民日报》对话郑永年

导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蕴含着理论创新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国际关系研究既属于理论研究范畴，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也关涉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建构与两个大局相匹配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为理解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提供中国自己的理论框架？立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如何把实践命题深化为理论课题，进而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围绕上述这些问题，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接受了《人民日报》旗下学术期刊《人民论坛》杂志的采访。

《人民论坛》杂志社：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就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有哪些现实背景？

郑永年：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来，这一命题已经成为理论界、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和研究重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是几代中国学人的夙愿。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前无古人，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舞台上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又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

从历史与现实看，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拥有悠久和丰厚的实践经验。中国拥有数千年不中断的文明史及丰富的外交实践，有近代以来被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痛经历，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各个领域的成功经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不仅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而且可以形成真正能够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理论工具，用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为国际学术界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

《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实际建构过程中，学者面临着哪些挑战？

郑永年：首先是在思维方式上，仍有学者有意无意地生搬硬套西方思维方式或者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实践，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实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已经培养了规模可观的国际关系研究队伍，也产出了越来越成熟的理论成果。

曾经，西方几种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一度在国内学术界盛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学者自主意识增强，这种现象有了很大改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新时代以来，我国广大学者意识到，不能照搬西方理论来阐释和总结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而要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出发进行自主创新。正如西方学者往往从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来寻找思想源泉一样，国内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来寻找灵感。从那时到近代，中国拥有丰富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经验。

总结中国的经验很重要，但过程并不容易，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在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时，需要避免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中国经验。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经验，被有些人拿来当作验证西方概念和理论的案例，看似有学术创新，实际上是

“西方概念、中国材料”“西方命题、中国案例”。这样的研究表面上中国是主体，但无法形成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原创性概念和理论。

其二，国际关系是现实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差异很大。中国古代的知识经验可以借鉴，但很难帮助我们建立能够完全解释现代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西方学者借鉴古希腊城邦国家相互交往与战争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为了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借用的是霸权、权力、联盟等对其有用的一些概念。

《人民论坛》杂志社：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永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之上，能够解释西方经验，但无法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很显然，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并不相同。

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或几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存在一个或几个可以拿来就套用的国际关系理论。即使西方国家之间，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尽管其在文化方面有类似之处。再进一步说，即使是欧洲国家之间，各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既建立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经验上，也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至少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在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等领域，中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经验，需要全面总结和提炼凝练为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可以为世界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念认识不清，甚至故意歪曲误导，这就更需要我们向世界提供认识中国的正确方法。如果我们不能向世界提供能够解释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概念和理论，世界就难以准确理解中国。

《人民论坛》杂志社：从西方国际关系概念和理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看，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郑永年：地缘政治是一个关键因素。地缘政治既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塑造这个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念。近代国际关系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欧洲。欧洲的地缘政治，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国际关系理论。

欧洲的国际关系建立在主权国家之间，主权概念既决定近代主权国家的内部构造，也决定国家之间的关系。

强调法律地位的主权平等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什么讲平等？主要是近代欧洲没有产生一个超级大国，主要国家间力量相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主宰另外一个国家。正因为事实上的比较平等，欧洲国家在处理关系时才会强调平等，而这种平等又通过国际法体现出来。

欧洲国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间的联盟政治和权力平衡。确立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并不是说它们不会面临国际关系现实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即出现追求私利的主权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所以，国家间的结盟成为重要策略，通过结盟来防止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同盟的威胁。两个旗鼓相当的国家集团，才能构成相互制约。

欧洲国际关系的第三个特点，是海洋扩张战略，这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很多欧洲国家是沿海国家，熟悉海洋，但内部资源又非常有限，这促成了这些国家走海洋发展战略。

《人民论坛》杂志社：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是怎样发展的？是否也与地缘政治相关？

郑永年：从概念上说，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受欧洲影响。但实际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欧洲差别很大。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由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学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和维持霸权的能力，也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

在多数情况下，美国与欧洲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缺少直接的、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个因素很重要，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能够成为西方国家的领头者。很难想象，如果美国位于欧洲，欧洲国家还会接受美国的领导。欧洲各国之间力量旗鼓相当，很难有一个国家建立绝对的霸权。在所有大国中，美国地缘政治环境相对简单，有两个主要陆地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成功地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并且能巩固其地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人民论坛》杂志社：除地缘政治因素外，美国维持霸权还有什么重要手段？

郑永年：第一个是市场经济手段。市场不仅整合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更减少了维持盟友关系的成本。用经济手段来维持同盟，要比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显得“软”性，更容易为其他国家所接受。

第二个手段是向其他国家“征税”。相对简单的地缘政治环境，本来就使得美国有能力拓展其国际影响力，具有影响国际经济贸易体制的能力、美元是国际货币、自身是消费大国等因素，使得美国具备向其盟友甚至他国“征税”的能力，能够迫使其他国家承担和分摊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成本。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反映的是上述事实，是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行为方式的论证。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这些理论内部的各种变种，如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等，都是对美国国际关系实践的直接反映和辩护，并不是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

实际上，近代以来，不少国家都以自己为中心构建区域秩序或者国际秩序。客观地说，从国家实际条件出发构建区域秩序或者国际秩序，也是比较现实的策略选择。但这里需要指出两个容易出现的认知错误：一是认为自己国家是文明的，而其他国家都是野蛮的；二是在制定和推行外交政策时，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表现为本国优先，尤其是极端自私的外交行为。如果这两种认知错误大肆推行、转化为实践，是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

《人民论坛》杂志社：从历史上看，地缘政治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永年：在传统社会中，中国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处理国际关系的政策和经验。从当时的政策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的对外交往行为也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从边疆到周边再到世界，这是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次序。中国传统地缘政治最主要的关注点是边疆问题。围绕边疆问题，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调以维护自身和平为目的的防守。这个特点较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修筑长城以防御外敌的进攻。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具有扩张性的外交战略。

二是强调陆地国家内部统一。尽管中国有很长的海岸线，也很早发展出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并没有转化为发展海外关系的动力。郑和下西洋能够说明这一点。古代中国没有成为一个依靠海洋发展的国家，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当时的政策选择。实际上，中国并不是被陆地“锁住”的国家，而在政策上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受地缘政治影响。中国周边有那么多

国家，正是因为被众多国家所包围，为了处理边疆问题，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重点。处理边疆问题始终是中国传统外交的主要方向。

三是具有开放色彩的朝贡制度。近些年，学界对朝贡制度的研究比较多。有学者认为朝贡体系表明古代中国只想要其他国家表面上的服从，没有向外发展自身的实力。这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下的一种误解或曲解。实际上，古代中国强调的是“贡赋”概念，而非“朝贡”。

“朝贡”是西方学者强加给中国的说法。如果用现代的概念看，“贡赋”体系更像现在的“单边开放”。外国使者向中国朝廷献上礼品之后，可以从中国皇帝那里获得价值更大的礼物，并且往往获得在中国经商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朝贡制度的形成也与地缘政治有关，是古代中国为了稳定周边环境的制度设计。

不管人们对中国传统外交如何评价，这种外交维持了数千年。古代中国的边疆治理以及周边和区域外交，是相当成功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其他各种形式的帝国都发生复杂的演变甚至解体，而中国一直大体上保留了传统疆域。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很多人强调文化因素。文化固然重要，但文化因素又是怎样起作用的？中国能够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造就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文化，这一事实本身就与地缘政治相关。在世界历史上，很多帝国只顾向外扩张，而忽视了内部的文化建设，因此缺少内聚力。

《人民论坛》杂志社：如何把握当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崭新定位？

郑永年：随着当代地缘政治条件改变，国际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一系列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大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全球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创造性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定位。

在实践层面，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已全面完成自贸区 3.0 版升级谈判；上海合作组织自 2001 年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长为 26 国参与、在 50 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经济总量接近 30 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全球融资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等等。

这些实践表明，中国所倡导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文明交流互鉴等主张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人民论坛》杂志社：新时代中国外交有哪些鲜明特色？

郑永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表现出以下特色。

一是大国外交。习近平主席指出：“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中国致力于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期待大国和睦相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大国外交很重要，因为它影响国际秩序的构架。中国要履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责任，就必须参与大国外交并且成为重要一员。今天，中国同包括俄罗斯、美国、法国、印度等在内的所有大国都频繁交往互动，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二是发展外交。习近平主席指出：“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中国外交表现出发展外交的鲜明特色。发展外交主要是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近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原料产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造成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自身。更为严峻的是，个别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之后，就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抽掉，阻碍发展中国家获得平等发展权利。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发展新机遇，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如果一些国家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不发展，那么世界经济是不平衡的，国际社会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中国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主张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注重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谋求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促进共建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三是开放外交。开放已成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鲜明特点。开放外交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真正的多边主义。某些国家宣扬的多边主义本质是排他性的、专门针对第三国的“团团伙伙”，中国践行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开放包容的，不针对其他任何国家，而是致力于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型开放。规则 and 标准，都是国际秩序运行的制度条件。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在规则对接和制度型开放方面迈出坚实步伐。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第三个层面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不断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推动世界发展。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层面，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途径。

《人民论坛》杂志社：立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沃土，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这个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怎样开展？

郑永年：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从传统到当代的创造性转型。

第一，需要重新认识和阐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智慧。比如贡赋体系，这一体系能够存在和发展数千年并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理念看，这是一种道德现实主义，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实践表达，既承认大国的责任，又兼顾大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能够长期维持辽阔的疆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贡赋体系是一种具有高度伸缩性的区域和国际秩序体系。

第二，正确认识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圈层结构。前面所述中国古代从边疆（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到周边再到世界的次序结构，在当代获得了创造性转型。如果圈层结构强调的是国家安全，那么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和国际观反映的则是更大范围的国际交往，并且无论在周边还是国际，中国坚持的国际关系原则都是一样的。

第三，不干预主义。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以来，中国从不主动干预其他国家事务。个别西方国家干涉他国事务的结果是，被干预国家无法形成自主的秩序，而当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变化时，这些国家就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干预主义，是西方一元主义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中国践行的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寻求和各国打交道，但从来不会主动干预当地秩序。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相处数千年，从来没有把哪个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近代以来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使中国的不干预主义不仅延续，并得以强化。

第四，接触与自治。中国从来不是西方所说的那种孤立封闭的国家。相反，中国对探索世界深感兴趣，否则就不会有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会有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倡导达则兼济天下，和世界接触，传统的主题是“和气生财”，当代的主题是共同发展。中国强调自己的自主和自治性，也尊重他国的自主和自治性。尽管主权这一概念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对外交往的诸多传统实践已经体现了主权的内涵和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获得发展，也保持独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中国的追求，也是中国对其他国家奉行的原则。

第五，对外开放与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在所有存在过和现存的几大文明中，中华文明彰显着鲜明的开放性。开放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中国人深知，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自己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开放状态下，中国才可以兼济天下，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自己好了，其他人也好；其他人好了，自己可以更好。这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展现出来的风貌，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原文刊登于《人民日报》（2025年09月22日第09版），原题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访谈录）——对话郑永年》

【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为何必须超越西方以构建更先进的人工智能？

——《南华早报》记者对话郑永年

导语：

进入AI时代，数据与算法正加速影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若不能以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体系阐释历史经验与现实治理，就可能被他国设定叙事，甚至在价值判断上被牵着走。问题是：应以何种思维、什么框架来认识并描述自身实践，将数千年来的发展、变革讲得既客观又可信？这不仅是学界的一场自我校准，也关乎大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主动权和持久竞争力。

在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指出，AI并未改变知识生产和传播“输入—提炼”的逻辑，因而拥有大量“输入”的西方理论会在不知不觉间被复制、被依赖。为了避免自身话语主动权被“知识殖民”的潜流所削弱，郑永年教授认为，我们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识的供给方式。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积累了无与伦比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历史记载，我们需将这些经验和记载转化为现代社会科学，建立强大的“中国输入”。中国既要善于学习西方的方法，也必须超越西方的框架，以开放的姿态构建自身的社会科学体系，让中国经验不仅为世界所理解，更能为世界提供新的智慧与方案。

此外，在访谈中，郑永年教授还就中美关系、南海局势、乌克兰战争等议题分享了观察与思考。

问：多年来，您一直呼吁重建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最近，您也表达了对人工智能时代“知识殖民主义”（intellectual colonialism）的担忧。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郑永年：这些担忧主要是指源自西方的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挑战。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中所言，宗教、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而社会和技术意义则取决于人文和社会科学。

中国研究者学习和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是基于西方的方法，总结西方的实践和经验，然后用它们来解释西方社会。这些理论无法解释儒家文明、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社会。我们应该充分拥抱我们的世俗文明，从而在国际秩序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速度加快，但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逻辑始终没有改变：信息的输入和信息的提炼。中国的 DeepSeek 是成功的，但它产生知识的方式与 OpenAI 的 ChatGPT 等模型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生产不再是发散过程，而是趋同过程，这加大了我们依赖西方知识体系的风险。

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和战略界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时需要格外谨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理念和知识体系，如此浩大的工程，该从何入手？如何学习西方，同时又不至于完全依赖西方的框架？

郑永年：许多人在使用 ChatGPT 之类的工具时，却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这非常危险。问题在于模型的“喂食”（feeding）。在自然科学领域，自近代以来，所有最优秀的论文都是以外语发表的，尤其是英语。即使是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最好的论文也是用英文发表的，因为中国学者认可的顶级期刊主要来自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现在，如果你想使用 ChatGPT、DeepSeek 或类似的工具来构建知识体系，很难避免被殖民化的过程（process of colonisation）。我们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识的供给方式。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积累了无与伦比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历史记载。但要将这些经验和记载转化为现代社会科学，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何况还有 40 年的改革开放。这些跨越几代人的努力应该用来准备这份“食物”。否则，它仍然是单向的，只有西方的输入，没有来自中国的输入。如果我们建立同样强大的中国输入，情况会更加平衡。我并非排斥西方。问题在于社会科学缺乏真正的中国“故事”。即使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其理论框架仍然是西方的。中国仅仅提供证据——而且佐证往往是不正确的，因为命题本身就存在缺陷。

更危险的是许多中国学者的短视。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声称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知识体系”。但他们只是自说自话。一些经济学书籍只是简单地将书名中的“西方”替换成“中国”，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我们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项工作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办成的。

问：您提到构建独立的中国知识体系要从实践出发，您认为中国自身的哪些实践值得特别关注？

郑永年：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例子，它根植于实践。当时，欧洲革命理论强调城市斗争。一些失败的经验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正统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创新。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开启了农村革命。

邓小平也有创新，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猫论”等。我们今天有很多创新实践，但并没有发展成为概念理论，而是经常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实践，但这并不奏效。这两者是根本不同的东西。

社会上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做法，比如深圳发展背后自下而上（bottom-up）的故事。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运作良好的政府和高效的市场。我认为这两种理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已经存在。

在我看来，现在缺少的是第三个要素：“活跃的社会”。“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一个西方概念，隐含着对国家的反对，但中国社会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从国家到社会，没有明确的界限——它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我们的市场和国家也没有严格区分。我们没有西方那种绝对私有制或绝对公有制的概念。中国古人在两千年前就尝试了井田制，这说明古人追求的是公私结合，这是用西方的框架无法理解的。

问：您还提到打破西方的学术垄断至关重要。在当今中美紧张的环境下，一些人可能将此视为中国争夺全球领导地位和话语权的举动。您对此有何看法？

郑永年：这就是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问题，但意识形态不是学者能够掌控的，我们对此只能感到无能为力。我一直主张，我们不排斥西方，也需要学习西方的方法论，这很重要；但这些工具所衍生的概念和理论往往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因此，中国应该借鉴他们的方法，抛开他们的理论建构，重新审视自身的实践，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正如每个西方国

家都有自己鲜明的社会科学特点一样。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建立一门中国社会科学，这将对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但这并不是一种对抗行为。

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歪曲事实，但我认为，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人是少数。主流社会看到了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现实，却无法用西方的框架来解释。他们在等待答案。如果我们不给出答案，谁来给出呢？这并不是要我们封闭起来，反对一切西方食物。自说自话是行不通的——没有人会理解或接受。构建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沟通。我们接受西方理论，并非因为强加于人，而是因为其逻辑令人信服。中国应该创造一些同样有效的理论。

问：您期待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知识体系的重建在“十五五”规划中如何体现？

郑永年：我认为建立中国知识体系的努力将会加速，因为紧迫性已经存在。我们常说西方不理解我们、误解我们，甚至妖魔化我们。现在，我们有责任向西方解读我们自己。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我们必须掌握这种解读的主动权。我们也应该更加开放。西方的知识体系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我们也必须这样做。真正的知识体系必须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与此同时，我们常常假装了解西方，但实际上只掌握了表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培养一大批精通各种文明的人才。我认为现在的形势比民国时期更严峻。

费孝通为什么能写出《江村经济》？他用西方的方法论对中国现象进行了精彩的解读，这可以说是中国独立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现在中西学是分开的，民国时期是融合的。当前的学术培训主要侧重于可量化和可衡量的东西——这是 ChatGPT 可以做到的，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真正有价值的方面是那些无法衡量的东西。当然，中国也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丰富的实践经验。

问：在您的新书《AI 时代的中国知识重建》中，您提出社会科学研究应避免过度关注“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如何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您呼吁知识界“去巫术化”（de-witching）——这个您用来形容猎巫心态（witch-hunting mindset）的术语？

郑永年：如今，许多人文学者更像是世俗的牧师，为了追求名气，不断炮制“心灵鸡汤”之类的内容，这种做法在中国盛行一时。这对社会并没有什么益处，实在不好。如果西方用意识形态的眼光妖魔化中国，中国学者也用意识形态来妖魔化西方，那不是知识体系的构建，而是针锋相对的谩骂。这毫无价值，是伪学术，或许引人注目，却不会留下任何持久的痕迹。我们需要有自我认知，必须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问：中国智库如何发展才能有效回应国际舆论，提升影响力？您之前对美国兰德公司给予了积极评价，中国的智库机构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郑永年：美国是西方智库最发达的国家，从服务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兰德公司做得最好。中国的智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辩护”型，即政府要求其审查的事项，他们只会赞同；另一类是纯粹的批评型，即认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这两种类型各有用武之地。每个政府都需要有人来评估政策是否科学合理。但如果一个机构永远无法断言某项政策不合理，那么它就不能算作真正的智库。反之，如果它只是简单地宣称政府的每项行动都无效，那它也不能算作智库。真正的智库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所有领导人也都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例如，如果一家香港智库只服务于特首本人，那就可能有问题。如果它服务于香港的利益，那就很好。

问：这不禁让人想到软实力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既独立自主又能普遍适用的知识体系？

郑永年：我认为建设软实力需要满足四个条件：首先，写出的东西必须有人读，这是前提；其次，内容必须能被人理解；第三，理解之后要能让人接受并产生共鸣；第四，这种共鸣应能驱动人们主动将其传播开来。

目前，我们在上述四个阶段都遇到了问题。而西方在其中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功。我们的老师一直在传播西方知识，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写出能进入西方课堂的书籍呢？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在理工科领域或许可以，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呢？以中国 40 年成功让 8 亿人脱贫的经验为例，这在西方也被誉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我们该如何讲述扶贫故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使用学术语言。如果我们只强调意识形态的正确性，那肯定不能展现全貌。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语言讲述故事，也会阻碍别人向我们学习。

问：除了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之外，您是否认为人工智能会进一步加深国家间的差距和紧张关系？这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吗？

郑永年：当然。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需要一个基础，就像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基础，国内和国际秩序都将有所不同。我有点悲观。前三次工业革命将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人工智能正在将人类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许多人可能变得不用思考。这导致了我所说的“人工智障”（artificial ignorance）——一种

自我造成的智力伤害。中美在人工智能发展上呈现趋同（convergence）趋势，特别是在开源条件下，未来内容会越来越趋同。

在人工智能方面，鉴于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采取的是发展导向的模式，目前联邦层面没有监管框架。与此同时，欧盟监管过度，扼杀了创新——这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故事。一些欧洲领导人呼吁放松管制以促进本土人工智能公司的发展，但这将导致一个两难境地，因为在欧盟致力于规则一致性的情况下，同时加强对美国公司的监管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目前的监管水平介于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一些过度监管的情况。武汉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Manus 近期迁至新加坡就反映了这一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改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放松商业管制——这是科技右翼倡导的技术加速主义。如果美国放松管制，而欧盟、中国和印度不放松管制，那么由于国内管制过度而无法在当地应用的新兴技术很可能就会流向美国——这种现象已经发生多年了。中国应该确保对环境保护和劳工权利进行适当的监管，但在技术应用方面，我认为应该放宽监管。否则，人们热议的“新质生产力”就无法真正落地，转化为实体经济活动，中国经济就会陷入高度“内卷化”的境地。如果新的经济活动更加丰富，内卷化现象就会减轻。

问：普京与特朗普阿拉斯加峰会后，乌克兰战争将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中国？此外，鉴于印度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美中印三角关系的平衡是否可能出现倾斜？

郑永年：乌克兰战争的解决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双方均未展现出妥协的迹象。欧洲不会接受“土地换和平”计划，并可能将其视为一场噩梦。中国确实是个局外人，被战争挟持，却在需要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时被彻底拒之门外。

中国的实力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可衡量的硬实力，如 GDP 和国防进步，这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至关重要；其二，则是认知层面，这又让我们回到本土独立知识体系的问题——它关乎我们如何认识自己，以及他人如何认识我们。这不仅关乎战略思考，更是一个哲学问题。无论是美中俄三国关系，还是美中印关系，从来就不存在固定的三角关系，美国虽然出现衰落迹象，但依然是全球霸主。印度正在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尽管近期与特朗普的关系紧张，但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有所拉近。然而，印度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真正盟友。印度也在追求地区霸权，尤其试图建立自己的“全球南方集团”来排挤中国。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理解或掌握西方的国际关系语言——或者西方叙事中的多边主义和联盟（multilateralism and alliances）。例如，在中国，我们所说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或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 与美国所说的联盟有所不同。周边外交也至关重要。中国在世界崛起离不开其在亚洲的崛起。正如毛泽东所说, 辨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至关重要。把所有国家都当朋友往往意味着没有真正的朋友。

问: 北京和马尼拉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菲律宾也加强了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合作。您曾表示, 北京需要在南海保持战略耐心。最近在黄岩岛附近与菲律宾对峙期间, 中国船只发生碰撞, 这是否意味着是时候采取不同的策略了?

郑永年: 美国的利益根植于全球, 包括欧洲、中东和亚洲。但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 美国无法被驱逐, 也无法成功或彻底地从这些地区撤离。解决南海争端的前提是承认美国在南海的存在, 同时也要意识到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将美国的影响从西太平洋驱逐出去。美国撤军往往会导致混乱, 就像我们在中东和乌克兰所见的那样。受影响的国家最终往往会要求美国重返。我们或许需要打破固有思维, 打破正统思维 (orthodox thinking)。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倡导者, 尽管我们所倡导的路径与那种过分依赖或强调外部力量的传统倾向有所不同。我们需要去拉丁美洲吗? 我们需要欧洲市场吗? 当然——我们彼此交织。我们对事实的认知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在我看来, 南海争端本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认知, 就很难建立互信。如果双方都把将美国撤出西太平洋视为最终目标, 那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正如我们过去允许美国军舰停靠香港一样, 我们可以考虑将南海岛屿上的某些基础设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向美国船只开放。这可能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供更多机会。

问: 南海争端因台湾问题而愈发复杂, 该如何管控局势, 避免误判, 化解风险?

郑永年: 我们仍然需要战略耐心。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西方很多人将其解读为等待报复, 但这并非其真意。它指的是在保持耐心的同时, 寻求理性、更好的解决方案。正如李强总理曾经说过的, 解决办法总比问题多。我们需要实事求是, 以史为鉴——在两德统一前, 西德 (联邦德国) 为东德 (民主德国) 公民提供了身份转换途径, 实施了货币平价兑换, 并通过向本国公民征收 5.5% 的“团结税”来承担相关成本。我们不会将军事行动作为最后手段, 同时防止任何“台独”企图。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 我们仍有很大的空间迈向统一, 并吸引台湾民众。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统一的政治意愿, 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 却很少思考如何以具体的行动去实现统一。现在是时候思考了。

问: 中国针对 STEM 专业人士推出的新 K 签证是否能有效吸引外国人才来华?

郑永年：签证政策至关重要。K 签证只是第一步。从政策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中国首个专门为人才设计的签证。看看美国——它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设有不同的签证类别。但一旦有人获得 K 签证，仍然需要考虑其他问题，比如如何安排其家人。吸引人才不仅仅是签证或金钱的问题，而是关乎生态系统，而中国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方向是对的，中国在教育 and 人才吸引方面一定会更加开放。“十五五”期间，中国可能会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包括有关外国大学在中国办学的举措。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社会群体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差异。循序渐进固然有其优势，但方向必须把握，应该继续稳步向前。

问：中国电视剧、游戏和玩具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这是否意味着放宽管制也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

郑永年：是的。中国故事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文字形式，也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放宽管制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将西方视为同质化的社会。西方社会由多元化的社会群体组成，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人，用不同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活跃的社会，如果单靠一个政府委托的机构去讲中国故事，肯定不行。

***英文原文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发布在《南华早报》“plus”板块。原标题为“Open Questions | Zheng Yongnian on why China must look beyond the West to build a better AI”。**

【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边疆、地缘政治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导语：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大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然而，学术界目前存在思想、思维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殖民”的状况，即便意识到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力求实现“自主创新”，也依旧容易陷入“西方概念、中国材料”的思维中。

他认为，无论是欧美国家抑或是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概念和理论都必然源自地缘政治。而根据中国自身地缘政治因素，外交政策和策略的重点应根据边疆、周边、区域和国际化这一等级秩序来决定。一旦这些领域发生重大危机，或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出现重大危机，就会导致中国国际秩序的解体。对中国而言，应摒弃“美国化”和“重大国、轻小国”的外交思维，重新考虑中国周边的特殊环境，把战略重点放在边疆、周边和亚洲。

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问题

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大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具有丰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但这些实践迄今还没有提升成为概念和理论。对决策者来说，需要理论来指导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下，决策者经常失去方向，不知道如何理解国际事务中所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如何解决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为外在世界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中国总是在抱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认为他们的理解在很多场合是误解甚至曲解，但问题是中国本身没有提供给外在世界认识中国的方法。

方法论很重要。例如，我们在认识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就往往采用美国提供给我们各种方法。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是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这些概念和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所以，每当美国新一届政府产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研究其会采用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或者两者的结合。中国不能为外在世界提供能够解释自身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概念和理论，外界就很难理解中国。

不过，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概念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很多人也一直想建构概念和理论。不过，正是在这方面，现状很令人担忧。现在主要存在两种情况。

首先是思想、思维“被殖民”的状况。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完全统治着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甚至思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国际关系研究队伍。不过，国际关系研究大都是简单复制西方的理论。西方盛行的几种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也在中国盛行。西方流行什么，中国就流行什么。

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大多数学者只管应用西方理论，而完全忽视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他们忘记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经验之上的，它们能够解释西方经验，但不能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经验。很显然，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欧洲和美国也有不同的地方，尽管他们在文化方面是类似的。与此相应，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西方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因此就想在知识领域进行“自主创新”。正如西方学者往往从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

来寻找思想源泉一样，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尤其是战国时代来寻找思想源泉。从春秋时代到近代，中国拥有丰富的处理国家间关系（如果不是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中国的经验很重要。然而，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至少有两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当人们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往往还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的思维来解释中国经验。有人称之为“西方概念、中国材料”。中国往往成为验证或者否定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一个案例。这种类型的研究很多。这样的研究表面上看，中国是主体，但实际上形成不了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概念和理论。其二，国际关系是最现实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古代的知识可以有借鉴作用，但很难帮助我们建立能够解释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近现代西方学者借鉴古希腊等经验，主要不是经验材料，而是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强调的是权力、思想等具有超时空价值的一些概念。

二、地缘政治决定国际关系

从西方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地缘政治既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

在近现代国家产生之前，主导国际关系的是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两种政权形式。帝国间的国际关系很简单，主要核心是土地和人口。地方化了的政府更为简单，对所辖地区（往往很小）提供一种政权形式，往往是象征性的政权形式。对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形式，理论界并没有形成概念和理论。在西方，对帝国的研究比较多，但算不上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产物。

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于欧洲。欧洲的地缘政治决定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和从前的所有国际关系不同，近代国际关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主权概念在欧洲的崛起。主权概念既决定了近代主权国家的内部构造，也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家间漫长历史时期的战争，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内部构造几乎相同。从外部来说，欧洲国际关系主张主权国家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强调法律地位的平等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什么讲平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缘政治。欧洲国家没有一个超然的大国，主要国家间力量相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主宰另外一个国家。正是因为事实上的比较平等，欧洲国家才会强调平等，而平等必须体现在法律上。

欧洲国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间的联盟政治和权力平衡原则。国家间的平等原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国际关系上说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即因为不存在主

权国家之上的权威，追求私利的主权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所以，国家间的结盟成为重要策略，来防止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同盟的威胁。只有两个旗鼓相当的力量集团才能构成互相的制约。欧洲国家间关系的第三个特点即海洋扩张战略，更和地缘政治相关。为海洋所包围，熟悉海洋，内部资源又非常有限，这些促成了很多欧洲国家走海洋发展战略，这个战略非常成功。这尤其表现在英国。作为岛屿国家，英国成为大英帝国（海洋帝国）似乎是必然的。

大英帝国衰落之后，美国就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体系的领袖。人们一般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欧洲和美国归为一类。但实际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欧洲的相差很大。欧洲国家之间强调权力平衡，对外则实行海洋战略或者殖民主义。从概念上说，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受欧洲影响。实际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由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学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在冷战时期，美国也强调权力平衡，主要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之间的平衡。这似乎类似于欧洲的权力平衡，只不过是美苏之间的平衡范围更大。但是决定美苏这两个霸权命运的是地缘政治，而非其他因素。

苏联集团为什么会瓦解？这里当然有很多因素，例如经济制度、政治体系、意识形态等等。不过，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地缘政治。苏联尽管征服了其周边很多国家，把它们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体系，但维持这个体系的代价和成本极高，远远超出了苏联的经济体所能提供的物质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用其他强权方式（军事、意识形态等）来维持其统治范围。这种统治方式不断激发出集团内部被统治国家的反抗。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

同时，苏联的扩张野心不仅仅限于欧洲。如果仅仅限于欧洲，苏联集团可能还可以多生存一些时间。问题在于，苏联也拼命和美国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竞争空间，结果造成了对经济资源的更大和更快的消耗。苏联集团最后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没有美国的推动也会到来，美国的推动只是加速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美国成为霸权和维持霸权的能力也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美国和欧洲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关系，和任何欧洲国家都不构成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个因素很重要，它决定了为什么欧洲能够集体地接受美国的领导权。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处于欧洲，欧洲国家会接受美国的领导。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表明，欧洲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战略失败了。权力平衡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很难制度化。同时，欧洲各国之间力量的旗鼓相当也表明很难有一个国家建立绝对的霸权。

这表明，欧洲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做领袖。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不用说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光地缘政治这一单一因素就决定了俄罗斯完全不可能成为欧洲领袖。美国很自然成为欧洲的领袖。美国和欧洲属于同一文化传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大英帝国衰落之后，把权力移交给美国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些都是有利于美国的领导者角色的。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也决定了美国维持对欧洲的领导和世界霸权的能力，即可持续性。在所有大国中，美国的地缘政治是最简单的，只有两个邻国，即加拿大和墨西哥，并且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无法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美国也成功地建立了以其为中心并且意在巩固其地位的北美经济区域，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高度依赖于美国。同时，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开放性，有效地减少了这两个邻居的被威胁感。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这一做法也延伸到整个南美地区。简单的地缘政治一方面使得美国维持其在北美的领导地位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使得其有能力来充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也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周边被众多的国家所包围，它就无法成为世界霸权。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美国霸权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美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使得美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市场经济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其次，它帮助美国构建了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苏联集团搞的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因此其集团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经济区域，集团仅仅依靠政治和军事手段来维持，因此成本非常高。而美国依靠的是市场制度。在冷战期间，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实行“战略性贸易”，这是一种基于市场之上的战略同盟。市场不仅整合了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更是减少了维持和盟友关系的成本。当然，用经济手段来维持同盟要比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显得“软”性，更容易为其他小国所接受。不管怎样，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一直是美国用来巩固其和盟友关系、打压其敌人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武器。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作为“税收”国家这一事实。美国简单的地缘政治本来就使得其有能力伸展其国际影响力。再进一步，美国也是国际“税收”国家，即通过向其盟友甚至他国“征税”，让其他国家承担和分摊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成本。主导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美元是国际货币、消费大国等因素，使得美国具备了这种“征税”能力。

很容易理解，现代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反映的是上述这些事实，是对美国的国际现实地位和行为方式的论证（justification）。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这些理论

内部的各种变种如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都是美国国际关系现实的直接反映，并不是如人们所说的国际关系的普遍一般规律。

三、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

上面讨论了这么多，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也必须、必然源自中国的地缘政治。

传统上，中国没有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处理“国际关系”的政策和经验。从中国的实际政策来看，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原理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地缘政治分陆地地缘政治和海洋地缘政治。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还可以加上太空地缘政治。

中国地缘政治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也因此是中国“国际关系”的主体和主题。概括地说，围绕边疆问题，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消极防守。消极防守的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长城”了。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敌的进攻，拒敌人于国门之外。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国保守国防的象征。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具有扩张性的国家。除了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期呈现出扩张趋向，但扩张不是历史的主流。

第二，与之相关的就是强调陆地国家，限制往海洋发展。中国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也很早发展出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并没有转化成为发展外部关系的动力。郑和下西洋非常能够说明这一点。中国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不是因为其能力，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地锁国家，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被“地”锁住的，而是被政策锁住的。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并非没有任何理性。决策者的决策是受地缘政治决定的。中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这一简单的事实，决定了中国倾向于实施这样的政策。

第三，正是因为被众多的小国家所包围，为了处理边疆问题，周边外交就变成中国“国际关系”的重点。处理边疆问题始终是中国传统“外交”的重点。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所谓的外交关系就是处理周边外交。

第四，朝贡制度。最近这些年，人们对朝贡制度的研究比较多，这里不再叙述。但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朝贡制度是中国地缘政治的表现，就是为了稳定周边环境。如同其他方面的国防和外交一样，朝贡制度也具有深刻的保守性。

第五，欠缺处理海洋问题的能力。因为不注重海洋地缘，中国尽管有这么长的海岸线，但没有足够的海洋知识。这种局面即使在进入现代之后也并没有改变。只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要素的扩张，从资本短缺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国家，才开始有向海洋国家转变的内部动力。但缺失处理海洋问题的知识贮备和能力的局面到现在还没有改观。这尤其表现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仍然面临种种困难。

不管人们对中国传统外交如何评论，这种外交维持了数千年。除了很可惜没有发展成为海洋国家，中国的边疆、周边和区域外交（朝贡制度）还是相当成功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其他所有形式的帝国都解体了，只有中华“帝国”生存下来了。如何生存下来的？很多人强调文化的因素。文化当然很重要，但问题是如何理解文化因素的作用。离开了地缘政治，文化就很难解释。

中华历代王朝能够在长城之内造就一种统一的文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在地缘政治相关。在世界历史上，很多帝国只顾向外扩张，而忽视了帝国内部的文化建设，因此就缺少内聚力。中华文明经过近代的艰苦历程，得以实现现代转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版图就是清朝留给我们的遗产。

四、当代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从近年来的经验来看，中国的边疆、周边外交和区域外交等层面都面临诸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解决了很多陆地边界问题，现在只留下和印度的边界主权纠纷。但陆地边界问题的解决并不是说，边疆问题就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的解决只是管理边疆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很显然，边疆问题尤其是新疆、西藏等地区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海洋边疆问题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东海和南海。边疆问题马上就牵涉到周边外交问题，而周边外交和区域外交甚至大国外交都密切相关。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这里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代中国外交并不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地缘政治来制定的，或者说，当代中国外交并没有遵循中国地缘政治所应该遵循的原则。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重点应当在亚洲。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大后院。现在讲中国崛起，但中国的崛起应当首先在亚洲。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大国所应当扮演的角色，那么首先不仅要成为亚洲大国，而且有实实在在的能力来处理亚洲问题。对这些，决策者应当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但是，一旦把焦点转移到

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政策行为和政策绩效时，就会发现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方向并不十分明确，并且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当代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在哪里？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人们可通过考察中国的外交行为得到一些答案。从行为看，在很多年里，中国的外交重点有二，一是大国外交，二是资源外交。大国外交比较清楚，就是中国和主要大国的关系，主要是中美关系。可以说，这方面花费了中国最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国外交很重要，因为它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构架。中国要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支柱，就必须参与大国外交并且成为重要一员。

其次在资源外交方面，主要合作对象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年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主要面向这两个区域。中国在这些区域有大量的投资，且主要为国家资本。同时，中国高层也频繁而高调地访问这些区域。给西方的感觉是，中国的确崛起了，其影响力已经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这里人们也看到，中国高层有强烈的意愿和这些区域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但是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说，则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感觉。尽管中国是亚洲国家，并且是最重要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感觉到中国对它们有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客观地说，不能说中国忽视了亚洲。在中国的外交概念中，周边外交有特殊意义，而周边外交实际上就是亚洲外交。在这方面，中国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取向。实际上的行为也不少。例如中国和东盟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多边组织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以中国是亚洲最主要大国的角度看，这些成果并不能说是显著。实际上，中国的亚洲邻居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做得足够多。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很多问题和中國直接相关。人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主要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应当包括钓鱼岛问题）、和东南亚的南海主权纠纷、和南亚印度的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巴基斯坦问题、缅甸问题等。

周边外交问题又很容易转变成为边疆问题，例如新疆和西藏问题。前些年，与朝鲜半岛也产生了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似乎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导致边疆问题发生的因素则越来越超出中国本身的控制。同时，边疆问题尽管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很容易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如西藏问题和新疆的“东突”问题。应当说，在所有大国当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特殊。和周边国家相关的众多问题，都可以转化成为重大的危机，稍不注意，就会随时爆发出来。可以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目前仍停留在被动应对阶段，尚未形成任何能够有效管理与控制局面的战略，更不用说是解决问题了。

尽管中国自身尚未找到解决之道，但外界却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在朝鲜核武器危机上，在缅甸问题上，世界本来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期待中国能够下大力气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也非常吻合；但几年下来，人们发现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并且中国也并没有强烈的意愿来解决这些问题。倒是来自远方的西方国家在时刻关注着这些问题并施加影响力。中国被视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尽心尽力”，这更使得西方国家有理由来干预这些问题。西方的干预当然会影响到中国。这是个悖论。你自己不想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那么别人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违背你的意志来解决问题，结果对你不利。

出现这种窘况表明中国在地缘政治战略上有很大的反思空间。就周边外交来说，有两个问题很突出。一是与其他区域相比，对亚洲的人财物力投入不够。在外界看来，中国往往说得多，说得高调，但做得少。中国的周边外交中有很多很好的概念，例如睦邻、安邻和富邻，但实现这些目标的行为则很少。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结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亚洲的利益，出台了人民币不贬值等非常有效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外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视中国为一个负责任的亚洲国家，并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此后，中国对亚洲外交的投入很少。中国的重点转移到了和大国打交道，而对国外的投资或者政府援助大多去了非洲和其他地方。中国对亚洲的穷国有援助，但很多年里，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多。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在同周边国家的外交中，外交部似乎并非主角，甚至被边缘化。地方政府和很多经济职能部门则成了主要执行者甚至是决策者。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往往从短期的物质利益出发，很难基于国家利益来执行政策。部分地方官员甚至因手握资金而妄自尊大，对周边国家政府缺乏应有的尊重。也有地方政府大搞公共工程，在境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很多年间，周边国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对中国的很多抱怨，只是没有办法，需要中国的继续帮助，没有发声罢了。这对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反而产生负面的作用。中国出了钱和力，但因为执行不当，反而导致很大的抱怨。但有一点很明确，很多国家觉得中国的“钱”很不好用，一旦有机会就去找日本和韩国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关方面的确需要考量中国的软力量问题，问一问，花了很多精力，但到底哪些国家是你真正的朋友？

还有一个重大的方面就是在一些问题上过分迷信多边主义，而无意中忽视了双边关系，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过分迷信双边主义，而忽视多边主义。多边和双边关系有个发展过程。中国从前只相信双边，不相信多边。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拒绝接受多边主义。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转型，

中国现在更重视多边。在亚洲，中国不但参与和加入现有多边组织，而且更是积极地组织多边关系，例如上述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但实际上，很多问题不能通过多边主义解决，而还是要通过双边关系解决的。

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大多数问题需要通过双边关系得到管理或者解决，如领土纠纷问题。即使在经贸领域，因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需要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双边关系。多边关系是个基础，必须在多边关系的基础上在双边关系上多做文章。国家间的信任更需要双边关系的推进。和其他区域相比，中国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放在和本区域国家间的元首外交关系上面。令人迷惑的是，传统上中国本来在亚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正是在亚洲，中国的软力量严重缺失。

不过，很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既然在那么多方面强调多边主义，但就其本质上来说是多边主义的南海纠纷，中国则坚守传统的双边主义。南海岛礁的纠纷是多边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更是多边的。传统的双边主义因此很不适用。如果能够从传统的双边主义转型成为新形式的双边主义，就是在多边构架内的双边主义，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局面。中国能否实现这种转型，还要拭目以待。

同样，中国也要转变边疆战略。传统上，边疆一直被视为军事和战略要塞。这种传统到当代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型。暴力和控制手段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但是，这并不是最有效的战略，成本极高。很多年来，中国开始要把边疆转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让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各种族、各宗教人民的互动平台。但能否把军事和战略要塞转型成为经济要塞呢？这方面并不很清楚。欧盟、北美有做得相当成功的边疆政策，中国的一些边疆地区做得也不错。发展经济很重要。中国边疆面临着分离、恐怖主义和其他种种极端势力的挑战。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就可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经济发展可以大大减少极端势力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在世界任何地方，贫穷是极端主义的基础，而经济社会发展是理性的基础。

把边疆转型成为经济社会要塞并不是要放弃军事和战略斗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极端势力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刺激宗教、种族、民族认同等意识的觉醒，一些人会变得极端。对付极端分子，暴力还要继续发挥作用。军事和战略方面甚至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强化。不过，暴力必须处于第二位置，或者隐性的位置，作为最后的安全保障。走在前线的必须是经济和社会。

五、根据地缘政治调整外交战略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大国外交上，中国的外交思维过于美国化，重视大国，而忽视小国。中国的战略和外交必须考虑到中国周边的特殊环境。即使美国，其小国外交也是有深刻的教训的。美国并没有在大国那里吃亏多少。冷战期间和苏联对峙，美国没有吃亏。冷战后，中国和美国合作，美国更是有利可图。美国的外交和战略危机大都来自小国，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都是如此。考虑到周边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的危机更容易来自小国。大国关系很重要，也不会被人忽视。但与小国的关系则不然，会不知不觉中被忽视。现在中国的实力还没有容许中国的影响力到达世界各地，但中国似乎已经成了西方富国的“救星”。这种过分卷入已经使中国力不从心。

根据中国的地缘政治因素，外交政策和策略的重点还是要根据边疆、周边、区域和国际化这一等级秩序来决定。很多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比如反恐，但基点仍然是边疆和周边。需要国际合作是因为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这一点中国也已经意识到。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重点是反恐方面的多边合作。不过，国际和区域合作并不能取代有效的边疆政策。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要求，战略“走出去”，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就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势必成为国际秩序构架中的一个重大支柱。很显然，要成为这样一个支柱，中国就必须首先把战略重点放在边疆、周边和亚洲。一旦这些领域发生重大危机，或者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出现重大危机，那么就会导致中国国际秩序的解体。亚洲是中国的根基，根基不稳，谈何崛起。

【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驱动国家“软力量”建设的思想引擎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话郑永年

导语：

2025年正值《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十周年。十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郑永年教授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时，回顾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十年的发展历程，总结宝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郑永年教授指出，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力量”的核心与灵魂。对智库而言，只有真正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以我为主”，才能准确解释中国的现实，科学预测中国的未来。他进一步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智库研究、智库人才培养模式、智库治理机制等话题，深入分享了对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路径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 1 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您如何看待十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的非凡成就？

郑永年：我认为，这十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成就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意见》印发十年来，中国智库作为一个具有自我认同意识的研究系统真正建立起来了，并且规模在逐渐扩大。经过十年的发展，今天中国的智库系统已经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既有政府内部的智库，也有半政府背景的智库；社会各界也开始认识和重视智库系统的建设，成立了众多的民间智库。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智库，有不一样的聚焦方向和研究重点，起到了连接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作用。

第二，智库系统逐渐形成了“政策研究”的意识。这里所说的“政策研究”有别于大学里的“学院派”的公共政策分析。“学院派”的政策分析倾向于事后分析功能，而智库系统的政策研究是基于实操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强调政策的预见性和可行性，是政策研究领域的“实战派”。第三，智库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经验地看，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有些来源于西方，有些大学“学院派”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停留在西方的教科书里。智库则更多地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关注中国实践中的公共政策，探讨其形成、演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政府是如何决策、如何执行、如何监督和反馈等。

从上述三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智库系统在过去十年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坚实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中国智库的核心发力点，还是要回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核心使命上来。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中国智库更应侧重于从哪些领域和方向发力？

郑永年：一个国家的崛起，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层面的崛起，更深层次的根源和力量是“思想的崛起”。思想既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崛起的起源与反映，也是物质崛起的精神积淀和浓缩，并且通过思想，物质崛起向未来开拓和延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库就是国家“软力量”的核心与灵魂。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的智库将如何发挥建设性作用，请谈谈您的看法。

郑永年：只有真正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以我为主”，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实践、预测中国的未来。具体到智库研究，我认为需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的工作：首

先是传统专业类型的政策分析，包括风险分析和预判分析；其次是思想型的分析，政策分析没有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型的分析对于我们实现“思想引领”非常重要；最后是实践类的，因为这关系到如何让思想和政策真正落地。

这三个层面的工作关乎政策研究的方法论，方法论的改进就会体现在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政策的分析。其中，对政治领域的智库尤其重要，因为这个领域的智库关切的是执政基础和治理方法及其有效性等问题，进而面向未来，探讨体制机制如何改进，如何进行更好的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会带来冲击还是机遇？

郑永年：就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大规模应用，基本上可以取代我们传统智库所做的不少工作，尤其是侧重于量化和逻辑推演的部分。人工智能出现后，我们首先要厘清几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构建知识体系，人工智能在构建知识体系过程中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不能为我们做什么，人类借助人工智能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如何聚焦于人工智能所不能做的事情？

我认为，与“AI for social science”（赋能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工智能）相比，“AI for public policy”（赋能政策研究的人工智能）甚至更加重要。现在的人工智能基本上仍是“先人工、后智能”，缺少原创性的东西。原创性的部分还是需要依靠人类自身，这也是智库的责任。作为智库，我们一定要深入社会经济的第一线，观察到新的现象，继而将其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并提出政策建议。这是人工智能无法做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无到有，原创性的东西往往也是最难的。

郑永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高效的工具，我们一定要主动拥抱、善加利用。“从1到10”甚至“从1到100”的非原创性部分可以由人工智能做得更多，而“从0到1”的原创性部分则应该由我们人类研究者来完成。

当然，在拥抱人工智能的同时，我们也要明确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分工。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收集、处理、分析材料，但很难作判断。政策分析本质上是一个判断的问题，这种判断目前而言是不能交给人工智能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着眼未来进行人才队伍建设呢？

郑永年：在智库人才队伍建设这一块，我们同样存在着短板。目前，我们主要的智库人才仍来自高校，但高校侧重于做理论研究，无法全方位应对公共政策的实践性工作。所以，在建设智库系统的同时，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培养智库人才。所以，智库和政府、大学、企业之间的人才应该交流轮转起来，如果人才不轮转的话，智库工作就像“在笼子里转圈”。目前，中国智库的人才流动性还不强，一些智库人员缺乏接触和了解实践的机会。

我认为，可以先在一些省份或地方尝试建立一些智库与大学、智库与政府、智库与企业之间的人才交流机制，采用诸如兼职、双聘等机制进行人才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才交流机制消除了人才的后顾之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郑永年：我们尚且缺少系统化的智库人才培养系统。大学培养的是理论型公共政策人才，很多对公共政策的分析都是基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而我们眼下急需的是实践型的公共政策人才，更加关注当下和未来的政策。比如，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时常无法提供有效的分析，怎么办？

过去十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智库系统。那么，“库”建立起来了，“智”如何培养？如何规划智库人才的职业发展？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举个例子，大学里有“终身教授”制度，而在智库中终身制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可以考虑为智库人才设置相应的编制。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容易。高校系统的人员可以一辈子从事教育，但智库系统的研究人员，一旦缺失了新的思想，那么能够做什么？这些人的未来又在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出这些前瞻性的问题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从根本上说还有待于理顺智库发展建设机制。能否展望一下中国智库发展的未来？

郑永年：过去十年，中国的智库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动力，我认为还是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可以说是中国智库发展的根本优势所在。

郑永年：目前，中国的智库体系还没有完全转化成社会自觉的一部分。对我们国家而言，智库建设“自下而上”的动力和机制在哪里？我认为，社会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智库建设经费来源渠道应该多样化，鼓励智库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智库可以向企业、政府和社会提

供服务，这样可以让智库与政府、社会同时产生联系，能够同时了解两边的情况。再比如，我们可能需要吸纳社会资源的基金会来支持智库的运作，需要比较灵活的政府采购服务制度作为智库发展的重要支撑，尤其是作为知识服务的采购。实际上，这也有助于培养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的“软力量”。

适度的治理才能让智库发挥作用。现在，很多横向课题、纵向课题的资金使用还是有些死板。当然，如果资金使用过于灵活，也可能会滋生腐败现象。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智库治理机制”问题，这也需要整个智库行业的系统性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设符合我们自身特点的智库治理模式。

***本文最初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7月8日第A07智库版，原标题为《驱动国家“软力量”建设的思想引擎——专访郑永年教授》。记者袁华杰、谢德。**

【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数智时代的知识变革与知识创新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导语：

2025年5月27日，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分论坛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受邀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以“数智时代的知识变革与知识创新”为题作主旨演讲。

郑永年教授通过回溯社会科学知识产生的三类知识及其方法论后指出，人工智能能够创造出“形而下”的知识，但没有能力创造“形而上”的知识，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知识。从这个视角来看，在知识创造领域，人工智能是不能替代人类的，两者必然会形成一种劳动分工。他认为，我们需要接受人工智能的赋能，但更重要的是要超越它，创造其所不能创造的知识。

自 ChatGPT、DeepSeek 等人工智能工具产生以来，它们以极高的活跃度和用户人数迅速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也自然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影响人类未来的热烈猜测。人工智能发展异常迅速，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人工智能对人类知识创造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产出的文本和图像几乎与人类自己的作品一模一样，难以区分，这给人类知识创造带来了新的挑战。

要理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知识创造的影响，必须回到人工智能最初的原点，也就是回到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哲学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相关理论提供了依据。这些理论认为，人工智能的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可归于它能够扫描大量数据集来学习类型和模式。虽然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像人类心智那样认识一些事物，但通过与现实模式的匹配积累，它有可能接近人类在感知和理性上的表现，有时甚至能超过人类。

人工智能就是模仿或者模拟人类，是先“人工”，后“智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机器本身并没有能够像人类那样思考，而是通过人类获得知识，并在人类知识的基础之上产生知识。也就是说，至少到今天为止，人工智能仍是建立在现存知识之上，而非基于人类所具有的智力和智慧之上。因此，就知识创造来说，人类现在应当考虑的问题是：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什么样的知识，不能创造什么样的知识？我们需要接受人工智能的赋能功能，帮助我们创造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超越人工智能，创造其能所不能创造的知识。

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人工智能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科学知识分成三类：一是来自“形而上”研究的知识；二是来自“形而下”研究的知识；三是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并且作为两者桥梁的知识。从这个分类学看，人工智能是基于“形而下”研究知识的，也就是第二类知识。

近代以来，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形而下”的实证和经验研究，是可以验证的。而在近代之前，人类知识大都是“形而上”的，表现为神学、哲学和伦理学等形式。“形而上”研究在当代被看作是不可验证的，因此不能被视为是科学，因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边缘化，尤其是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英美国家。但是，“形而上”研究对“形而下”研究的深刻影响，却被大大低估和忽视了。实际上，很多类型的知识，尤其是哲学、思想、观念、价值、情感等，都来自“形而上”的研究；而来自任何形式的“形而下”研究的知识则很难导向来自“形而上”研究的知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近代之前“形而上”的研究，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形而下”的社会科学。大量的从宏观到中观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假设和命题，也都来自“形而上”的知识。

无论是“形而上”、“形而下”，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知识，它们都指向了方法论的重要性。所有的知识都是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方法论的产物。因此，如果要问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什么样的知识，不能创造什么样的知识，我们需要回到社会科学知识的方法论问题。根据前面所说的三类知识，我们至少可从三个层面的方法论来讨论。

第一，作为计算工具的方法论。尽管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在从事经验性的实证研究，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论的本质。今天，经过漫长的学术训练，学者的工具箱里拥有了无穷的工具，从大数据分析到微观的案例研究。这些作为工具的方法论强调的是逻辑推理和数学算法，具有普遍性，学者也希望通过使用这样的工具来通向普遍性知识，掌握普遍真理。但是，从实践来看，在人们使用这些工具从事研究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在用异常复杂的“科学方法”来论证一些显而易见的常识。尽管有堆积如山的数据和案例，但我们却无法理解作者到底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大量的时间和生命都浪费在数据和案例堆中。更有甚者，很多学者并不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而去找工具，而是倒过来，为了使用某种或者某些工具而去找问题。

第二，作为思维的方法论。如果从材料和工具这个层面寻找问题，肯定会失败。要找到问题的关键，就需要研究者拥有高层次思想层面的方法论，或者说是思维方式或思想方式。现代大学充斥着大量被称之为方法论的教科书。但是，很大程度上来说，从这些教科书里面学习到的方法论很难产生思想，尤其是原创性思想。使用这些方法做出来的研究和写出来的文字没有思想和灵魂，自然没有吸引力，更难转化成人们所说的软力量。例如，在社会科学中，大家都会读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大家学到了马克思的“阶级论”、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和韦伯的“科层论”。对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善于使用“阶级论”“社会分工论”“科层论”来提出和分析他们的问题。但是，人们忘记了，如果仅仅使用这些工具化的方法论，是不能导向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更不用说思想了。

学者们最应当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发现了“阶级”？为什么涂尔干能发现“社会劳动分工”？韦伯又为什么能发现“科层”？他们到底是如何发现的？因为“阶级”“社会劳动分工”“科层”都是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如果能够回答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就能学会如何从思想层面思考问题，而不仅仅是作为工具应用者。再者，如果回答了这些问题，人们就可从更深层次理解这些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

第三，作为思维的文化动力的方法论。对中国学者而言，即使到了思维这一层面，在思想层面上也还是不够的。说到文化，自然指向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东西方的差异并不在上述这

些具体的工具，甚至也不仅仅在思想方法层面，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文明和文化因素。这里，宗教和哲学因素极其重要。尽管近代以来宗教几乎和社会科学分离开来，成为被解释的对象，而非解释其他事物的“自变量”，但是宗教思维深深潜入到人们的思维中，很多时候，宗教是以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哲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个层面，东西方表现出本质性的不同。

在方法论上，西方是宗教思维，表现为“魔鬼”与“天使”的二元划分。反映在社会科学思维上便是“两分法”，例如韦伯的“理想类型”和库恩的“研究范式”等，这种两分法表现在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例如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政治领域的“民主”与“专制”，社会学领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传统”与“现代”等等。在西方的思维光谱中，这些都构成对立面。这种思维不仅影响到西方学者对他们自己社会的看法，更影响到对非西方社会的看法。例如，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东方”概念，到近代的“东方专制主义”，再到今天各种版本的权威主义概念，其思维是同一的，从来没有变化过。

中国文明则没有这样极端的两分法。尽管中国文明有“阴”“阳”之分，但两者不是绝对分离的，而是相互嵌入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再如，中国文明也有“文明”与“野蛮”之分，但两者是可变的，孔子因此提倡“有教无类”，所谓的“文明”与“野蛮”只是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之分，任何人通过教育都可以从“野蛮”转向“文明”。

以上三种方法基本上对应了前面所讨论的三类社会科学知识。第一，作为计算工具的方法论是今天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基本上都是“形而下”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研究。第二，作为思维的文化动力的方法论是今天的小众和非主流，基本上反映在“形而上”的哲学、伦理学和宗教研究上，并且往往表现成为一种倡导。第三，作为思维的方法论可以说是介于前面两者之间的桥梁，表现在社会科学的中观理论和概念上。那么，就社会科学知识创造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就容易回答了。简单地说，人工智能能够创造第一类知识，即“形而下”的知识，但很难甚至没有能力来创造第二类知识（“形而上”的知识）和第三类知识（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知识）。

对第一类知识的创造，人工智能远较人类高效和精确，而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则依然属于人类的智能和智慧范畴。至少就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来说，其没有能力来做这样的知识创造。从这个视角来看，在知识创造领域，人类和人工智能必然会形成一种劳动分工。前面讨论过的维特根斯坦有关对人类思想“划定一个界限”的论断也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即人工智能对它能表达的思想会表达得很清楚，但对它不能表达的思想则会保持沉默。

在知识创造领域，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类。但是，从近期看，人工智能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冲击是巨大的。正如前面所说的，实证尤其是微观的研究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主流，但这种研究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可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文章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 2025 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分论坛上的演讲。**

【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及如何构建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导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

2024年1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头条全版刊登了郑永年教授的《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及如何构建》一文。文章聚焦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间的内在关系，并以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为例指出，社会科学本质上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脱离本土经济社会视角、单纯依赖知识的“搬运”将难以反映和解释现实问题，也无法构建有效的理论。

近年来,我们把文化强国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文化,广义上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指的是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因此,文化是一个统称。我认为,一个文明或者国家的文化的核心是知识体系。一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在方方面面的体现和反映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外文明演进史都说明了知识体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这就是近年来我们国家这么重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的原因。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紧密相关。简单地说,学术是基础,学科和话语是学术的不同载体和表达方式。经验地看,就学术和学科两者关联来说,先产生的是学术,然后再有学科。也就是说,学科的基础是学术,包括思想、观念、理念、概念和理论,不管是关乎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是事物的还是人事的等。学术的机构化便是学科,即把思想、观念、理念、概念和理论等分门别类。不过,学科产生之后又会反过来推进学术,分门别类的研究产生了劳动分工,而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学科有助于深化学术研究,进一步学术研究所获取的新思想、观念、理念、概念和理论再进一步推进学科的发展。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深化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就学术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来说,学术也是基础,没有学术就没有话语,话语只是学术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包括语言、图像、影像等方式。如果说学术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学术界,那么把学术转化成为话语之后,其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伸展到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在实践领域,不同话语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流、争论和冲突又构成话语变化的动力,不断变化的话语反过来也会促进学术的深化和发展。

就学科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来说，学科也是话语体系机构化的结果。在现代社会，话语体系的载体不仅是生产话语的学科本身，更多的话语功能被专业化机构所承担，尤其是各种形式的大众传媒。学科体系促成学术研究的劳动分工和专门化，这导致话语基础的深化和拓展，而话语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应用性，话语存在于实践领域，话语在实践领域的影响力（例如可接受度、不可接受度）会反馈到学科领域，构成学科变化的动力。如果说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机构化表现，那么这“三大体系”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就它们各自的功能来说，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只有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表达出来，为人们所知晓和理解。一个学科体系只有准确、充分地表达了本学科的学术体系，才能成为有效的话语体系。

一个学科只有以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构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才能称其为一个有效的学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主体便是人们经常所说的“知识共同体”或者“知识群体”。这里的“知识共同体”是广义上的，尽管其主体是学校和研究机构，但并不仅仅限于这些。在现代社会，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共同体的外延一直在拓展和拓宽，包括所有对知识体系有贡献的社会群体。知识共同体构建知识体系，而学科、学术和话语可以被理解为知识体系存在和表述的三种样态。学科体系是知识共同体构筑的教学样态；学术体系是知识共同体构筑的研究样态；话语体系是知识共同体对外传播的工具样态。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构建这“三大体系”呢？呼吁构建“三大体系”，并不是说中国目前不存在这“三大体系”。这“三大体系”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是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第一，尽管存在着学科、学术和话语这三个领域，但各自的发展短板不少，还没有体系化。第二，这三个领域各自为政，还没有融合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还没有系统化。第三，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发达的国家相比，无论就各个领域还是整体而言，中国的“三大体系”依然缺乏比较优势，在国际舞台上没有竞争优势。第四，更为严重的是，现存“三大体系”缺失“中国性”，而更多的是体现“西方性”。自近代社会科学西方进入中国，学术界迄今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态度依然是“我注六经”，即用中国的案例来论证西方的命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三大体系”还不是“自主”的体系，而是“应用”体系，即应用他人的体系。第五，“三大体系”既不能反映中国的现实，也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更失去了与中国现实的相关性。如果不能重构“三大体系”，那么“三大体系”不仅很难进步，更快

的衰落则更有可能。近年来,笔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如何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经济学,因此,本文想围绕经济学构建谈些初步的看法。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情况不仅存在于经济学领域,也存在于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这里先引用一段话:

即使在今天,(中国)学者也很少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只专注研究西方的经济思想……学者们只顾照搬西方学者的经济思想。从欧洲回来的学生呼吁中国应遵循欧洲的经济政策,从美国回来的学生称赞美国的经济政策。一方的支持者认为每一个理论都是完美的,而反对者则猛烈攻击它。研究近年来我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混乱和财政管理的低水平,就会发现忽视国内经济环境的严重后果。不根据国情的讨论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学者们若想为解决中国当代经济问题作出贡献,就应该研究国内的经济思想,加以整理和批判,才能搞清我国的经济背景。同时,学者也可以研究西方的经济思想,整理批判后,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由此,中国当代的经济问题可能会有更圆满的解决办法。(此段引文原为文言文,笔者作白话文译)

如果不告诉读者这段话的出处,那么相信很多人会以为是今天的一位经济学者在批评其当代同仁,因为这段话相当精确地描述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不过,这段话引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黄汉所著的《管子经济思想》一书。从1936年到今天将近90年了。换句话说,今天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似乎还停留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局面。

但实际上,就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来说,今天的情况甚至比那个年代还严峻一些。自晚清到民国,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既精通中国历史也懂西方的学者。人们今天能读到的中国经济史或者经济思想史的经典性文献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尽管正如黄汉这段话所隐指的,当时的一些学者变成了西方知识的“搬运工”,但依然有很多学者基于中国实践的需要来思考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未来。今天中国的经济学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很难找到这样一群既懂中国又懂西方的学者了。这便是中国经济学界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我们面临很多经济困难和挑战,需要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思维,因为经济思维是认识 and 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但是,中国经济学界一直苦于没有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人们总是拿着从国外进口而来的那点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作这样那样的解释和诊断,结果诊断错了,药方错了,不仅治不了病,病情反而恶化了。

在一段时间里,这样那样的外国工具的使用又是通过所谓的“改革”而实现的,因此,“改革”越多,问题越多、越严重,这使得社会对改革产生怀疑。因此,人们必须明确:首先,我们面临的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美国的、欧洲的和日本的;其次,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的治疗方法,而不是整天拿着治疗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经济问题的美国方法、欧洲方

法和日本方法来招摇过市。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经济现实一直在呼吁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中国经济学的诞生。尽管经济学界在实践面前处处碰壁，但很多人依然没有认识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完全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尤其是学院派）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简直就是“闹着玩”，他们对此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经济学，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再去建构中国经济学。

前些天，我为尹汉宁先生刚刚出版的《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三联书店 2024 年版）写了一个书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强调了为什么要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经济学。有一个人看了留言说，“再搞一个中国牛顿定律”。我想，这样思考的在中国大有人在。很多人把西方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视为是普世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去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我的回答是，“如果有人想搞中国牛顿定律，那么大错特错了”；但同样，“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学是普世的，中国不需要构建自己的经济学，那么也同样大错特错了”。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经济学一直自居为科学。在经济研究领域，所谓的“量化”和“数学化”的方法论一直是主流。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正如物理学一样，经济学也无分东西和国别。那么，西方经济学具有所谓的普世性吗？近代以来的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于西方，自西方再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西方一直认为其经济学是普世的，而且接受国的学者们也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的。这种所谓“科学化”趋势已经产生并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危害。尽管表面上，经济学越来越“科学化”了，但实际上离实际经济越来越远。这个情况在西方也是如此。很多年来，人们一直有“商学院与商业无关”（business school nothing to do with business）和“经济学与经济无关”（economics nothing to do with economy）的说法。在经济政策领域更会带来巨大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智利军人政府期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一个案例。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上的“华盛顿共识”更是在全球范围内遇到有效的抵制。

我们否认美国经济学的普遍性，但并不否认经济现象具有普遍性。任何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由两部分组成，即“社会”和“科学”。

“科学”代表的是“普遍性”，而“社会”代表的是“特殊性”。就经济学而言，我们必须意识到：第一，只有在所有地方都发现某一经济运行规则的时候，人们才可以说具有普遍性。例如供求关系和“物以稀为贵”等现象的存在都具有普遍性。第二，经济学又具有特殊性，普遍性是嵌入在特殊的实践之中的，一旦离开了特殊性，普遍性就变得毫无意义。第三，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看，经济学的普遍性犹如山的高度与氧气的含量，越高越稀薄，越是深入一个

经济体的运作内部,经济学的普遍性变得越不相关。第四,正是因为“普遍性”嵌于“特殊性”之中,所以,普遍性应当是一个经济体自身变化的内在需求,而不能由强力推行而来,否则不可持续,最终也会失败,“华盛顿共识”便是如此。

如果人们有足够的耐心研究一下西方经济学演进的历史,其实不难发现不同时空下的经济实践如何主导着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构建。

第一,历史性。所有经济学都具有历史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都发展出了符合那个时代的经济学。拿着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学来解释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现象是荒唐的,拿着产生于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学去解释农业社会的现象也同样是荒唐的。今天,随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所有传统经济学都面临挑战。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面临着要么重建、要么死亡的选择。

第二,国别性。经济学的“国别性”是常识,但我们的学者连这种常识都没有了。重农学派产生于法国,亚当·斯密经济学产生于英国,李斯特经济学产生于德国,汉密尔顿经济学产生于美国,发展主义产生在东亚。这些都是自明的。当英国人向德国人推销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即亚当·斯密经济学)的时候,德国的李斯特则在思考,德国如何向美国学习,实行重商主义,这便是李斯特经济理论的起源。必须指出的是,各国经济学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本国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承认经济学的国别性质,那么一般的经济学从何而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被赋予了所谓的“普世性”。但新自由主义只盛行于英美国家,并没有普遍性适用性,是美国动用其政治力量来强行推行“华盛顿共识”。很多学者沉醉于经济学理论的“优美”,而忘却了其产生的根源。

第三,问题导向性。所有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理论都是建立在他(她)那个时代、他(她)的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是为了追求普世性,或者寻求所谓的普遍真理。只是他(她)直面具体的经济问题(现象)并且提出了有效的解释(或许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她)的理论才具有了普遍性。

结论很简单,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不能直面中国的经济问题(现象),不能有效解释这些问题(或者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很难说他(她)能够构建有效的经济理论。在我看来,西方经济学自以为具有普世性主要是因为其方法论。在自然科学里面,因果关系是确定的。经济学也追求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学者们过度追求方法论之美,往往导致几个明显的缺陷。仅举几例。第一,简约化,把经济学简约成为几点原则,但现实并非如此。第二,经济学家设定太多的“假如”,在这些“假如”成立的条件下,经济学者所论述的因果才会出

现。不过，经济学者设定的大多这样的“假如”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第三，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转向了数学，这使得他们找到了逃避现实的有效方法。不过，经济学的数学化也促成了经济学和现实经济的不相关性。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把经济和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分离开来的过程。在任何地方，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是深度嵌入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之中的，从来不存在一个可以和社会分离开来的抽象的经济活动。不过，经济学生硬地把经济活动和其他生活“脱嵌”开来，把经济视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领域。当经济学不能解释现实时，很多经济学者从来不会也不肯承认是经济学理论错了，而不是他（她）们自己的理论错了。这种认知在中国经济学者中尤其盛行，很多人往往视经济学为绝对真理，拿着经济学理论来衡量（评判）中国的经济现实。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学界依然停留在黄汉 1936 年所描述的那种情形。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或者其他硬力量的崛起，更需要体现在基于思想崛起之上的社会科学的崛起。我们需要花几代人的努力，真正把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构建起来。可以相信，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但这是基于中国实践之上的百花齐放，而非炒作外来思想的百花齐放。中国自主的经济学并不排斥外来思想，但必须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性思想体系。

***原文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 年 12 月 17 日头版。**

【化危为机：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香港再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内生发展动力的 重构

赵巍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杨庭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导语：

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历经多次变迁：从战后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跻身“亚洲四小龙”，到改革开放后与珠三角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借助境外上市与资本流动，巩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当前，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再次进入调整期。过去依托制度差异所形成的跨境优势正在减弱，其作为大湾区增长极的功能亦面临挑战。与此同时，外部环境趋于复杂，美西方通过多种手段试图“以港遏华”，使香港的中介功能受到冲击。

IPP研究员赵巍和研究助理杨庭轩指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生发展机制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香港本身作为增长极的动能消失及相应带来的整个大湾区跨境合作主导模式遭遇局限。若要重塑香港增长极角色，必须突破单一城市经济逻辑，将其嵌入大湾区整体协同规划，将服务经济向差异化、高附加值和跨境协同的方向转型升级，尤其在科技金融、专业服务、教育与健康领域。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发展区域之一，自被纳入国家战略以来，更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空间载体。然而，在大湾区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其内生发展动力却逐渐减弱。要理解这一困局，须以理论深度从地理空间、政策战略与制度结构等多层面分析其内在构造与已经发生的变化。

回顾历史，当前大湾区内生发展机制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香港本身作为增长极的动能消失及相应带来的整个大湾区跨境合作主导模式遭遇局限。面对一体化和差异化两种不同的战略范式，香港经济仍具有巨大的施展空间，即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和组合不同的战略路径。例如，在科技创新领域，应加强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实现高度一体化等；而在教育领域，则应通过国际化与内地有所差异。总之，应重新定位香港产业经济及战略，再造其作为增长极的动能，并通过重构与大湾区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形成新一轮区域发展的内生机制。

一、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挑战

在当前的政策话语、舆论传播乃至社会认知中，“粤港澳大湾区”被频繁使用并被潜意识地预设为一个区域行政实体，而非尚未完工、有待持续推进的制度建设工程。这种战略认知偏差导致两方面问题：一是许多政策制定者乃至公众将区域一体化视为现实存在，低估制度融合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忽略协同治理的结构性挑战；二是难以有效识别区域发展动能减弱的根源，导致区域增长战略的停滞与模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战略发展概念被提出，其实具有多维性，且各维度的发展并不均衡。在现阶段，我们应该将当前的粤港澳大湾区看作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这样有助于找到问题的症结。

（一）从地理空间到政策计划

从地理意义上讲，粤港澳大湾区最初源于珠江三角洲的自然地理格局，其基本空间格局就是环珠江口的湾区结构，在物理意义上始终存在。早在2016年，郑永年教授与莫道明教授就提出了“环珠江口湾区”概念，以及用经济社会方式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战略设想。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区域概念，具备天然的地理空间连通性与城市群集聚效应。

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东京湾等世界上被称作湾区的地方并无二致。最大的不同，在于粤港澳大湾区是首先被政府作为一种明确的战略概念和规划提出，继而需要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和制度的运作而加以实现。

2019年，作为国家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从彼时起，“大湾区”被整体性的政策系统化运用，成为政策对象。在行政制度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尚不是一个单独划

分出的行政区域。自设立以来也没有设立专门的一个“大湾区政府”。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内三地的制度异质性始终存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行政分隔使粤港澳长期分属不同制度单元，在货币、关税、法律、人才、数据流动、社会治理等核心制度领域尚存重大差异。

本质上讲，大湾区是在政策层面上的发展计划与方案，即通过“九市+两区”的结构性组合建立区域内政策资源的联动，推动内外循环对接、港澳深度融合、湾区协同创新等。大湾区战略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很自然地演变成通过政策手段来实现物质、技术和制度等多维度的跨域联动与共建共治，令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获得更快、更好、更大的整体性区域发展，这就是“区域一体化战略”。而正是由于区域内部的制度差异，如何应对这种内部异质性的挑战不仅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有别于全球其他湾区的显著特征，也使得包括功能整合在内的区域跨境一体化战略逐渐演化成了大湾区内各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本身。

（二）从跨境一体化战略到内生发展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在追求跨境一体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内生发展动力及机制可用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进行透彻阐明。¹

增长极（Growth Pole）理论关注一个区域的“增长或发展如何产生”、“如何能进一步发展”等问题，实质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原理。佩鲁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的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因此，区域发展的实质过程是区域极化和扩散的过程，区域规划应促进具有区位和资源禀赋优势的地区成为增长极，通过辐射和扩散等机制形成“不平等动力学”（佩鲁：《略论发展极的概念》）。后来，布德维尔²更加明确地把增长极定义为“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能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与增长极类似，达尔曼³的“发展块”（Development Blocks）概念也综合了经济的极化空间、城镇和产业链及其关联等要素，包含：1）具有核心能力的工商企业或各种组织，能够利用商业和市场机会；2）这些企业和组织往往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和网络；3）需要硬件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城市）和软性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各种经济社会制度安排）等作为环境条件。这些要素的集聚构成了“增长极”，即不平等的极化点，使得区域内产生不均衡和差异点。

¹ 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教于法国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他提出了“新发展观”，强调社会可持续发展，并在1955年提出了“发展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并不均衡分布。佩鲁的理论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² Jacques Raoul Boudeville，法国经济学家。

³ Eric Dahmen，瑞典经济学家，区域创新体系理论先驱之一。

地区的不同增长极之间因发展不均衡而产生的辐射效应、渗漏效应、扩散虹吸相互作用等就形成了地区经济起飞和快速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

在粤港澳大湾区，与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等一样，香港无疑是一个增长极，而且是最重要的增长极。在回归前后，香港以其独特的制度自由度、金融体系、国际网络等极化优势带动珠三角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形成明显的“增长极—辐射—扩散”格局。

大湾区真正的内生发展动力机制恰恰来自这种香港与珠三角因制度性差异而导致的发展不均衡，即在一个区域中共生并存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这种差异和不均衡状态激发出区内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甚至制度要素的跨境流动的冲动，再加上政府采纳的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战略更强化了自发的市场机制，于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类似于北美的美墨边境地区的“跨境优势”。

然而，时至今日，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巨变，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紧张等都使得区域发展的外部拉力削弱。如下文将要详述的，随着珠三角城市的快速崛起、经济重心的北移，香港因产业政策的缺失与偏误导致内在动能下降，作为区域增长极的角色已经过时，地位甚至与珠三角城市发生逆转。随着区域内部各增长极逐步趋于同质化均衡，跨境一体化战略所形成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已逐渐式微。伴随跨境优势的红利丧失，区域发展开始面临“内生动力枯竭”的问题。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必须超越简单“空间整合”的静态视角，重新发掘作为世界级超级大都市群所具有的内生动力源的增长极战略，以及重构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

文章将以香港经济演变与粤港合作模式为切入视角，回顾梳理其功能角色的变迁轨迹，并举基于共创式一体化的新型科创政策为例，探索大湾区如何构建新一轮的区域增长机制与政策战略路径。

二、香港竞争力：作为增长极动能的边际递减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化与中国内地的崛起，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经济地位与战略功能经历了深刻转变。要深入理解当前香港在大湾区中的增长极动能及定位，须从历史纵深视角观其演进。香港经济作为区域发展动力源的增长极动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进展产生了四类经济板块：飞地型经济、桥头堡型经济、依存型经济，以及本地服务型经济。

其中前三种是以“对外中介”为主的经济板块，第四种是随着香港经济起飞成长起来并长期与其他板块并存的“本地内生”型经济。在这四个板块中，依存型和本地服务型近年在香港经济中占据的版图越来越大。而港人的“北上消费”现象，则显示了依存型与本地服务型经济的合并，正以更广泛的依存重塑着香港本土经济。

(一) 飞地型经济 (1960s – 1997)

在冷战格局与亚洲制造业兴起的大背景下，香港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逐步发展成为跨国资本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离岸平台。其核心特征是具备独立关税区地位、高度贸易自由化、低税负环境与稳定的英美法系法治制度，成为典型的“飞地型经济”。香港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共同引领东亚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浪潮。这一模式下的香港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加工与航运物流，其制度优势主要体现于金融与贸易自由度。这一时期，香港制造业以纺织、成衣、塑料和电子产品为主导。1960 年代，纺织和成衣出口占本地产品出口总值的 51% 以上，制造业就业人数约为 625,000 人，约占总就业人口的 40%。到 1997 年，香港出口总额达 1884 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内地和美国的出口分别占 34.86% 和 21.75%⁴。1961 年至 1997 年间，香港的经济增长显著，国内生产总值从 13.8 亿美元增长至 1773.5 亿美元⁵。然而，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逐渐向中国南部迁移，香港经济重心也转向服务业。

(二) 桥头堡/跳板型经济 (1997 – 2010)

1997 年香港回归后，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前夕，香港在全球资本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的进程中，扮演了关键的“桥头堡”角色。在此阶段，香港不仅为跨国公司提供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首站平台，还作为港资北上投资的跳板。大量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中国区总部或作为第一站向中国内地拓展产业链布局，同时，“前店后厂”、“总部 – 制造分离”等模式盛行于珠三角，强化了香港的“中介型发展”特征。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⁶，1998 至 2010 年间，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双向直接投资关系实现质与量的飞跃：香港对内地的直接投资额从 1998 年的 5,481 亿港元增长至 2010 年的 30,710 亿港元，占对外投资比重从 31.6% 提升至 42.2%；同期，内地对港投资也从 2,143 亿港元跃升至 31,265 亿港元，占香港吸收外资的比重由 12.3% 跃升至 36.9%，不仅巩固了香港作为中国对外资引入与输出核心枢纽的地位，也标志着两地资本循环与经济融合进入高水平互动阶段。然而，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香港作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头堡”角色逐渐减弱。近年西方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有所弱化，香港在这一类型经济中的动能也相应下降。

(三) 依存型经济 (2010 至今)

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HKG/Year/1997/Summarytext>

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23&locations=HK&start=1960>

⁶ 数据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https://www.censtatd.gov.hk/tc/press_release_detail.html?id=-3914，
https://www.censtatd.gov.hk/tc/press_release_detail.html?id=2859

自 2010 年以来，随着内地经济体量的迅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深化，香港的经济角色逐渐转化为依存性平台。面对 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和后续全球金融危机，香港与内地经济的“绑定”更加深入。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地经济开始成为香港的活水源头，香港享受到内地的“增长红利”。2010 年香港的实际 GDP 增长率达到 6.8%⁷，显示出经济的复苏。此后实施的沪港通、深港通、“一带一路”等相关投资机制更加深了其于内地资本市场的依存关系。一方面，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融资与国际化平台，承载着离岸金融与法律服务功能；另一方面，香港自身也更加依赖于内地资本、企业和市场的活力。这种逐渐被内地经济所吸附的模式也使香港对内地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更高的结构性依赖。随着内地经济增速放缓，香港的经济增长也自然受到影响。

（四）本地化服务型经济

不同于前三种以外向功能为主、具有明显阶段性的经济形态，香港的本地服务型经济从香港经济起飞就开始发展，与其他经济板块长期并行壮大长期并行发展，构成了香港作为超级城市社会运作的基本面支撑。从统计口径上看，服务业一直是香港经济的主导。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⁸，2022 年服务业占香港 GDP 比重高达 93%，其中金融、保险、地产及商业服务板块贡献约三成，体现出其高度依赖金融与地产主导型服务经济结构。

在就业方面，2021 年香港整体就业人口中，服务业占比超过 88%，其中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教育、医疗等行业合计提供超过 170 万个职位，构成城市日常运转的基础。地产、零售、教育、医疗、旅游、养老及专业服务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不仅维系着本地财政与就业，也在特定历史阶段实现了由“非贸易部门”向“可贸易服务”转化的功能跃迁。例如，地产行业一度是香港本地经济的支柱，除形成稳固的财政来源外，还承担跨境资本运作平台的功能。多家香港地产巨头（如恒基、新鸿基等）在内地广泛布局，主导多个城市开发项目。

随着前面三大板块的走弱，香港服务型经济这一板块虽仍具支撑性功能，但其增长潜力近年来受到挑战。传统支柱如旅游、零售、餐饮等行业受到疫情与社会不确定性等事件的较大冲击。2021 年起内地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带动香港地产金融板块估值与投资信心下滑。2023 年香港私人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约 7.5%，创近七年新低。2023 年港股全年下跌 13.8%，为 2011 年以来最差表现，外资持续流出，部分美资银行和投行机构缩减在港业务规模。

⁷ 数据来源，香港金融管理局：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publications-and-research/annual-report/2010/08_economic.pdf

⁸ 数据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br.html?ecode=B10300042023QQ04&scode=250#:~:text=%E4%B9%A5%E5%9F%BA%E6%9C%AC%E5%83%B9%E6%A0%BC%E8%A8%88%E7%AE%97%EF%BC%8C%E6%89%80%E6%9C%89,%E6%9C%8D%E5%8B%99%E6%A5%AD%EF%BC%88.5%25%EF%BC%89%E3%80%82>

即便如此，经历多年沉淀，香港在国际化大都市型服务业方面仍具有优势。例如，高等教育与科技研发仍是最具潜力的领域。香港 8 所政府资助大学中，理工、港大、中大、科大在全球排名显著提升，其基础研究实力与国际科研网络构成未来香港高端服务业升级的支点。又如，香港“银发经济”显现出外溢效应，2022 年粤港合作养老项目数量同比增长近 60%，香港康养（乐龄）产业已向珠三角扩展，形成区域性服务输出趋势。

（五）增长极动能耗散的风险

在全球脱钩趋势下，香港过去依托海外资源的“飞地经济”与“桥头堡模式”积累的资本优势正逐步减退；同时，随着本土经济化和服务化比重也越来越大，其对内地经济的依存度上升，与内地城市的经济同构明显，都使得香港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失去独特性和竞争力。在 2018 年前后，香港 GDP 被深圳首次超越，随后又被广州赶上⁹，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增长动能“多源化”格局确立，香港曾具有的“唯一增长极”地位已成历史，正变成区域中的补充型、协同型节点。

在当前态势下，随着制度差异红利的逐步消退，香港非但无法再造增长极地位，甚至在大湾区制度协同过程中会面临再边缘化风险。郑永年教授多次提到香港“孤岛化”风险¹⁰，即美国等西方国家自 2020 年以来在香港问题上给香港贴上“内地化”标签，令一些西方资本及精英人才撤出香港，故香港在这方面“要有危机感”，也更需要“带着内地一起开放，走向世界”。

香港若希望重塑其区域增长极角色，首先须突破单一城市经济逻辑，嵌入湾区整体协同规划与战略设计之中。而其未来的竞争力，更多取决于能否从自身内部将现有本地服务经济向差异化、高附加值、可外溢、能跨境协同的方向极化再造——特别是在科技金融、专业服务、教育与健康等领域。香港未来再造大湾区增长极的背后，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粤港合作的既有路径，深入分析其内在逻辑与演进模式，以探索更加契合现实的政策范式。

三、粤港区域合作模式与跨境一体化的局限

一个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机制是由增长极及其辐射扩散效应构成的。香港作为增长极在大湾区中的辐射扩散作用和其他城市的虹吸反馈是靠香港、澳门与珠三角的联系、互动和合作发展推动的。与香港经济结构中各板块相关联，粤港澳合作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呈现出多种模式的并行演进。

⁹ 香港商报网，香港 GDP 或很快被广州超越：https://www.hkcd.com.hk/content/2019-02/27/content_1125850.html

¹⁰ 大湾区评论，《明报》专访郑永年：港规输出湾区，领内地接轨国际 | 全球湾区观察，<https://news.qq.com/rain/a/20250401A09QEU00>

迄今我们可以识别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粤港区域合作模式，分别为：引进模式、交易模式、对接模式和随着区域一体化加深而新兴的共创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从要素流动逐渐涉及制度建构的市场逻辑演进，也反映出了政策工具从外源吸纳向内生协同的功能重心转型。

在模式演进的背后，可以发现跨境一体化战略是迄今为止粤港澳大湾区所采取的主要区域发展范式，而正是此一曾经非常成功的战略范式，现在却越来越遇到了增长的“天花板”。

（一）引进模式：资本北上与产业转移的早期融合

从1980年代至21世纪初，来自香港的港资、侨资等资本“北上”投资，推动珠三角及沿海地区形成出口导向型产业集群。在这一阶段，资本、技术与企业管理理念由香港流入内地，促成以“飞地经济”与“跳板经济”为支撑的区域分工格局。内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税收优惠与要素配置引导，成为香港制造业外溢的重要承接地，实现了“以资引产、以产促融”的初步一体化形态。

这一区域合作模式的核心在于经济互补与产业分工，但其主要建立在制度差异的基础之上，缺乏制度层面的深度融合，对区域治理协同的作用相对有限。随着中国市场逐步对全球资本全面开放，香港所特有的资本进入优势逐渐弱化，该合作路径也逐步式微，成为历史性阶段的成果而非持续性的机制。

（二）交易模式：互惠协定驱动的市场融合机制

1997年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合作开始进入制度化推进阶段，合作重点从单纯的资本引进扩展到商品流通与服务贸易。该模式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代表，推动区域一体化迈入“协定驱动、市场导向”的新阶段。通过“准入换互认”、“服务换市场”等机制安排，香港商品、资本与服务得以加速进入内地市场，同时内地也吸引更多香港企业与金融资源，加深了与广东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经贸联系与要素融合。

在此框架下，香港产业链和服务业体系获得了向内地延展的制度通道，进一步稳固其在大湾区中的中介角色。交易模式强调双边协商、利益互惠，是典型的国家层面规则型区域合作机制。然而，随着内地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CEPA等协定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该合作模式的影响力已不再处于主导地位，其制度整合作用也受到协定结构和单向开放逻辑的限制。

（三）对接模式：制度兼容与标准迁移的主导范式

自 2015 年以来，随着香港服务贸易及本地高端服务业逐步向内地扩展，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在政策战略上进入以“规则对接、制度兼容”为特征的新阶段。该模式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引入香港在金融、医疗、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成熟规则，推动内地特别是广东珠三角地区在制度层面实现对接式国际化。

如郑永年所言¹¹，香港长期实践的制度体系本身已具备高度国际通行性，与其对接，实际上是“以港接外”，绕过复杂的制度引进与再造过程，能够实现“低成本国际化”。他提出的“香港+”模式，即在香港规则基础上做加法，将香港制度嵌入内地关键领域，如互联网、新能源、社会治理等，成为中央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接口。

政策实践方面，伴随横琴、前海、河套等先导平台的设立，大湾区出现一批试点性区域，推动金融准入、法律服务、知识产权等重点制度“点对点”复制香港标准，形成“单边开放”与“局部先行”的政策路径。这些平台多以珠三角领先城市为主导，如深圳、珠海、广州等，成为大湾区目前最活跃的制度对接实践区。

对接模式在当前阶段仍处于主导地位，各地纷纷提出“制度型开放”，强调与香港在规制、标准、认证、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深度对接。如肖耿教授提出的“双总部”构想是典型的对接模式延伸形态，即企业在香港与内地分别设立国际与本土运营中心，实现制度耦合与产业融合的协同效应。尽管对接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但其核心机制仍以内地单方面接轨香港标准为主，存在标准输入主导、缺乏双向协商和区域治理整合等局限。若缺乏共建共治的根本性制度安排，该模式将难以持续扩展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阶段。

（四）目前跨境一体化战略范式之局限

实际上，以上三种合作模式都属于区域一体化的战略范式，随着粤港合作从物质层面、技术层面、经济层面等开始进入制度和理念等更深层次，跨境一体化战略开始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天花板”。现行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在大湾区的实践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1. 制度完全对接一体化之不可能性造成的边际成本上升

经历了多年的向香港学习和对接，珠三角在诸多方面已经学到不少东西，许多做法与香港一致。学习过程也由浅层次容易的部分到深层次困难的部分，即能改的和学的都已经学到，而难改的和难学的部分涉及许多制度性、根本性、系统性的社会差异，连形式上模仿的可能性都较低。随着一体化的推进，制度学习的复杂性和难度加大，成本也越来越高。这背后的道理，

¹¹ IPP 评论，观点集锦 | 郑永年：应对“特朗普冲击”，需要保持战略定力，https://mp.weixin.qq.com/s/rTqDm_vSCtdPsgGfGkv-EQ

则是制度变革理论中的“制度互补性”原理¹²，即不同制度安排之间存在耦合效应，制度移植若脱离原有制度组合常导致功能失效。改变一个制度，就要相应改变许多其他制度，最后整个制度系统发生根本变化。这意味着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框架内，至少短期内实现完全的制度一体化之不可能。每种制度系统内在的互补性是大湾区跨境一体化战略目前很难再推进的理论原因。

2.一体化对接的边际效益递减

一方面，内地经历多年改革开放，与国际社会已经建立了直接而多样的联系。许多做法、制度、规制等已经可直接从外部取得，无需再“绕道”香港。另一方面，虽然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在制度领域与内地的差异依然存在，但由于其作为增长极的地位随着区域发展的匀质化反而不断下降，作为“标杆的光环”早已褪去，在众多领域内地的规制制度甚至显得比香港更先进，这都使得珠三角在制度上对接香港的积极性较以前减低。由于制度学习的边际效益递减、事倍功半，造成制度学习的刺激不足。

3.低水平一体化显现，高水平一体化缺乏

在许多领域（特别是科创、文教等）其实需要更高水平的区域一体化，但这也对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和管理等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政策制定者掌握新的较专业知识和方法工具。建立在新的知识和方法基础上的新一体化战略和新政策需要高水平的政策制定能力，而这些专业政策能力需要一段时间培养才能获得。目前大湾区仍缺少高水平一体化的政策设计和管理知识、行政能力。

总之，在粤港澳大湾区制对接已经展开、区域发展增长极已经多源化的背景下，传统的以单向规则迁移为特征的对接模式正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结构性局限，亟需重新思考一体化战略的正负两面效应和不同水平层级的逻辑并产生新的合作机制。

（五）共创模式：双方融为一体、推进增量改革的新探索

在“一国两制”结构性宏观约束下，一体化进程将难以在存量制度上完成香港与珠三角的全盘整合，所以应以制度“协同设计和创造”取代制度“单向导入或对接”，以共同创新的政策增量作为大湾区一体化战略的创新路径。在此，我们提出“共创式一体化”模式作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在特定产业领域合作的主导模式设计。

¹² 制度互补性理论，由奥本大学教授安德鲁·科特（Andrew Cortell）等学者提出，来自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是指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及相互调适和嫁接的空间。

此共创模式强调粤港澳三地基于平等协商的制度共建与标准制定，是超越“规则输入—制度兼容”逻辑、迈向“制度共建—责任共担”的协同治理新范式。在这一模式中，区域规则不再是某一方的制度复制品，而是多元主体博弈与合作下的“共同产出”，是新规制的创造；治理机制也不再依赖中央主导或某个地方试点，而应构建真正的、覆盖整个大湾区的多边参与和稳定协商机制，甚至是行政框架。

当前，“共创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在多个领域已显示出实践潜力，尤其适用于以下四类合作机制构建：

第一，政策共策与制度共制：三地应在前期即共同参与制度设计、政策起草与实施机制讨论，突破以往“复制—适用”路径，形成战略融合导向的制度安排，真正实现从政策与决策源头的一体化。

第二，协同治理平台构建：从中长期来看，应设立跨区域常设治理机构，如“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委员会”或“共创事务秘书处”，作为制度谈判、政策协商与项目推进的组织基础，替代当前碎片化推进模式。

第三，区域试验与平台创新：在全面铺开前，可选择特定行政区块（如南沙、横琴、前海等）与港澳进行制度共建实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行经验。

第四，领域突破与功能嵌入：优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共创合作（详见下文第四部分）。该领域政治敏感性较低、协作基础较强，具备从制度共建到产业对接的完整路径，可作为“共创模式”的先导与突破口，打造以协同研发、知识产权共管、跨境创新平台共建为核心的一体化样板。

“共创式一体化”不仅能提供制度协调的未来方向，也可能成为粤港澳区域合作由制度对接走向制度共创的关键路径，能为中国式区域一体化积累制度性经验，提升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四、高水平一体化战略：基于共创模式的大湾区科创政策设计

科技创新领域具有政治敏感性低、合作基础坚实、人才流动频繁等特征，是制定高水平一体化新战略、推动制度共建与规则共创的理想切入点。我们建议以体制创新为抓手，重新设计区域科技政策总体框架，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一个全新的专业执行机构，作为行政主体负责制定与实施创新一体化政策，确立战略目标，构建高度融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产业超级集群。

（一）顶层设计：构建推动区域科技融合的核心执行机制

1.行政架构建议：建立实体化的专业管理机构

建议中央设立一个派驻地方的科技创新专业行政实体，解决目前政策执行主体缺位的问题。该机构应直属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门，直接向中央报告，专责统筹粤港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新兴产业培育工作。机构人员可由中央、广东、珠三角与港澳相关政府部门抽调或公开招聘。

在发展阶段上，初期以咨询与规划为主；中期作为协调平台，推动三地政策协同；长期则整合三地科技管理部门，最终发展为粤港澳科技创新政策的统筹机构。这一演进路径类似欧盟的机构发展逻辑：由专业联合体逐步走向统一立法与行政体系，最终构建共同治理结构，为粤港澳区域治理一体化奠定制度基础。

2.地域覆盖建议：设立“创新试验特区”

建议该机构在初期聚焦最具创新潜力的区域，统筹珠三角内已有的国家级合作试验区（河套、前海、南沙、横琴），加上东莞滨海湾新区、香港北部都会区、科技走廊与澳门部分片区，作为政策“试验田”。

通过统一规划、资源聚合、项目合作、经验互鉴等方式，推动上述片区政策协同、机制融合，重点探索包括科技创新、产业集群、全球人才引进、金融科技及数字统一市场在内的创新举措，为打造世界级科创中心构建中坚力量。

3.职能设计建议：整合创新链条政策

建议该机构专注于围绕创新链上下游制定政策，涵盖基础研究、技术转化、科技金融支持，以及教育人才、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等关键创新要素。机构将统筹原各片区科技管理职能，研判并制定大湾区科技与新兴产业发展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一体化协同，实现政策系统化、转化路径明确化，率先在关键领域实现新质生产力转化。

（二）对该专业执行机构运作的具体措施建议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创新政策主体，这一专业执行机构设立后，将作为大湾区科技创新领域的总体协调政策机构，承担大量职责和工作。其能做的事情非常多，政策创新的空间也很大。现列举若干建议措施如下：

1.借鉴国内外经验，构建新型区域创新政策体系

参考欧盟“智慧专精战略（S3）”、美国区域创新集群政策、日本“产学官金”协同机制等国际经验，结合粤港澳地区制度异质性与区域间发展不均的现实情况，构建具备战略性、适应性和落地性的区域创新政策体系。

例如，可根据各片区产业基础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在前海聚焦金融科技、在横琴发展中医药与康养技术、在南沙打造智能制造试验区、在河套聚焦 AI 与信息科技，逐步构建功能互补、系统协同的创新政策布局。

2.通过组织专业培训，为粤港澳大湾区培养科技创新政策管理人才

该专业执行机构可联合粤港澳三地高校设立“科技创新政策研究与培训中心”，系统开展干部培训工作。课程内容可借鉴国际一流管理学院，如哈佛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等在创新管理领域的教学体系，围绕全球创新趋势、战略制定、价值链升级、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空间规划与政策工具等模块进行设计。

通过集中培训与实战模拟相结合的方式，帮助政府主管部门及政策制定者全面掌握现代技术创新与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将其应用于大湾区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制定与执行。该举措将有效提升区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打造一支具备系统性思维和全球视野的科技创新政策与公共管理骨干队伍，为大湾区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与人才支撑。

3.吸收国际专家智慧，一体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区域科技创新规划应坚持“产业导向”与“空间优化”并重。一方面，需紧扣产业链发展脉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学设计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集群形态，对标美国硅谷、日本筑波、欧盟 EIT 等全球典范，打造具全球竞争力的湾区产业生态。

另一方面，规划需注重创新活动的空间布局，解决现有资源错配、功能重叠和细分方向重复等问题。港澳地区可借鉴珠三角在项目落地、政策配套和生态营造方面的成功经验，推动多层次治理体系下的创新生态优化。

为实现科学规划，该执行机构应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政策国际委员会”，邀请国际科技政策专家担任顾问，参与发展战略制定与政策评估，提供全球前沿经验与资源支撑。委员会同时可面向湾区企业，提供技术顾问服务与政策导航，协助提升管理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政府亦可设立专项资金，资助企业聘请国际专业团队开展“诊断+咨询”，推动区域科技政策与产业实践深度对接。

4.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向世界水平跃升

可专门设立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自然科学基金，融合广东和香港的资金，吸纳世界顶级科学家加入其科学委员会，资助粤港澳大湾区在基础科研方面的短板项目。且项目可重点鼓励粤港澳大湾区跨珠三角和港澳的联合申请。这个区域级的自然科学基金会可以参照国家级的基金会如美国科学基金、欧盟研究基金（即欧洲研究委员会）或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的运作模式，这将大大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科学界的整体声望和信誉。

5. 积聚创新资源，推动粤港澳联合建设一批大型研发机构和各种“创新平台”

为有效集聚创新资源，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新兴产业，建议由该专业执行机构牵头，联合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同建设一批大型工业研究院或应用技术开发院，专注于未来关键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孵化。这些机构可借鉴日本 AIST、韩国 ETRI、台湾工研院等国际经验，成为整合区域资源、推动技术追赶和战略突破的重要平台。

依托此类机构，可设立“粤港澳研发框架计划”，将三地经过论证的重大项目统一纳入管理，通过公开招标或定向委托方式，吸引全球顶尖团队参与，推动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同时，应着力打造完整的创新平台生态，涵盖初创企业孵化器、风险投资基金、专业服务机构（如会计所、律所、培训公司）、检验检测与计量认证平台等，为科技创新提供全链条支撑。尤其应推动设立跨区域联合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中试服务基地，鼓励来自粤、港、澳不同地区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建设，实现科研成果的规模化转化与工程化落地，为大湾区新兴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供给和创新动能。

6. 加强粤港澳内部各片区的合作和交流，同时扩展广泛国际联系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日益发达，现有的香港北部都会区、深圳前海、河套地区、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等在地域上的技术、信息等的集聚与沟通正越发频繁紧密，形成超级创新网络。特别以深圳河套地区和香港落马洲地区的深港创新合作区地理上本就相连，具有融合创新、资源集聚的天然趋势，善加利用，很快就能整合为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创新空间。

可组织所覆盖的各片区多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互动，推动粤港澳科技创新、新兴产业领域的人员之间交往合作、建立长久联系。从正式的关系如联合研究、出版、联合专利、许可、科研合同，到各种非正式的关系，如会议、研讨、研究员与研究生的实习、科学委员会、培训、咨询及其他各种非正式的联系，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予以编织组织。在这方面，应学习香

港科创体系中广泛利用各种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专业协会、工商会等的作用，并与国际研发技术界广泛联系。

7. 设立一个大湾区的联合创新基金，大力发展大湾区的科技金融体系

运用香港的专业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现有股权投资平台的资源与经验，牵头联合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国有企业资本，来自香港、澳门的境外资金，以及珠三角社会资本所组成的超大体量混合型创新创业投资基金，为大湾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充足资本来源。

以欧洲投资银行集团的欧洲投资基金（EIF）的模式为例，为中小企业创业、增长、创新、研发提供资金，在促进欧洲一体化和推进欧盟政策方面将全体欧盟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欧洲投资基金的股东包括欧洲投资银行（占 59.15%）、欧盟执委会代表（占 30.00%）和 34 家欧盟民间金融机构（占 10.85%）。该基金通过民营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创业投资和担保贷款。

大湾区未来的联合基金应充分发挥香港金融体系的独特优势，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跨境融资方面的低成本、高效率优势，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跨境贸易资金自由流动，从而有利于境外资本畅通涌入大湾区。同时，发展涵盖新三板、创业板、中小板，并实现粤港澳多地联动互通的科技资本市场体系，以及服务于广大中小创新企业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银行体系等。

五、香港战略：再造大湾区增长极的定位思路

与全球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性在于其内部存在显著的制度性“跨境”差异，涉及法律、行政、社会治理与经济体系等多个层面。这种制度差异化的格局，一方面给区域协作带来结构性挑战；但另一方面，如善加利用，也能形成基于制度差异的“跨境优势”。

依托香港这一强大增长极，并利用制度差异形成的跨境一体化与互动合作，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过去 40 多年的内生发展动力，也使其成为全球罕有的多制度区域一体化成功的实验场。

然而时过境迁，大湾区的“跨境优势”渐弱，对香港而言，夹在中间两头都不到岸的“跨境陷阱”风险渐增。深层原因，在于随着香港作为区域增长极的动能逐步下降，以及传统“对接式”一体化等合作模式的边际效益因区内的均衡化而递减，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内生发展动力机制正失去活力。

从重新制定区域内生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当务之急有两个：一是推动香港重新激活作为区域增长极的功能、产生极化效应，通过战略再定位增强其经济竞争力与制度影响力；二是探索在制度差异长期存在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具备协商基础与共建能力的新型跨境合作机制，从而

形成持续稳定的区域发展内生动力机制。增长极的极化建设和其扩散合作模式，这是大湾区内生动力机制重构的一体两面。

在增长动力源方面，香港应采取差异化策略，重新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中的超级增长极。在全球化退潮且与内地已有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香港已经难以再回到传统的国际中介职能定位，且正变得与内地城市同质化，甚至受到内地增长极的“反哺”。这种情况下，香港欲重获增长极地位就必须采取差异化策略，令自己再次“与众不同”。

所谓“极化”，其实就是特殊化和集群化。香港应在仍具比较优势的领域（如教育、科创、金融等）中规划独特的核心产业，并为每一项产业，量身设计与大湾区相匹配的合作模式与产业政策，从而推动其极化发展。在这方面，国际化仍然是令香港特殊的重要变量。香港特区政府应牵头引入国际智库资源和全球顶级咨询机构，在整个湾区范围内开展系统性战略评估和场景预测，为未来的集群功能布局与产业政策重构提供技术支撑和路径建议。

在增长动力机制方面，香港连同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应采取高水平一体化策略，升级区域内现有的合作互动模式，以重获“跨境优势”。一体化不应成为发展目标，而是发展工具，且仅是工具之一。应以“多模式并举、精准适配”为原则，针对不同的行业、领域、部门和地域范围量身订做粤港澳合作模式，在区域层面形成包括制度型一体化、共创式一体化、管理一体化、协同式一体化，甚至可协调的差异化等多种机制的战略组合体系，避免仓促上马“一刀切”式的对接融合一体化做法。例如，在商品贸易与服务业领域，可继续深化“交易式”合作模式，通过协定机制推动市场准入便利化与双边互利机制。

而在涉及人员流动、执业资格、社会保障衔接等民生相关领域，应强化“对接式”政策安排，通过规则兼容、互认机制以及边界治理实验，逐步实现制度磨合和治理协同。

在科技创新、数据治理、金融监管、法治合作等制度密集型与战略敏感型领域，应提升一体化安排，突破现行体制，率先推进“共创式”合作模式，通过设立联合机制、联合立法平台或专责协调机构，推动区域制度的共建共治。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制度供给能力，也将带动三地治理范式的协同转型，为更高水平的一体化破局开路。

从中长期来看，“共创式一体化”不仅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整合的重要方向，更有望引领整个区域治理体系实现从分散协作向制度一体的战略跃迁。采取这一模式本身，既是对未来治理架构的先行建构，也是中国推进制度型区域一体化的前瞻性实验。

目前，大湾区跨境合作的新模式，特别是共创式、制度型一体化，应匹配相应的地域实施范围，制定明确的政策工具包和治理机构配置建议等。例如，不同的合作模式可在河套、前海、

横琴、南沙、北部都会区等特定区域率先部署，形成“制度飞地”或“政策试验区”联动机制，促进局部突破与经验外溢。这实际上是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多个能与香港联动的内生发展动力增长极。

【化危为机：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当城市从“建设时代”迈入“运营时代”

林辉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广东省“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专家智库专家委员

李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导语：

如今，中国的城市建设已经逐渐从“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在上一轮设施建设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部分城市眼下面临着设施维护资金短缺、运维机制滞后等挑战，高速建设与长效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继而引发基础设施老化、城市设施供需错配、地方财政压力过大等问题。对当前中国城市，尤其是超大型城市而言，“城市运营”的意义正不断凸显。

IPP 研究员林辉煌与副研究员李婷撰文指出，我国设施建设已经相对饱和，现有设施运营的矛盾是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在耕地保护的刚性任务面前，城市扩张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因此我们应该迈入到城市运营时代。当前，许多城市设施存在运营成本高企，甚至超负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开启新的建设时，充分从运营角度考虑，尤其要引入“设施全生命周期运营”的理念。

“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营”，是城市有序发展要处理的一对主要关系。“重建设，轻运营”的问题长期存在于各个区域和各个领域。通过对一些区块的调研，我们预感到，如果不能处理好城市建设和运营的关系，中国城市可能会出现“运营危机”，这是值得警惕的。在我们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了城市运营时代，城市发展体制必须从以“建设为主”的体制，进入到以“运营为主”的体制。

“运营危机”

城市是由设施组成的，“城市运营”实际上就是设施的系统化运营。从所有制形式来看，设施可以分为公建设施（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等建设的相关设施）和私建设施（写字楼等）。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当前都存在运营成本高企，甚至超负荷的问题。在公建设施方面，比如道路交通、城市花园广场、医院等，建设成本高，运营成本更高，但收益非常有限。公建设施根据收益情况，可以分为无收益空间和有收益空间。某超大城市中，作为“会客大厅”的重点城市花园广场，基本没有收益空间：50多万方的面积，建设成本超10亿元（2010年的数据），每年的运维的动态成本达到1.8亿元，以30年为周期，运维成本达54个亿。从设施的全生命周期看，越到后期运维成本越高，30年期的成本甚至可能超过60亿元。某城市由城投建设的地标建筑，2010年左右的投资额度是33亿元，其中70%为银行贷款，仅利息就有1.3亿元/年，折算成每日利息支出就是35万元，加上每天人工、水电、设备维护等总计20多万元的支出，每天的支出就达到60万，每年的运维成本达到2亿元。其收入主要依赖广告和门票收入等，年收益只有不到8000万。这些缺口最后都需要财政兜底。

由此，就可以窥见一个城市运转的巨大成本了。当然，公建设施往往服务于私建设施的功能和价值实现。而私建设施的建设和有效运营，常常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回过头来为公建设施提供更多资源，实现良性循环。问题是，当前大量私建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成本极高，但是运营收益却在不断下降。房地产自不用多说，大量写字楼的情况也堪忧。出现这一问题不仅是因为供给过剩，还因为对设施运营的成本缺乏预期。提高容积率是上一轮城市建设的典型特点，但这也导致了超大型超高商住设施的涌现，随之而来的是其复杂的运营难题。而超高建筑的运维成本极高，仅仅是玻璃幕墙维护一项就要耗费大量资金。

以某一线城市4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为例，仅玻璃幕墙建设就要大约5亿元。维护费用也极高：每年的强制性检查费用按照地标是300多万元/年，日常维护支出包括低模量密封胶维护、玻璃破损更换及清洗等支出。因涉及高空作业，更换一块玻璃的成本是5000元（按行业水平来看每年至少需要更换12块），完成一次清洗的成本高达1000多万（一年至少清洗四次）。

钢结构维护的支出也非常大。某超大型展览中心每年要用 4000 多万元来维修钢结构。楼层越高，一般相应的运维成本越高，一些造型上比较奇葩的建筑因空间不规则，相关成本更高。另外，供给过剩会导致出租率不断下降。许多企业为了降本，从高租金设施转移到相对低租金设施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楼体（包括超高楼体）不得不降低租金并压缩运维成本。但压缩运维成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周期性的设施维护频率下降，导致设施老化和破损速度加快。一个长期从事设施运营的专家告诉我们：周期性相对频繁的清洗和检修对设施维护极为重要。尽早发现并及时解决问题，能够避免局部小问题对设施主体结构的侵蚀。一旦主体结构被侵蚀，设施修复成本将超过周期性维护成本，而且整体面貌和营收也会受到巨大影响。这跟很多人在老家建的新房，因为长期缺乏维护而快速老化是一个道理。基于这一点，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大量私有高层设施老化速度加快。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设施需求增长速度追赶不上，那么很多楼体就可能会加速进入“老年期”。而新设施的不断建设还会加快这一进程。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大量公建设施因税收增长有限，财政对其运维的资金投入逐渐缩减，也会加速公建设施的老化。

上述案例仅代表核心区的状况，当我们将视野转移到城市边缘区时，情况更加糟糕。与核心区不同，大城市边缘区为提升招商引资的能力，常常必须超前建设公共设施。其中，仅仅地铁等交通设置的投入就是巨大的。但其收益实际上却非常有限，基本上都是亏钱的，维护成本也非常高。医院等公共设施建设也是类似的情况。由于收益有限，维护投入能力有限，因此城市边缘区的设施通常会比城市中心区老化得更快。

以我们调研的 D 区为例：核心区三甲医院在该区建设了一个新院区，建设成本为 30 亿（包括少量设备），若要全面运营起来还需投入大量设备、人员等。此外，需要政府投入的地方还有不少，比如为了吸引年轻人，解决年轻人的生活配套问题，地方政府立项建设一个综合性的体育馆，建设成本大约为 1.4 亿，但是运维成本保底要 800 万。然而，所在街道的实际人口不到 5 万，所在区的人口也不到 100 万，运营收入增长与投入难以匹配设施老化速度。

眼下，大量公建设施闲置的情况普遍发生。即使这些公建投入带来了新的企业入驻，地方政府在税收方面让利加持，新的私建设施入场后，一时也支撑不起现有超前建设的公建设施运营。而且，由于结构性“供需错配”的原因，更多的设施建设需求反而被催生出来。例如：“大交通”建成后，往往需配套内部“小交通”建设；某些先进制造企业对电力稳定的严苛要求，也需要对电力设备的额外投入。短期内大量的公建项目的建设，意味着大量财政资金的投入，进而必然挤压后续的运维资金投入。更大的问题在于，一个设施建设后尚未运营，同类项目建

设又开启了，导致前序项目运营资金难以跟进。大量项目同步推进还衍生出建设冲突问题，引发项目延期与运营缺位。以道路建设为例，该区很多道路目前处于运营缺位的状态，主因是不少道路建设仍未完成验收，部分甚至延迟了好几年。某些地段，因为涉及管线迁改的问题没法验收，而这与其他项目建设和缺乏统筹相关——政府因为开启项目太多而无暇顾及，或推进的效率不高；项目建设过快，导致管线调查不充分，进一步加剧此类问题。

没有验收，就意味着政府不会进场开启运维，常常要等待验收过了保质期后才开始介入。在此期间，道路虽然没有验收，但其中一部分已经投入使用。尤其是改造类项目，经常形成“边使用边建设”的局面，易引发建设和安全问题。建设方因为建设和交期、资金回收压力大等问题，往往无力或者无意处理，导致运维出现“空档期”。这对设施的损耗也是非常大的。这样的问题正在各大城市的边缘区普遍发生。

相较于核心区，边缘区的问题在于：在缺乏产业基础的情况下，公建设施超前于私建设施，其运营无法靠私建设施反哺，长期依赖政府财政资金。

边缘区的财政资源本就有限，加之用于大项目落地的地块较多，相关的建设和配套投入规模庞大，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紧张问题，导致运营投入被压缩。在私有设施建设和运营方面，边缘区不仅要面临核心区的虹吸，还要和其他边缘区竞争。私建设施的运营也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况，写字楼与产业园空置率高的情况十分普遍。相关配套因为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同时开启的建设过多，运营效率也不高。

为什么会出现运营问题？

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城市建设的速度太快了，城市运营体系难以及时跟进。这也是赶超型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第二，城市建设面铺得太大，且过于分散。区域经济增长压力过大、区域竞争“过热化”，导致城市建设正在从“连片渐进”建设模式转向跨越式、“遍地开花”的模式。相较于运营，建设对区域经济指标增长的效果更加直接。而运营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效果不那么明显。另外，地方领导干部的频繁更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既有建设背后往往代表着前任领导干部的政绩，存在着复杂的既得利益；对继任领导干部来说，开启新地盘、进行新建设的时间成本小且政绩收益大，也导致一些地方的建设摊子越铺越大。

第三，对于运营成本和规律的认识不足，不够重视，导致建设和运营分离。在公有设施建设过程中，运营和维护从制度层面上并没有被充分考虑。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项目建设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往往没有将运营成本纳入其中。一些公建项目在需要后续专项资金跟进时，其申请方式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奉行“不举不纠”的原则，等出了问题才补救，而非遵循日常维护的规律。此外，有些公建项目为了实现收支资金平衡，往往会夸大运营收入，刻意压低成本核算。况且，在大部分情况下，由于建设主体和运维主体是分离的，建设者并不考虑运维问题。许多项目主要依靠财政资金兜底，总是试图通过未来的财政资金投入来解决，没有将运维成本充分纳入到当前财政资金总盘子分配的考量中。在私有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商业地产，大多采取“高杠杆、高周转、高负债”的“三高”商业模式，导致速度压倒一切，盈利主要依赖资产升值而不是运营收益。一些房地产企业总是试图通过新的建设来解决原有建设的问题，也无心考虑运营的问题。从运营的角度看，因为供给过剩和精力有限等问题，新的建设反倒会加剧既有设施运营的难度。

建立以“运营为主”的城市发展体制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开启新的建设时，充分从运营角度考虑，尤其是要引入设施“全生命周期运营”的理念。设施运维长期性的高成本，要求对存量的产业发展和空间需求进行合理的分配。因为设施运营是需要产业支撑的，只有这样才会有相关资源不断被投入运维。这是城市建设和设施供给要充分考虑的问题。对公有建设而言，要落实建设者的运维责任，倒逼其将运维纳入建设中。私有建设方面，则要避免地产企业将设施建设视作资本增值的工具，令其真正潜心投入到设施运营中。

从城市发展的周期来看，我国设施建设已经相对饱和。在耕地保护的刚性任务面前，城市扩张的空间也已经十分有限。现有的城市设施运营已经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应该逐渐迈入到“城市运营时代”。这意味着，城市发展的体制也要进行转变——从以“建设为主”的思路转变为以“运营为主”的思路。这就不仅仅要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设施运营的因素，更是要重构整个城市资源配置的逻辑：主要资源和主要项目应当用于城市运营，而不是新的项目建设；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不应该是经济指标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设施建设的重要推手），而应该是运营效率的提升。

【化危为机：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高技能人才，从何而来

张若梅 广东省委党校科研处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广东新质生产力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导语：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制造强国”的建设也要求培育和应用大批高技能人才，推动创新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支撑动力。但是，当前我国面临着高技能人才总量不足、培养体系严重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等结构性失衡问题。这些问题已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亦制定和推出了一系列优化高技能人才发展生态的举措。

文章认为，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落后，有着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迅猛爆发，从理念到实践挑战了此前工业社会背景下流水线上劳动分工、单一知识结构主导生产制造的模式，激发了对于拥有复合型知识背景的高技能人才的强烈需求，而我国的高技能人才建设体系则存在培育理念滞后、产业政策同质和企业创新乏力等结构性问题。对此，我们需要持续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有针对性地做出一系列改革，优化高技能人才发展生态。

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目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亟须通过大规模培养来加以解决，以满足建设制造强国的需求。

一方面，高技能人才队伍存在极大的现实缺口，既难以成为推动现有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动力，又不足以支撑先进制造和未来产业的战略布局。据相关数据测算，我国目前高级技工占产业工人比例仅为5%左右，缺口近1000万人。预计到2025年，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力装备领域的人才缺口将分别达400万、950万和900万人¹。人社部公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冶炼工程技术人员、铸造工、金属热处理工等岗位纷纷上榜，其中钢筋工、机修钳工、纺织染色工等岗位的短缺程度持续加剧。即便是广州这类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也同样面临高级技工严重不足的窘境。据广州市人社局此前公布的数据，与生产制造相关的技术工人、化工生产工程技术人员、电工、车工等都进入了“2023年第一季度广州需求大于求职‘最缺工’的30个职业排行”。这种状况与我国制造强国、广州市制造强市建设的战略目标相去甚远，需要通过有力的政策革新加以改变。

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结构性问题突出，供给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其实，目前职业教育及高等教育阶段所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在数量上并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已经“过剩”——人社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5000万人；整个“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高技能人才超过1000万人。2022年的数据表明：传统的制造业强省广东，全省148所技工院校在校生63.4万人，2019—2021年全省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415万人次；而广州市技能人才总量达353万人，新增78万人；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23.8万人，新增高技能人才31.4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总量35.07%。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是会出现“技工荒”的问题呢？我们认为，技能短缺、技能过时和领域错配是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指出的：“如今的全球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技术驱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个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的时代，大多数劳动人员都要拥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来进行生产转型。”目前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很难给予学生契合产业升级发展、市场迅速变化的知识和技能，正因如此，才导致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错配，并引发技能人才的结构性失业的难题。

亟需大力优化高技能人才发展生态

¹ 王鹤峰,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政策研究[EB/OL],2021-02-01:<https://promote.caixin.com/2021-03-31/101682864.html>

高技能人才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现阶段高技能人才供需失衡中暴露出种种问题，本质上是几十年间在相关领域存在培育理念滞后、产业政策同质、企业创新乏力这三重不足。三者共同塑造了现有的矛盾和困境。

（一）培育理念滞后，不足以培养出引领技术突破和推进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我国在相关领域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理念，既滞后于科技创新发展前沿，又滞后于生产制造实践。尤其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科学创新领域汇集不同专业知识以探索未知问题，在当前已经成为国际科学界的发展趋势。众多诺奖获得者的成功经验都在向我们展示重大问题的原始创新需要超越单一学科领域，进行多学科的跨越式探索。在诺奖设立的百余年间，超过40%获奖项目属于多学科成果，尤其是21世纪以来，获奖成果中，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占半数以上。学科间的跨界、交叉、融合已经成为高水平科研、技术突破的重要特征。

然而，我国的高等教育目前所提供的教育产品仍然是以单一学科为主的传统学术组织方式，这带来了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学科之间的科研壁垒森严。跨学科的技术突破和研发协作受制于制度约束，难以协调；二是知识之间的教学壁垒森严。学生获得的单一知识类型，很难适应智能时代的知识融合要求，更不要说产生创造性的学习思维。我国的职业教育在理念上更加滞后于国际科技创新前沿，许多专业设置仍恪守工业化时期的技术分工和劳动分工要求，知识体系也相当陈旧。

二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育理念的落后，很难为当下的生产制造实践提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一方面，“工科理科化”、“重论文轻实践”的问题在大学中尤为突出。老师没有足够的热情去追踪生产制造的现实发展，如何可能要求学生具备与实践需求相匹配的技能？对于学生而言，大一公共基础课、大二专业基础课、大三专业课、大四毕业设计，密集的课程设计将学生捆绑在“过去的”工程知识之中，没有真正长时间参与和解决工程制造过程中的问题。大学里的实践课程也多流于表面、走马观花，导致毕业生不仅缺少一线生产实践经验，而且对一些新兴产业知识，如新能源、仪器仪表、医疗器械等知之甚少，仅限于纸上谈兵。

另一方面，由于近年的政策指引和舆论话语出现贬低“工人”“技工”的倾向，使得“去工厂化”的就业观念，在很多年轻人心目中已是根深蒂固。中智咨询发布的《一线蓝领用工荒情况调研报告》显示，2020年有45%的企业将一线蓝领工作条件差、工作环境差视为招工难的主要原因。年轻人拒绝“工厂化”的原因还包括工作内容单调乏味、工作时间长、管理严苛等。

（二）产业政策同质，不足以为有创新性、助力特色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创造机会

一方面，城市间甚至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的产业政策已出现同质化倾向，加剧各地招商引资和技能人才竞争的“内卷化”，不利于吸引和培养有创新热情、有能力推动特色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通过仔细梳理各城市、各区域的产业政策可以发现，生物制药、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都清晰列在各地招引列表之中。比如，被誉为广州“双子星”的黄埔和南沙两区，在生物医药以及能源汽车领域就面临着高度同质化的竞争。而在招引这些产业项目的过程中，长时间的初创培育是困难的，地方更倾向于撬动成熟的龙头企业来在短期内彰显成效。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政策红利各不相同，客观上需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去挖掘本地的发展优势，或自我培育或精准引进合适的产业项目。聚焦地区优势不仅可以很好地对接本地原有的产业需求，同时也能释放更多技术岗位来满足高技能人才的市場所需。

另一方面，城市间的技术产业培育和招引更多的是跟随西方现有的技术产业路线，对未来新兴产业的预判和布局不够。我们常说，一个经济体从低度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是可以借助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但很难通过跟随式的技术进步而跨越到发达经济体之中²，这对于单个城市发展亦是如此。以“机器人产业”做一个简单例证：自动化机器人技术的普遍推广是我们长期跟随美国和西欧产业发展做出的跟随式回应，也出于解决制造业企业的用工荒问题的考量。基于利益导向，我们希望能占据国际技术市场份额。目标明确，但事实难为：其一，美国、日本、德国都是在机器人产业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基本拥有超过 20 年以上的技术沉淀，市场份额很难被短时突破。另外，机器人平均使用寿命为 12 年，最长 15 年，即便使用工业机器人成为趋势，在市场份额的争夺方面，仍旧是先发国家更有优势。其二，目前国内的机器人产业存在着重复建设、高端产业低端化、低端产能过剩化等问题，缺少将新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产品与智能终端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布局，整体政策资金的投入和支持缺少前瞻性和未来性。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跟随式的技术路线只能培育出跟随式的技能人才，而那些真正有创新热情、有开辟新赛道能力的人才则难以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

（三）企业创新乏力，不足以营造出吸引和培育高技能人才的市场环境

² 郑永年,中国式现代化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R],全球化智库,2023-04-28:<http://www.ccg.org.cn/archives/75260>

我们这里谈到的企业创新乏力，主要指的是占全国企业数量 90% 以上的中小微企业。一般的大型国企和大型企业有能力和基础来自设研发机构。同时，多数地方仍习惯将创新资源向国企和头部民企倾斜，因此，大型国企和大型企业在高技能人才的引进方面有足够的吸引力，同时自身的技术创新优势也使其有能力培养出基于产业一线的高技能人才。

而反观中小微企业，即便是最具创新性的“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研发投入力度上也不及国企和大型企业。受制于企业发展资金，其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明显不足。另外，有数据显示，73.8% 的企业认为“自己缺乏技术人才”。其中，比“人才难吸引”这一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人才难留住”——部分中小微企业的高技术人才流失率达到 50%。其中，不稳定、待遇低、规模小是高技能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³。简而言之，中小微企业缺少支持创新的人、财来源，进而导致创新动力不足，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高技能人才不愿意流向中小微企业，而中小微企业又无法培养出产业所需的高技能人才。

可是，如果我们清楚中小微企业对技术人才结构调整的巨大价值，那么我们会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所谓的高技能人才结构失调，就是指人才的知识积累难以适应市场技术变化，或新兴产业缺少该领域的技能人才，而中小微企业恰恰是能够敏锐感知市场变化并灵活调整技术路线的创新主体。经验地看，后发型国家通过技术学习努力逼近世界技术前沿时，就需要转换技术范式，从技术学习转向原始创新。而原始技术创新天然地具有不确定性，有两个明显表征：一是集中力量、规模化的技术突破是存在风险的。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在高清电视上选择模拟技术而痛失国际市场的惨痛教训，对今天的原创性技术突破仍然具有警示意义。因为在原始创新方面，真正有价值的技术并非由政策和资本来确定，而是通过市场竞争筛选出来的。

二是中小微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小巨人”等科技企业，具有技术路线的高度选择权。当大量中小企业主导不同技术路线进行产品竞争，并经过市场筛选，那么低成本、可调控的原始创新便出现了⁴。可想而知，如果中小微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或是有实力培养出产业一线的技能人才，那么无论是适应新兴技术市场，还是创造未来技术市场，都有相当多的可能与机会。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优化高技能人才发展生态

³ 黄少卿,颠覆性技术创新与产业政策范式转换[J],比较,2021 (118):206-219.

⁴ 任泽平,2021 中国中小微企业经营现状研究[R],新浪,2021-12-20:https://finance.sina.cn/zl/2021-12-20/zl-ikyarmrz0029687.d.html?cid=79615&node_id=79615&vt=4

真正要解决教育、产业及企业在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三重不足，我们需要在体制和政策层面做出一系列的改革，最终目的是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扩大和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供需市场，以及营造和优化高技能人才的制度环境。

人才结构性问题	具体表现	国内外优秀案例	政策启发
培育理念滞后： 不足以培养出引领技术突破和推进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①滞后于科技创新发展前沿 ②滞后于生产制造实践	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相通： ①美国贝尔实验室所推崇的“小组制”：一般小组中至少有2名人员，一名博士研究生和一名技术工人 ②日本理工类大学往往会让学生进入工厂生产一线进行近一年时间的操作和培训	以知识会聚和产业适配为目标，创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①依托综合性科研平台，塑造文理工兼容的研究场景 ②依托现有学科培养方案，塑造开放且多元协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③依托现有校企合作场景，培养理论与实践相通的高技能人才
产业政策同质： 不足以为有创新性、助力特色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创造机会	①产业政策同质化，高技能人才竞争内卷化 ②未来新兴产业的政策预判和布局不足	产业政策尊重地方生产实践： 日本供应链价值促进会，将大型制造商，包括中小型企业、IT和LT的制造企业，以及学术成员、政府人员都纳入其中，协商协作	以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为抓手，发挥高技能人才的创造潜能： ①产业政策要以地方生产实践为准，形塑特色新兴产业发展生态 ②产业政策要以多元技术路线为核心，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创新生态 ③产业政策要以技能人才增量为重，引留并举打造高技能人才良性生态
企业创新乏力： 不足以营造出吸引和培育高技能人才的市场环境	①高技能人才不愿意流向中小微企业 ②中小微企业无法培养出产业所需的高技能人才	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与集群： 德国政府“领先集群竞赛计划”（Leading Edge Cluster Competition）下能源创新集群（Cool Silicon），在萨克森州地区聚集了110多个集群伙伴：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院校及研究机构，以研发联盟的形式来共同开发节能信息通信技术	以原始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为重点，营造高技能人才充分发展的市场环境： ①系统内部保证技术流动的便利性 ②系统内部保证融资获取的高效性 ③系统内部保证上下产业的会聚性

表 1 高技能人才发展生态的困局及优化建议

（一）以知识会聚和产业适配为目标，创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多点爆发式”发展，使生命科学、健康科学、物质科学及工程学，甚至包括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和知识融合程度越来越大，这一趋势可能在学科间壁垒森严的高校并不突出。

面对教育与科技研究和生产实践之间的差距，或许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努力。

第一，依托综合性科研平台，塑造文理工兼容的研究场景。例如，利用国家实验室、校企实验室等来打造学科交叉的科研平台，以不同的现实问题来吸纳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教授、工程师、技术助理参与到项目研究之中。当然，也可以尝试美国贝尔实验室所推崇的“小组制”，一般小组中至少有2名人员——一名博士研究生和一名技术工人，其目的是将科学理论和生产实践相结合，避免科学问题的研究突破与生产实践相脱节。

第二，依托现有学科培养方案，塑造开放且多元协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了解决当前和未来出现在跨领域的新兴问题，我们需要一种复合型科学家，他必须能够理解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够面向未来市场需求提出创造性问题，且具有多种学科视野来分析复杂问题。对此，培养方案的设计就不能只围绕单一学科进行，而必须由一个汇聚了多个领域杰出科学家、产业技术专家、新兴科技型企业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的“专家共同体”，来进行培养方案的组合设计。

第三，依托现有校企合作场景，培养理论与实践相通的高技能人才。包括为学生提供适当的横向科研项目支撑，指导老师就项目理论背景及现实科学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学生制定相应解决方案。另外还可以增加学生实习实践的场景和时间。日本理工类大学往往会让学生进入工厂的生产一线进行近一年时间的操作和培训，以此来减少大学理论知识与企业生产实践间的差距。

（二）以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为抓手，发挥高技能人才的创造潜能

毋庸讳言，近年来各地政府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政策投入不可谓不大，但也正如前文所述，地方产业政策同质化竞争无法解决高技能人才存量的结构化问题，因为“争抢”同类新兴产业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只会加剧“用工荒”的矛盾。地方政府所追求的产业路线仍然处于对西方新兴技术的跟随阶段，缺少对未来技术产业的有效预判，无法培育和扩大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市场，也无益于解决高技能人才的增量问题。对此，产业政策可以从两方面做出调整：

其一，产业政策要以地方生产实践为准，形塑特色新兴产业发展生态。以地方生产实践为基础，要求产业政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工厂、走企业、入园区、访一线。只有真正将本市、本省产业发展清楚丈量，才能在此基础上把握新兴产业的技术方向。当然，更重要的是扩大更多利益主体的参与度，包括成立本地“特色新兴技术产业委员会”，让政府专业部门负责人、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专业代表们会聚一堂，就本市产业基础进行大讨论、大调研、大协商，避免产业政策脱离当地生产实际。

其二，产业政策要以多元技术路线为核，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创新生态。对此，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开放”。必须要通过政策手段来促使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更为开放，即国有企业要向民营企业、院校及实验室开放，开放技术的应用示范场景，方便技术的迭代升级。院校及实验室要向科创类民营企业开放，开放实验人才和技术力量。科创类民营企业内部也要自我开放，通过多元技术路线的试错和竞争，来活跃技术创新的产业生态。

其三，产业政策要以技能人才增量为重，“引留并举”打造高技能人才良性生态。诚然，高技能人才的在地化培育尤为重要，但短期从技能人才的增补来看，或许欧美及日本等技术先发型国家的移民制度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首先，放宽移民限制增补高技能人才。这基本是技术发达型国家，如美德日的通用手段，具体表现在：领域的放宽，如覆盖工程、技术、科学以及数学领域等；以及人数的放宽，移民名额惠及配偶和子女。其次，加速和便利化移民审批渠道。比如加拿大所推行的“快速申请通道”的联邦移民计划，在10个工作日内，为高技能人才高效解决移民手续问题。

最后也是尤为重要，为高技能人才移民给予赋税优惠。例如，荷兰为高技能人才移民提供5年内免除部分税负的移民福利等。整体而言，技术型的先发国家都较为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引留问题，从制度法理到机制服务等都全方位关注人才所需。这是当下我们解决人才增量问题中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三）以原始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为重点，营造高技能人才充分发展的市场环境

我们已经反复论证了中小微企业在吸引和培育高技能人才方面的重要价值，那么地方政策应该如何激发中小微技术型企业的发展潜能呢？从先发型技术强国的经验来看，应当且必须具备一个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一创新生态系统无需政府的过多保护和干预，只需要按照科技创新自身逻辑提供政策服务。

第一，系统内部保证技术流动的便利性。简单来说，这种便利旨在使企业能够轻松接触到高校、实验室及国企的技术资源。德国政府采用的是“领先集群竞赛计划”（Leading Edge Cluster Competition）所培育出的能源创新集群（Cool Silicon），比如在萨克森州地区聚集了110多个集群伙伴：包括17家大型企业、61家中小企业、33所院校及研究机构，以研发联盟的形式来共同开发节能信息通信技术⁵。同时，在线上层面，联邦政府牵头打造智能技术系统网络联盟（It's OWL），由地方政府牵头，网络链接超过200家制造业、16个科研机构、6所大学、25

⁵ 创新区研究组，产业集群时代来了！德国、美国如何培养世界级产业集群？[EB/OL],36Kr,2023-02-10:<https://36kr.com/p/2125420900396032>

家家族式企业和多个中型企业，形成一套为中小型技术企业系统消除技术获取壁垒的方法。当然，中国也在做相应尝试。比如，在东莞政府牵头支持下新成立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就是承担连接当地企业与院校的技术流动职能的。

第二，系统内部保证融资获取的高效性。在对中小型技术企业的创新支持上，从原来的“评项目、前补助”，转变为“定门槛、后补助”，按照企业研发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或奖励，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企业加大自身研发投入。而在对系统内部的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提供竞争性的研发资金时，则需要联合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企业家等“技术产业共同体”来对项目资金投入进行评审、定级，以强化科研资金在研发使用中的高效性。

第三，系统内部保证上下产业的会聚性。为此，需要政府聚焦一到两个颇具产业基础的新兴行业，以政金支持来整合行业力量，提高核心技术研发与生产制造环节的衔接度，提升产业链中的政策配套能力。同时，持续支持研究机构与行业组织间的技术合作，逐渐形成产业链的技术创新联合体，为产业链的“创链”、“固链”、“延链”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 [1] 王鹄峰,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政策研究
[EB/OL],2021-02-01:<https://promote.caixin.com/2021-03-31/101682864.html>
- [2] 郑永年,中国式现代化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R],全球化智库,2023-04-28:<http://www.ccg.org.cn/archives/75260>
- [3] 黄少卿,颠覆性技术创新与产业政策范式转换[J],比较,2021(118):206-219.
- [4] 任泽平,2021 中国中小微企业经营现状研究[R],新浪,2021-12-20:https://finance.sina.cn/zl/2021-12-20/zl-ikyarmrmz0029687.d.html?cid=79615&node_id=79615&vt=4
- [5] 创新区研究组,产业集群时代来了!德国、美国如何培养世界级产业集群?
[EB/OL],36Kr,2023-02-10:<https://36kr.com/p/2125420900396032>

【化危为机：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就业优先，还是社保优先？

李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导语：

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明确自9月1日起，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任何约定“不缴社保”的条款均属无效。此外，企业如未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员工有权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企业支付经济补偿。新规一经发布便引发争议。长期以来，许多利润微薄但人力成本较高的小微企业在社保缴纳方面执行并不严格，往往通过所谓“协商一致”的方式规避社保。而今后这类单位必须足额为员工缴纳社保，否则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IPP副研究员李婷指出，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增长，重要原因在于经济下行导致订单减少、收入下降，而成本却保持刚性，工厂为降低成本，在管理上必然会要求越来越严格，能够分配给工人的利益也会愈发有限，旧矛盾被激活，新矛盾不断增加。她表示，对依赖柔性生产和灵活用工的小微企业而言，强制缴纳社保可能不仅无法解决劳动争议的问题，更无法提升就业质量，亦无助于产业升级转型。工厂、工人以及相关部门反而可能因历史遗留问题而背负重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近日发布，其中关于强制缴纳社保的新规引发了一系列争议。新规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完善法律规定来应对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的问题。

新规出台的一个大背景是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的快速增长。据统计，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已从 2021 年的 263.1 万件激增至 2024 年的 425.7 万件，增幅高达 62%；同期，涉及劳动者人数从 285.8 万人增加至 454.9 万人，增幅达 59%；案件结案总金额也从 576.3 亿元跃升至 934.7 亿元，增幅同样高达 62%。这确实给法院、劳动仲裁机构等部门带来了较大压力。然而，通过强化社保缴纳的强制性，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发更多新的矛盾与纠纷。

经济下行是直接原因

结合笔者在纺织服装行业的调研来看，当前劳动争议案件快速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经济下行。一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工厂订单减少、收入下降，但许多成本却是刚性的，如房租、固定工人的基本工资、银行贷款利息等；另一方面，工人从原来天天加班，变成现在做几天歇几天，收入直线下降。为了应对危机，要么工厂裁员，要么员工主动离职寻找新工作。然而，目前工厂不愿主动裁员，担心需要支付赔偿金。工人也不愿主动离职，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只能观望工厂订单会不会增加，即便等不到订单，至少也希望能够拿到一些赔偿金。

在这一过程中，工厂为降低成本，在管理上必然会要求越来越严格，能够分配给工人的利益也会愈发有限，旧矛盾被激活，新矛盾不断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争议案件自然随之增多。以某纺织印染厂为例。该厂是一个港资企业，1996 年开始到广州某区办厂，高峰时期员工多达 3 万人，年产值超过 60 亿元，是当地较为稳定的纳税大户。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厂对许多农民工具有较强吸引力，其中一方面原因在于工资水平较高：一线工人基本工资加上绩效、加班费等，月收入可达 6000 元左右；一对夫妻工人在包吃包住的情况下，每月能够存下约一万元。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比较稳定。作为一家原本以外贸为主的企业，该厂依托我国劳动力素质高、价格相对较低等优势，再加上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滋养”，订单持续增长、规模不断扩大，先后扛过几次经济冲击，在纺织印染领域一直占据领先地位，订单总体上也比较稳定。

很多老员工依靠在工厂拼命干、找班加，不仅能供子女读书、成家，还在老家买了房子，手里还能存下二三十万元。这些人聚集在工厂周边，带动了周边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大量就业和农民工家庭的改善，也推动了周边城中村的建设，让大量本地村民能够依靠房租收入生活。

但是近些年，随着经济下行，工厂员工数量从原来的三万人逐渐减少到一万人左右。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面临的劳动争议也不断增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降本增效的过程中，必然会触及不少人的利益，其中最难处理、影响最大的，是管理层的利益问题。

这与纺织服装产业的招工和用工历史有一定关系。过去工厂招工时，“老乡带老乡”的情况十分普遍；在经济上行期、招工竞争较为激烈的时候，工厂甚至会给带老乡进厂的人一定的奖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出来得早、社会关系网络比较广的人，就通过这种方式招了很多老乡和朋友进厂，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厂的班组长，甚至担任车间主任、厂长经理等职务。好处在于，工厂可以将管理事务交给“工头”处理，但也容易形成既得利益，导致整个工厂的管理受制于人。在整体实行计件制的情况下，好做的工序和工作，其计件本身作为一种资源掌握在工头手里，既可以用作激励和管理的手段，也可能成为他们寻租的工具；一旦分配不当，必然引发矛盾。

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明显，因为大家都忙着挣钱，工作机会也多，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较少。再加上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属性下，工厂、工人和工头之间彼此间存在更多选择，产业工人并不在实质上依赖工头或工厂，整体上能够相互牵制，形成总体上的利益平衡。工头的存在，对工人和工厂都有好处，其获得的利益也往往会被包容。

然而，当经济形势不佳时，原有的利益平衡被打破，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分配矛盾也随之增多。再加上自动化设备不断发展，工头能够获得的利益减少，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例如，为了提高效率，该厂于2019年引入扫描计件系统，无需领班对员工进行产量统计核算，领班的工作量大大减少。同时，由于订单减少，工人数量也大幅下降，导致领班与工人的配比失衡。

为此，工厂将12名领班调整为高级技工，工资计算方式也由原先领班按该组人员平均产量计算，改为高级技工按个人计件计算。整体上，工资虽然有所波动，但下降幅度不大，管理效率反而有所提升，也规避了不少管理问题。然而，其中两名领班（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进入工厂，都是有20多年工龄的老员工）对这一决定非常不满，在执行过程中与工厂更高层管理人员产生了不少矛盾。2020年下半年，他们开始选择消极怠工，连续数月只打卡不上班。

随着矛盾的不断累积，2021年5月，他们向工厂送达《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工厂支付经济补偿金（两人合计28万元）。虽然他们的申请因缺乏法律和

事实依据被驳回，但依然没有停止行动，例如鼓动厂里的老乡去找工厂的麻烦，尤其是一些工作量和工资逐渐减少的员工。

因此，工厂相继出现了一些员工申请劳动仲裁。例如，有员工提出，2013年9月签署的《不参保申请》并非个人真实意愿，并以公司自2004年以来未缴纳社会保险、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同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并补缴自2004年以来的社保。这些诉求同样因不正当而被驳回，但工厂却因此陷入了更多的劳动纠纷。

更多的人开始找工厂的漏洞，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比如，有员工针对公积金的问题，要求公司补缴2004年至今漏缴的公积金，工厂以如下理由拒绝履行该义务：第一，相关诉求超出了时限。第二，员工在工厂任职时，工厂按照双方约定向员工支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并未约定支付公积金。第三，如果支持员工的这一主张，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这些案件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公积金管理条例》早在1999年已经颁布，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该规定无法全面在社会和企业中实施。当时，当地大部分企业没有执行该规定，当地的主管部门也没有强制要求企业执行，导致积压了大批没有缴纳公积金的员工。现在，若无论是否离职、是否已经开始缴存，员工都可以要求补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公积金而不受时效限制，原告及周边地区的企业必将面临可怕的局面。况且，2017年9月起，工厂已经主动为全体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若这样的企业得不到政策保障，反而面临被追缴公积金，甚至破产倒闭的风险，无疑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正性与威严性，并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但住房公积金中心则认为，工厂的商事主体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住房公积金缴存义务单位，且住房公积金的追缴不受时效限制，因此主张工厂履行义务。工厂随后提起上诉，并进一步阐述诉求，但仍被驳回。

问题在于，对于一个经营多年的企业而言，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个渐进过程；再加上企业还要持续面对经济波动的冲击，各种因素叠加下，社保等方面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当工人权利意识因各种原因被激发后，这些问题一旦被集中挖掘出来，工厂迟早会不堪重负，相关部门的负担也只会不断增加。

从现在开始严格要求缴纳社保并不能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会给大家释放一个信号：个体可以去主张即便是不合理的权利诉求，而且一定会得到重视。对于一些人而言，这并没有什么成本，还可能借着这个机会获得一点好处，或者“泄愤”。这种权利尤其会被一些原本就权利意识很强，想要借着这些权利来获得好处的人利用。然而，最后的代价却得由工厂、依靠工厂的工人以及相关部门来承担。历史遗留问题也会因此变成更加沉重的、更加实质性的包袱，成为填不满的窟窿和无底洞，消耗着当下人们应对未来风险的储备和能力。

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是根本问题

从产业发展的规律出发，上述问题是针对纺织印染企业而言的，这类企业作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产品的标准化程度高，资金能力强，可以通过不断提升数字化和自动化来应对劳动纠纷增多和用工成本上升等问题。如果是做外贸的企业，则可以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这必然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但对于很多中小微企业而言，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小微企业，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则不同。

首先，小微企业承受这类冲击的能力较弱。在经济下行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很多小微企业已处于保生存的阶段，他们更经不起折腾。不仅如此，这些企业的非正规程度较高，只要有人“用心”去找问题，一定能够找到漏洞。而且，他们也很难通过产业转移或自动化、数字化手段来解决对劳动力的依赖问题。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从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看，结合经济下行的大背景，提升柔性生产能力，以提高回应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的能力，增强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是当前许多企业发展的普遍选择。对于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环节而言，提升柔性生产能力的关键在于灵活用工。这里仍以纺织服装为例，和纺织印染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同，下游的制衣业则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产业分散，以小微企业为主。在以“小单快返”为主要方向的产业转型推动下，叠加竞争内卷带来订单波动加剧的影响，许多企业的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在缩小，甚至缩减为家庭作坊。

不仅如此，为了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增强柔性生产能力，更多的小微企业正在增加灵活用工的比例。整个企业或工厂的用工策略正在践行“两条腿走路”：少部分稳定用工支撑基础订单的完成和产品质量稳控；大部分灵活用工确保企业能够低成本、灵活应对越来越强的订单波动。在这一背景下，不少产业集群涌现出以日结工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整个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性、组织化的灵活就业群体也变得日益活跃，成为当前就业的一种重要形态，是当前经济转型和经济下行的自然产物。

从这个层面来说，社保新规的发布，只会加速企业灵活用工的进程，包括一些原本应该进行正规用工、通过提升用工的稳定性来提高产品质量及其稳定性的环节。企业用工策略的灵活性也会因此丧失。而只有保障企业用工策略的灵活性，才能够保障企业在经济下行和产业转型背景下，能够以既快、成本又低且质量基本可控的方式生产产品。这意味着，新规的发布不仅无法解决劳动争议的问题，也无益于解决社保问题，更无法提升就业质量，亦无助于产业升级转型。

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很多企业处于保运转阶段。以广州一个中等规模的某制衣厂为例，有两个厂，固定制衣工有 50 多个。根据广州的标准，按照基本薪资每月 2300 元来计算，企业缴纳部分为 1238 元，该厂每个月要增加的支出为 6 万多。现在企业已经处于只能维持运转的状态了。成本是刚性的。每个月工资和工人生活开支要将近 50 万元，房租水电管理费加在一起每个月要 7 万多。但是收入在减少，现在淡季每个月营业额已经下降到 70 多万，利润点也在下降。高峰期一个厂营业额做到 700 万元，一年的收入有五六十万，现在做 1000 多万的营业额，也赚不到那么多。目前的资金压力也不小，客户欠款 100 多万。再这样下去，工厂就必须缩小规模了。如果每个月的成本再增加 6 万，那肯定是要压缩厂子规模，否则就干不下去了。

当务之急是加强合作，保运转、保就业

该企业代表了大多数服装企业的处境，也代表了以服装为代表的大多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处境，但是当我们深入到生产实践中时，会发现这些工厂的劳动关系并不是典型的雇佣关系，更多的呈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建立在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小微企业尤其如此。

在服装产业调研中，我们常常听到的话是，老板要想办法养着工人，让他们赚到钱，才能够留住他们。赚不到钱，即使交了那点社保，也留不住他们。老板们现在愿意撑下去，也是为了留住一帮和自己干了多年的工人，也许这样才能够撑下去，等到新的订单和新的机会。而大部分工人也总是为老板着想，希望老板能够挣到钱，工厂的订单才能又多又稳定，自己也能在一个工厂相对稳定地工作，保障不错的收入，不交社保也不要紧。当自己长期打工的工厂出现经营困难、订单减少时，他们也会选择到其他工厂做临时工，等老板需要时，他们又会回到原来的工厂。通过合作，工厂的竞争力得以维系，工人们也解决了就业问题。

这种合作关系是在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规律中催生出来的。因为在许多低门槛、高竞争且高波动的行业，利润有限且波动是一种常态，大部分人只能依靠灵活用工，依靠产业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充分协作来实现利益共享、成本共担，才能稳定发展，从而获得分享平均利润的机会。

一个大的前提是，从我国当前产业发展的阶段来看，这一利润空间在一段时间内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像服装这种在我国高度成熟的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只是在产业链完整性和供应链效率方面获得了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产业工人艰辛付出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各个小微企业能够低成本、高效地组织产业工人，并与其他环节的企业高效合作的基础上。其中，产业工人和工厂老板之间基于波动订单的灵活组织和组合，尤其关键。

走向品牌化，从而提高整个产业的利润空间和正规化程度，包括正规就业的程度，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但要实现品牌化，可能还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不仅如此，品牌化

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高成本的过程，这种机会只能开放给极少数企业。实践中，制造企业转型为资金密集型的销售企业少之又少，成长为品牌企业的更是凤毛麟角。对于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而言，还是只能通过灵活用工，维持灵活性和低成本，提升产业组织效率，增强应对产业和经济波动的能力，共同托举产业链竞争力的提升，实现渐进的产业升级。

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合作关系的达成，还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和相似的压力。在制衣业，无论是工厂老板（尤其是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主），还是产业工人，大多数都来自农村，主要是学历不高的“70后”“80后”。成家、养家是他们的共同任务。没有结婚的人要存钱谈恋爱、建房或买房结婚；结了婚的人，又因为孩子养育、结婚等，总是有常态化的刚性开支。买了房子以后，这种压力会变得更重。通过在制衣业这个门槛不高且有不少发展机会的行业打工和创业，成家和养家变得可能，还有不少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家庭发展的机会。

正是这些保家庭运转和发展的刚性支出压力，让大部分工厂老板们必须采取低风险、稳健的运营方式，投入到工厂运转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是有限的，承受工厂刚性成本压力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还必须保证相对稳定的收益。也正是这种保家庭运转和发展的刚性支出压力，让产业工人更希望拿到更多的现金收入。如今，这种需求更加迫切，因为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很多老板在家庭和工厂运转的双重支出压力下可能撑不下去了。许多产业工人连就业都保不住，而家庭的刚性支出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谈强制购买社保，真的是合适的时机吗？

【化危为机：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如何更好地服务“新就业群体”？

李明令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导语：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 8400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21%。2025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提到对于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的管理和服务问题。相较于传统全职劳动者，新就业群体在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职业属性与工作场景上也具有多元化特征。政府应如何围绕新就业群体普遍关切的劳动报酬、平台企业规范运行等展开有针对性的服务与管理，已成为补齐社会治理短板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IPP 助理研究员李明令详细分析了我国新就业群体的内在特征及变化趋势。他指出，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吸纳居民就业的重要“蓄水池”，做好这一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具有重大民生意义。基于新就业群体的内在特征和工作难点，他建议在“制度—组织—空间”的框架下，以制度为前提、以组织为依托、以空间为载体来加强新就业群体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是当前社会工作的重要议题，具有重大民生意义。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已成为吸纳居民就业的重要“蓄水池”。

根据一般性定义，新就业群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指的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灵活就业人员，常见的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线上辅导老师、电商主播等就业群体。

一、我国新就业群体的内在特征及变迁趋势

根据对特定地理位置的依赖程度，可将平台就业岗位分为“基于位置的平台就业岗位”与“基于云端的平台就业岗位”两种类别¹，前者包括网约车类、配送类和生活服务类岗位，后者包括知识服务类、媒体类、直播类、电商类岗位。各个行业的新就业群体都有各自的特点。对新就业群体进行分类，是理解该群体的一个基础性判断。

虽然平台从业人员都要依靠“流量”获得收益，但两类人群的薪酬待遇、劳动过程、学历结构等存在明显差异。由于两类人群的核心区别在于具体劳动是在地理空间还是网络空间进行，本文将新就业群体分为“移动式就业”与“非移动式就业”两种类型。

（一）新就业群体的重要特征

1. 超大规模

近年来，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迅速扩张。《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2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38320亿元，网约车用户、在线外卖用户在网民中的普及率分别为38.54%和61.44%。根据全国总工会2023年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覆盖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²考虑到这一数据已是两年前测算，据保守估计，2025年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已经在9000万至1亿人之间。

对于移动式就业人员，全国现有在平台注册的网约配送员约1200万人，快递员约320万人，交通运输部核发相关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网约车司机700余万人、长途货运司机1400余万人。³基于智联招聘2024年的在线招聘数据分析，从2019年到2024年，新业态领域的岗位数占比从8.4%跃升至15.2%。新就业群体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 个体化劳动

从事新业态工作的人，除了个别工种（比如在线教师）附属于相关机构外，基本上是自雇型劳动。不同于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这是一种“平台注册+个人劳动”的新形式，用户个人

¹ 冯帅章,万倩.平台就业的分类与特征：来自互联网招聘大数据的证据[J].劳动经济研究,2024,12(05):13-34.

² 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N].人民日报,2023年03月27日,第01版。

³ 积极回应新就业群体期盼[N].人民日报,2025年01月20日,第014版。

只要成功在平台注册就能开始工作。大多数人既没有所谓的同事，也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在劳动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工作自主化和劳动个体化特征。

在这种平台化、去雇主化的就业模式下，从业人员基本“各干各的”，社交面向较弱。在通常情况下，从业者个人就能提供独立的服务，在就业时更依赖个人的身体、时间、技能和知识。

3. 不稳定就业

一方面，由于每日的订单量或流量波动较大，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收入并不稳定。对于兼职、全职、一身多职等不同就业形式，收入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新业态工作的职业过渡性强，人员流动性大（尤其是在网约车和配送行业），从业人员的持续就业时间普遍不长。受到身体、精力、收入等因素影响，工作稳定性较差，导致相关行业的人员变动较为频繁。

4. 自我“剥削”

在新就业形态下，从业者通过不断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获得更高的收入，结果不断进入超时工作、超速流动、多平台就业的境遇中。最常见的是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以河北省为例，根据有关学者在2024年初的调查，20%的新业态劳动者一天工作超12个小时，近20%的人每月一天不休。⁴

一方面，由于平台经济中的薪酬结算模式是“计单工资制”，从业者只能通过增加单量来提高自己的每日收入。根据我们的调研，有的网约车司机在某一平台强制“休息”后，立即转到新的平台继续接单。另一方面，平台也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来培育稳定勤奋的从业人员。比如滴滴公司为了稳定每日出车的司机规模，将在线时间、服务质量评分与派单机制相挂钩，不断地引导司机延长劳动时间。

5. 非典型雇佣

在平台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组织方式平台化、管理方式算法化、劳动关系模糊化等也是新就业形态的重要特征，表现为与传统劳动关系不一样的“非典型雇佣”模式。根据调研，网约车司机、独立主播的劳动关系最难判定，快递员和外卖员其次，背靠机构的主播和在线教师等则相对容易认定。总体来说，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弱约束关系。在这种弱约束下，平台企业在用工行为上违背法律法规的概率较高，对于劳动者的管理责任较为松散，也使得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的监督难度较大。许多平台企业觉得自身与从业者并无明确的劳动关系，在保险保障、就业质量提升和技能培训覆盖面上存在一定问题。

⁴ 周爱军.新业态灵活就业者劳动权益保障面临的突出制约与破解路径研究——基于河北省的调查分析[A].载《河北人才发展报告(20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二）新就业群体的变迁趋势

1. 结构日渐复杂

新就业群体（尤其是配送类和网约车类）一直被认为是以年轻人为主、以男性为主、以低学历为主的群体，但其实不同服务类型的从业者结构各不相同，比如平台货车司机以中年人为主，外卖骑手以中学学历为主，网约车司机以男性为主，等等。

但由于整体就业机会的收缩，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货车司机行业，更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外卖行业，更多的女性进入网约车行业。笔者在广州访谈到的多位网约车女司机，普遍表示近两年工作不太好找，但是家庭生活压力较大，为了挣得及时到账的收入，所以进入了网约车行业。

2. 主动加速流动

由于传统就业机会减少，不少家庭受到失业、离职、降薪的影响，要么兼职、要么全职进入新业态岗位，依赖平台服务获得每日的现金流。当进入新业态的从业者增加，内部竞争变大，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从“被迫”加速流动，到“主动”加速流动。

3. 从灵活就业到稳定就业，从“过渡”到“长期”

灵活就业一开始被认为是“过渡一下”的工作，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被更多人当成可以长期从事的工作。通过对比 2023 年和 2024 年的《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我们发现从业者的工作年限整体有所延长，工作变动率不像前几年那么高。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倾向于追求工作稳定性而非频繁变动。

4. 从浅层劳动到初步嵌入社区

一方面，随着民众越来越依赖平台消费，无论是出行、娱乐、购物还是学习，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已经无法绕过新业态劳动者。另一方面，新就业群体（尤其是移动式从业者）的活动空间覆盖面广，社会接触范围广泛，只要工作时间稍长，就会熟悉街巷情况、社区道路、楼栋门牌，已经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二、管理与服务新就业群体的难点

（一）原子化劳动提升了组织化难度

新就业群体人员分散，流动性强、个体性强、离职率高，底数难以摸清。由于平台上的从业者自己拥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表现出极度的个体主义倾向。如果要加强这部分群体的管理与服务工作，无论是党建还是劳动培训，均难以将他们纳入传统的管理体系，难以进行动员

和组织。此外，虽然新就业群体当中有不少“流动党员”或“口袋党员”，但由于他们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较少有余力和意愿参与工会、行业协会、社区等组织的公共活动。

（二）平台“内卷化”竞争导致新就业群体的多重压力

这一群体的工作节奏快，需要同时面对物质压力、精神压力、身体压力、发展压力等多重困境。由于平台企业较多，为了争夺市场，相互之间的低价服务竞争使得从业者的收入下降。以某打车平台为例，在其他打车平台争相推出优惠产品的背景下，为了稳住乘客规模，也在这两年逐渐推出了多种低价服务产品，且是由司机直接承担这一低价损失，司机的日均收入相比两三年前已经下降了40%左右。

根据笔者对网约车司机的调研，他们时常会在网约车司机群里抱怨收入太低，社会公平感较弱，其行为甚至可能发展成针对平台企业的集体对抗行动，引发社会风险。

（三）权益保障与社保缺失背后的低度风险应对能力

在新就业群体与消费者的关系中，平台企业是“隐形”的。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控制变相强化了从业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张力，却往往从这种紧张的关系中抽身出来，不负具体责任。在社保方面，虽然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意愿较高，但是实际参保程度却较低。原因是从业者不愿意再去花钱买保险和社保——他们要么一直带着“过渡性”的心态工作，认为当下没必要买；要么更愿意把工资花在现实生活中的消费需求上，只是寄希望于平台或政府给予保障。

虽然有的平台企业会给从业者购买社保，但目前也只是给比较稳定的专送人员购买。一方面，这部分的社保开支较大，在为数众多的平台企业中，只有少数几家头部企业愿意为其从业者购买社保；另一方面，有的平台企业购买社保之后，还会从从业者的收入中减扣，这不仅会引起部分从业者的反对，甚至还会导致其跳槽到其他平台。

（四）政府介入的管理成本较高。

新就业群体规模较大，对于非移动式就业人员难以识别，线下管理难度较高；对于移动式就业人员，因为工作场景分散，属地管理边界亦不明确。由于平台企业的成长期较短，社会责任感偏弱，许多平台企业的业务发展和日常运营并不成熟，而且总是出现制度建设、权益保障的问题。面对庞大的就业群体规模、成熟性不足的平台企业，如果只是政府兜底，将会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

三、做好新就业群体社会工作的“三驾马车”

新就业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贡献者。加强新就业群体的凝聚与服务工作，需要精准施策，扩大关爱服务圈，努力将其转化为参与新时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既要支持和认可他们的“职业”，也要协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树立新型就业观念，保障他们的体面收入，营造全社会尊重新就业群体的氛围，提高他们的工作满意度与生活幸福感。基于新就业群体的内在特征和工作难点，建议在“制度—组织—空间”的框架下，以制度为前提、以组织为依托、以空间为载体来加强新就业群体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一）加强制度保障，夯实多元主体的管理与服务责任

第一，强化政府引导，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服务制度。政府要牵头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就业服务生态系统，建立与新就业形态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体系。与此同时，要增强行业监管，加强对平台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引导与合作。

第二，增强劳动者权益意识，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制度。要积极落实劳动权益保障工作，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意识、劳动权益意识，不断激励劳动者积极参与职业技能培训。要尝试创新社保缴纳制度，探讨全行业的“强制性”社保政策，既不让从业者感受到收入损失，也落实对从业人员的多重保障。

第三，明确企业责任，规范平台企业的劳动过程控制。要明确平台企业对于劳动者的管理责任和社会责任，政府应该指导并敦促企业对劳动者进行规范培训，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要监督促进平台企业落实劳动技能培训制度，强化人文主义关怀，建立更人性化的劳动监管机制，增强对劳动者的福利补助，同时提供岗前培训，有效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此外，政府要积极落实企业在新就业形态岗位培训与社保代缴方面的资金补贴。

（二）健全组织保障，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高质量管理体系

第一，坚持党建引领，加强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和工会工作。要依托新就业群体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强化党员劳动者的示范服务作用，帮助非党员劳动者了解就业服务政策，提高权益意识，获取公共服务信息。建立区县级新就业形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新就业形态工会组织，建设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家，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应积极引导年轻人、大学毕业生、党员，以及工作场景相对稳定的从业者（如非移动式就业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避免对女性、中老年人形成工作歧视。

第二，联合平台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提供科学有效的服务。要建立多维度多层次的服务内容，满足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培训需求，全面提升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加强对培训内容的质量管理，支持、引进和培育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服务机构，支持平台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围绕数字经济、智能网联等新业态领域拓展丰富工作内容，适应不断变化的一线场景。

第三，引入专业院校的智力支持，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课程和培训教材。鼓励支持地方各高校、职业院校围绕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新职业的发展特性，根据最新的产业状况和市场需求，探索开发具有地域特色和行业前瞻性的培训和服务课程，制定统一的培训标准和质量评价体系。加强培训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从业者的综合素质。

(三) 落实空间保障，促进新就业群体健康发展

第一，支持各地方合理布局休息驿站，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便利的充电场所。通过合理规划，布局建设位置合适、条件良好的休息驿站，打造就业友好街区，充分服务新就业群体。既要提高驿站的区域覆盖率，也要丰富驿站的功能性。

第二，整合盘活社区资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充足的学习空间。统筹利用各类教育设施及资源，向新就业群体开办线上云课堂、线下培训班、培训夜校等。

第三，多渠道打通职业发展通道，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构建有前景的职业发展空间。平台企业应积极打通晋升渠道，建立职业成长体系，激励从业者转型管理岗位。鼓励平台企业开放内部转岗通道，满足劳动者的多元化职业需求。此外，要积极引导平台企业加强与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合作，鼓励并资助从业者进修大专或本科学历。

第四，保障居住空间，稳步推进城市更新政策。不少新就业群体是流动人口与低收入群体，主要居住在城市的“城中村”等成本较低的地方。在推进城市更新政策、城中村改造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居住需求。比如推行面向新业态劳动者的集体宿舍、保障性租赁住房优惠等。

【化危为机：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哪吒2》火爆，中国文化产品如何更好出海？

朱雁翎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佳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导语：

近期，热门动画影片《哪吒2》的片方发布消息称，影片公映将第三次延期至5月31日。此前，《哪吒2》已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最高票房纪录，反映出中国电影产业和市场的逐渐成熟。但与此同时，从海外影响反馈与趋势分析来看，《哪吒2》97%以上的票房收入仍来自中国本土市场，传统文化题材的动漫作品也面临中国文化产品出海的普遍困境，包括文化距离、观众覆盖率和海外市场规则适应性等问题。

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如何持续提升？本文认为，《哪吒2》的火爆启示我们，必须以国内更成熟、发达、与国际接轨的文化产业为基础，着力打造良好的文化产业生态，为优质作品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加强对中小型文化企业出海的政策支持，同时拓展渠道，做好海外市场本土化的商业发行和推广。

《哪吒2》是如何把“中国故事”讲好的？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的爆火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截至4月9日，《哪吒2》的总票房已经突破156亿元人民币，创下了中国电影的票房纪录，暂列全球影史票房榜前5。同时，该片创下近年来中国国产电影北美首周末票房最高纪录。截至4月9日，《哪吒2》海外总票房突破3.73亿元。

《哪吒2》的成功关键在于影片适应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需求。

第一，《哪吒2》的叙事符合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影片将经典的中国神话故事进行现代化的阐释，将“对抗天命”“自我认同”作为核心。这一故事契合了当前的中国文化心态。影片采用的“替代性叙事”对主流价值观形成一定的补充和对话。此前，《疯狂动物城》（2016，迪士尼）、《坏蛋联盟》（2022，梦工厂）等美国动画电影也采用了类似的叙事，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成绩。

从叙事上来看，《哪吒2》现代化的尝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热血沸腾”的情感的塑造。动漫行业专家认为，影片在故事设计上强调“高燃”“热血”的叙事，从电影前半段主人公受尽屈辱、积蓄能量，到后半段的力量、情绪的爆发，体现出强烈的情绪反转，使观众释放压抑已久的情感和热血。

（2）将中国式的亲子关系和反父权的精神结合起来。影片对父子、母子、兄弟关系进行了诸多描绘，加入多处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反映家庭关系的片段，体现的是传统的“中国式亲子关系”及其和解的路径。亲情、家庭的主题对于国内观众来说有很强的共情力。

（3）将具有市井气息的段子融入喜剧元素。当前，抖音、小红书的文化盛行，碎片式的、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小包袱”更适合年轻人的观影偏好。主人公之间“斗恶”、“抬杠”、“诡辩”的桥段符合年轻一代对于灵活的、技巧性的段落的喜爱，而不是更为严肃和深刻的幽默感。

正如有媒体评论指出：“《哪吒2》的成功，根本在于讲好了中国故事。《哪吒》系列所表达的孝道、正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则诠释了反对偏见、追求自我的现代主题。内容创新赋予古老故事新的生命力，也让这部作品赢得更广泛的市场认可。”

第二，影片制作团队达到国际化的技术制作和艺术审美标准。一是技术赋能提升叙事效果。专业化制作团队与高水准视觉特效的背后，实质是中国动画制作技术和产业链的系统性升级。其出品方中国光线传媒作为资本方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作用，对动画产业的长期投资，使其在该领域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实力、资金规模、试错经验和市场影响力。《哪吒2》的出品和制作公

司有 135 家，其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占比超过八成。通过将国内分散的动画资源整合成完整的动画产业链，他们构建了“网状式”的标准化分工体系，实现从剧本到后期特效的全流程协作，最终用远低于好莱坞动画电影的制作成本创造了历史收益。可见，从拥有资源到形成文化产品，需要先进技术的重新赋能以及对市场的洞察，最终形成市场利润来维持文化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国际化的美术风格符合观众审美需求。影片美术对中国传统的审美元素进行了精致的刻画和表现，对玉虚宫等场景、鼎、妖怪锁链等元素的刻画，借鉴了包括《山海经》在内的中国古代神话意象，具有走向国际市场的潜质——1980 年，第一部入选戛纳电影节的华语动画片《哪吒闹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同样以出色的美术设计获得国际上的认可。

第三，文化市场环境的成熟和院线排片的优势。从院线排片来看，《哪吒2》获得大量黄金时间段排片机会，曝光频率增加。高涨的观影热情和社交媒体广泛的二创和口碑传播，使电影消费成为一种“社交刚需”。这反映出本土观众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突破性的票房体量体现出中国场所隐藏的巨大文化消费潜力。我国文化市场体系正趋于成熟。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充分挖掘国内单一市场的体量优势奠定了基础。

从观众画像分析来看，第二线和第四线城市观众占比更高，这也得益于 2018 年起提高“边县乡”等“低效银幕”的建设，由此新建下沉影院数据出现明显提升。

另一方面，全球动漫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我国动漫产业快速发展，在社会文化、商业产业和娱乐媒体中占据重要地位，市场需求广泛。产业政策也为动画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2017 年以来政府强调发挥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2021 年国家电影局明确提出要“扶持优秀动画电影创作生产，扶持彰显中华民族精神和东方美学风格的动画电影”。在市场需求和产业政策的配合下，创作者和创业者积极努力，推动中国动画产业转型升级，从承接海外合同到打造原创性作品。

优秀文化作品能否产生国际影响？

尽管《哪吒2》持续刷新全球单一市场票房纪录，该片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哪吒2》走向国际市场，面临以电影产业为主的中国文化产品出海的结构性挑战。

第一，文化距离明显，中国式叙事对海外观众的吸引力有限。《哪吒2》的海外受众仍以当地华人为主，真正的“文化出圈”存在困难。华人仍是中国影片出海的市场主体，但文化隔阂仍对海外观众的观影体验产生一定的影响。《哪吒2》深植于中国传统神话符号，对中国传统神话和文化符号的认知隔阂、对中国传统故事内核理解上的偏差、观影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都会影响海外观众对电影叙事的解读。根据海外观众的反馈，当前，西方市场的文化产品

趋势回归正邪交锋、携手合作的冒险类叙事，故事线趋于简洁明了和戏剧化，人物塑造也重新回到正义、美好的形象。相较而言，《哪吒2》影片前期故事中“忍耐”的精神很有东亚特点。

此外，对于情感的共鸣也存在东西方的差异。由于东亚观众更习惯于感性体验，“热血沸腾的观影感受”更易获中国观众的认可和欢迎。相比而言，西方的理性化程度比感性的程度高，“热血”的观影体验更可能存在于少数年轻观众群体。同时，由于明显的文化特殊性，西方观众很难接住异域文化的“梗”，因此影片在美国市场更大概率是小众产品，很难产生大范围的影响。

第二，海外发行能力不足，观众覆盖率低。“宣传少、影院少、排片少、不规范”是海外发行的常见问题。虽然《哪吒2》在北美的合作影片数量有所突破，据悉已有700家影院的排片量，但远低于迪士尼等好莱坞电影在高峰时期6000家以上影院的规模。中美市场在发行方式上差异较大，且通常需优先考虑国内定档时间再确定海外发行日期，导致宣传周期紧张且流程整体滞后，目前《哪吒2》依旧依赖于社交媒体口碑传播。

再者，不同于中国的速度快且效率高的集中发行机制，北美市场采取分散发行模式，即发行方通常需与每家影院单独谈判签约，这也对影片质量、发行公司资源和谈判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由于难以排除欧美市场对本土市场的偏好，中国电影排片优先度靠后。此外，据海外观众反馈，放映现场还出现了一些包括无英文字幕、电影提前开场在内的技术性与管理性放映事故。这些经验显示出海外合作过程中的投入以及协调方面的不足。提升海外市场覆盖率需要长期积累。必须承认，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工业仍然拥有市场优势。好莱坞在“内容为王”与“全球市场”的策略之下，建立了成熟的文化产品全球传播模式。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先发铺设的强大发行渠道和版权管理体系，使得产品能够进入全球市场。好莱坞在全球市场的扩张也得益于美国政府早期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税收减免等方面对本土电影产业崛起以及出海的直接支持。在本土市场，好莱坞巨头依旧掌握着强大的话语权和发行渠道，实现了对传播渠道的“垄断”，这也导致国产电影在北美市场的市场扩展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三，海外市场适应性不稳定。一方面，海外观众对语言和翻译的准确性有更高要求。相较于真人电影，动画电影和电视内容在配音上有更大的灵活性。有Youtuber在海外观影后提出，《哪吒2》上映时缺乏海外配音版本，而欧美地区观众更依赖配音理解而非字幕阅读。海外的流媒体平台也多有提供多声道和多语言的选择。翻译时的语言障碍，特别是一些中国文化特有的表述，也会影响故事的表达。

另一方面，海外观众观影时习惯参考电影分级。比如，《哪吒1》在英国上映时被评为12A级，即规定只适合12岁及以上青少年及成人观看，导致电影难以覆盖大量的亲子观影群体。这些反馈不仅是“文化折扣”在海外市场的直接反应，也是产业结构和文化政策差异带来的挑战。加强中国动漫产业在海外的适应性，需要对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规则和用户观影习惯。国内市场影响大，但在海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的影响力有限，是许多中国文化产品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的困境。

现行的文化产业体系仍然是建立在好莱坞式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基础上的。如上所述，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够覆盖全球市场，主要是由于其成熟的文化产业生态和工业化体系。工业化生产的表现包括作品技术水平精确、叙事精准、表现形式丰富，以及观众接受度高。

由于文化“势差”的存在，大部分中国出品的文化产品仍局限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以国产剧出海为例，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报告（2022）》显示，亚洲仍是中国电视剧最大的海外市场，尤其中国古装剧在东南亚国家有广泛受众；得益于“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等活动的开展，非洲及中东国家的受众也在不断增加。相比之下，欧美有着更为成熟的文化消费市场，中国文化产品在欧美市场拓宽影响力，往往需要高昂的发行成本、更高的技术水平，内容质量也要经得起成熟的文化消费市场的检验。

文化产品出海的成功案例

积累市场自发力量，构建全球化的产业链，需要文化产业政策的转型。过去几十年间，欧洲、日本的文化软实力政策也是通过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成型的。

日本通过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明确将以动画、漫画、游戏为代表的文化内容对外传播，作为国家形象塑造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了一大批文化创意人才和企业。自日本在2010年形成“Cool Japan”战略以来，日本文化产业的目标定位是聚焦以电影、动漫、音乐、游戏等为代表的日本流行文化，扩大海外受众范围。同时，支持符合战略导向的本土中小企业开拓海外业务，并且借助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及其庞大的海外分支机构来助力企业出海，通过日本政策金融公库（JFC）为企业出海提供特别优惠的融资贷款。

事实上，近年我国也不乏数字文化产品成功输出外国，在其他国家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成功案例。比如，与《哪吒1》在2019年同期上映的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在国内票房不到《哪吒1》的6%、缺乏如《哪吒1》的IP认知度作为市场基础，但却在动画产业竞争激烈

的日本市场获得一席之地。《罗小黑战记》与索尼音乐娱乐公司旗下的动画公司 ANIPLEX 达成合作，后者为电影在日本市场投入了高达 3 亿日元的宣发费用，被看作和日本动画最高票房的《鬼灭之刃剧场版：无限列车篇》同等级别。该团队采取了本土化商业发行的策略，通过当地的顶级配音团队、贴合原版的高水平翻译，以及日本动画界专业人士的口碑传播，最终使得该影片在日本斩获了 5.6 亿日元票房，创下中国动画电影在日本发行的最高票房记录。

如何助力更多中国优秀文化产品出海？

《哪吒 2》的成功，更多是文化产业成熟后在海外市场产生的自然溢出效应，而不是宣传的结果。《哪吒 2》的成功令人欣喜，但需要理性看待《哪吒 2》作为文化现象的特殊性，继续完善文化产业生态。

中国文化产品提升海外影响力，必须以国内更成熟、发达、国际接轨的文化产业化为基础。创作团队、技术团队和媒体平台是文化生产的主力。在文化产业的框架下，文化创作主体同样也是市场主体。在稳健营利的基础上实现文化产品的持续生产与输出，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的海外影响力，从而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

从供给端来看，要走出文化内循环，一方面，创作出本土市场认可的文化产品，构建国内可持续的文化产业生态是根本。这不仅要求加强顶尖创意人才培养、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提升技术水准、提升产能，更需要提供宽容的文艺创作环境，提升观众批判和鉴赏能力，培养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另一方面，提升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影响力，必须推进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对接。文化产业的生态应当是面向国际开放的。在特效画面和声音技术等方面，《哪吒 2》的视听效果离不开全球 CG 行业的发展和好莱坞前沿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普及。加强文化产业和产品在海内外发行的规则对接，包括完善相应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构建海外发行网络、对接国际对应分级分类标准等。

在电影制作、发行、宣传等不同阶段，考虑引入跨国团队的合作制片或顾问机制，提升我国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的适应性。海外制作和发行机构的参与协助，有助于拓展合作渠道，适应海外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释放海外市场潜力。

【化危为机：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如何破解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内卷？

庄文越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导读：

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内许多行业市场同质化严重，“内卷式”竞争不休。对于企业而言，除继续“降本增效”外，深耕细分领域，布局海外市场仍是“摆脱红海，进入蓝海”的重要路径。

对此，IPP 研究助理庄文越指出，“内卷”虽是企业为谋生存的不得已之举，但并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且长远对企业和行业发展弊大于利。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调整涉企扶持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向专精化方向发展的支持力度，并积极引导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更多增长机会，提升内外循环活力。

随着特朗普的当选，社会各界普遍预期美国对我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将会延续。现有经济形势下，国内大循环活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面对美西方“选边站”式的供应链“备份”与“转移”，内外形势严峻。我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民营企业，事实上选择了以“内卷”作为应对。我们认为，尽管“内卷”可能是企业为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但不利于创新，特别是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在长远看来对企业和行业发展不利，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需对此引起警惕，调整涉企扶持政策的导向，并以出海等形式引导企业融入全球发展大局，开辟新的增量。

“内卷”为什么不值得提倡？

“内卷”实质上是低水平的“拼”，也许其与儒家传统文化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观点有微妙（但带有偏差）的契合——我们看到，不仅是中国企业卷，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如日本、韩国的企业也在卷。但这种做法可能对真正的颠覆性创新产生极大阻碍。“内卷”在微观层面，可看作是管理内控制度的“完善与优化”，但以此为基础的管理体系，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内耗，并阻碍技术创新。不少大企业都拥有极其完善的管理考核制度（并以此为傲），几乎将每个员工作为独立核算个体，将 KPI 与收入直接挂钩。这样在个体上确实将成本降到了极低，但每个团队在合作中却不得不“防一手”，难以形成合力。然而，现阶段许多创新又远非单打独斗能实现，必须依靠跨领域融合。再者，通过流程管理能实现的技术突破，更多在于有明确的技术路线和对标对象的追赶型领域（极端的例子是山寨）。肯尼斯·斯坦利 (Kenneth Stanley) 和乔尔·雷曼 (Joel Lehman) 在《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Why Greatness Cannot Be Planned: The Myth of the Objective) 中指出：绝大多数颠覆性突破都是偶然产生的。

在前沿领域，研究人员面对详尽的目标和规划，承受扣奖金、末位淘汰等压力，很难实现实质性突破。更为致命的是，一旦对手产生了颠覆性突破，那么再怎么“卷”也是徒劳（典型如新能源汽车在动力层面对传统燃油车的碾压）。在面向行业的中观层面，“内卷”也并不美好。许多中国制造成功的行业，如模具，最初依靠的是自身资源要素禀赋，以“多快好省”的风格对其他产品形成相对优势，并维持足以支撑其研发的利润率。但当新对手采取低价内卷的策略后，行业很快就变为红海，难以为继。

从宏观层面看，最要命的问题在于“内卷”的刀刃向内。在有技术代差的领域，欧美厂商在面临低价策略时，更多地会选择转向高端甚至“换赛道”，而国内厂商则会陷入长期的同质竞争。同质化竞争又带来一个问题，即中小企业不敢创新。由于存在山寨行为，新技术很快被

模仿，导致企业无法收回研发成本，因此没有人敢于投资新的生产线。只有大型企业，依托庞大的资源，能在对手反应前快速形成产能，抢占市场。

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什么不得不“内卷”？

从人性的角度看，如果保证充足的利润，能轻松工作，又有谁愿意陷入无休止的内卷呢？企业的内卷，必然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最大原因可能是为了做大以更好地生存，这一点在制造业尤甚。更深层次的原因，与一直以来政策更侧重于“选优扶强”有关。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规模，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都会相当谨慎，更毋论获取其他投资等。相反，一旦做大并被树立为“明星企业”，企业的信贷额度就会变得相当充裕，政府补贴也更易获得，甚至负面舆情也都能通过各种渠道消弭。当前内需不振、市场低迷、财政资金紧张，“僧多粥少”的形势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压力，于是通过“内卷”做大便成为理性选择。因为只有做大才能在当前市场环境中更好生存。为什么中央、学界、企业界一直强调市场的重要性？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市场能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当然，市场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近年来的实践中问题愈发凸显，政府干预的重要性被愈发重视。但是，政府如何干预至关重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加码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惯性等诸多原因，当前的政策体系仍然更重视打造以强势龙头为核心的产业大集群，给行业领军者更大的支持，希望将其打造成全球范围的商业航母，参与国际竞争。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正是凭借这一做法取得了初期的腾飞。在我国自身工业体系的构建历程中，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也起到了支柱性作用。

这一类政策的正反馈是，强者能以更快的速度变得更强，在更短时间内实现赶超；而其副作用在经济体量大而增长乏力时会被放大，那就是行业内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无法生存。为了更好地获取资源，企业必须做大。而做成的一个相对“简单”的路径，就是拼命卷价格。

解决“内卷”的思路在于政策调整和企业出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制造业企业内卷，归根结底是市场问题。这其中既包括现有规则规制对市场健康竞争的引导不足，也包括客观的需求收缩。那么，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也明确指向两点，即涉企扶持政策的调整和引导企业出海。

1. 更多地支持中小企业向专精化发展

制造业的强大在于产业生态，产业生态健康与否取决于多样的中小企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供应链极度复杂、专业分工愈发细化的当下，很多看似不起眼的中小企业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能。

在专业分工细化的背景下，大企业若为每一个极其细分的领域专门开设部门并维持团队，往往并不现实；相反，那些深耕于特定细分领域的小型团队，则能专注于技术的精益求精，并通过同时为多家大企业提供服务来获得可观的利润。这一特质在工业设备类行业尤为鲜明，如一个专门做机床温度仿真和控制方案的小公司，以不足 20 人的规模同时为区域内十余家设备企业提供专项服务。这种工作即使再拓展也不具有规模优势，因此维持小微企业的体量即可。此外，德国、瑞士等国家的机床和机器人行业也非常能说明问题。大量规模在 100 人以下的企业，为非常细分的领域生产高附加值的专用设备，拥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在欧洲乃至全球都可算“隐形冠军”。现代制造业恰恰需要大量的这一类中小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同时，制造业的强大与否在于多样性，或者说产业链韧性。一方面，技术本身不应有绝对的先进和落后之分，关键要看是否适用于生产场景；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各自专精的细分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而总体上看并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无可替代，才能保证自主可控的全面高质量发展。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已充分意识到制造业专精化、定制化和离散生产的趋势，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为代表的政策体系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扶强”的历史惯性仍然存在。我们建议，至少在军工、电力、水利等与国家安全和公共服务关联性不强、具备更多市场化经验和潜质的领域（典型如家电等传统产业和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适度弱化对龙头企业的支持，更多通过统一准入、统一监管等方式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探索技术进步与场景挂钩，即技术发明不是为了达到某一具体指标，而是致力于解决实际应用场景中的具体问题。此外，优化梯度培育概念，不再将产值规模和税收贡献作为政策绩效考核的最终导向，而应更多强调对技术进步和成功市场化的奖补。

2. 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出海

如果说政策导向的调整是“夯实内功”，那么企业出海就是寻找市场增量、“练好外功”的必由之路。一是不能把外循环机遇拱手让人。国内政策调整落地需要时间，而当前尚处阶段性收缩的内需无法满足企业生存所需的市场容量。印度、东盟的庞大人口基数和巨大发展潜力对应着巨大的中低端市场；欧洲、美国和日本超过 10 亿的人口对应着中高端市场，应以出海抓住市场机遇。

二是产品市场导致企业必须出海。许多原有的外向型企业，生产的产品多为满足国外细分市场需要，如割草机、抽水泵、空气压缩机、手动工具等花园和车库用品已是中国制造强项但在国内基本没有市场，丢掉国外市场就几乎等同于丢失全部，出口转内需并不现实。

三是海外布局有利于我国制造业长期发展。对企业而言，这既能避开贸易战关税，又能更接近目标市场；如果在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那么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而政府也可通过对公民海外资产征税获取收益。对国家而言，企业在外设厂，其采用的设备、标准也将在当地扩散传播。特别对于工业设备类行业，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等地区的机床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下游制造业在华设厂并使用相关设备。

当前我国国企出海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受到一定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加强对民营企业出海的鼓励和引导。我们建议，在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前提下，一是进一步放宽民营资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组织企业界、政界、学界专家研判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目录》并动态更新调整；二是鼓励中小企业抱团出海，总结相关经验并进行多渠道宣传，为更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提供指导；三是持续推动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衔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回应欧、日、韩、印、东盟等地区对我的质疑，在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探索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强化在经贸领域的双边/多边对话与合作。

【化危为机：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消费降级，线下社区商业如何发展？

杨庭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导语：

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消费主义“祛魅”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费形态正在不断变化。数据显示，当前消费市场呈现出理性化、个性化并存的趋势，线下便捷性、“体验式”消费涌现。与此同时，近来多地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大力打造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消费场景。诸多利好条件下，社区商业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IPP 研究助理杨庭轩指出，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消费模式正在从传统的基础需求向高品质、多样化方向转变，而社区商业正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体现。未来，社区商业需集从集约化与精细化并存的消费需求、体验性与实用性结合的消费内容，以及文商旅和夜经济同步的消费模式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阶段，消费者习惯正逐步改变，从满足日常基础需求的传统模式，逐渐转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低欲望消费”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提倡理性消费，但在高度数字化的“网红经济”时代，消费者仍然被线下购物体验所吸引。这种看似矛盾的消费态度，实际上是现代消费者追求的平衡之道——理性的消费观念与迅速便捷的购物体验相结合。消费者如今更注重真实的生活需求，在购物时更多地考虑实际用途和性价比，而非盲目追求品牌或潮流。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总体消费需求的下降，而是消费性质正在发生改变。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线下消费领域的重塑中。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 年前三季度，我国线下消费呈现出显著活力，节假日和文旅经济成为主要驱动因素。假期及暑期经济刺激居民外出旅游和就餐，饮食服务支出增长 14.4%，文化娱乐支出增长 16.3%，交通费用支出更是大幅增长 21.5%，反映出消费者对线下体验的需求旺盛。

同时，服务性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 7.6%，占总消费支出的 47.0%，显示出线下服务场景的活跃正推动消费结构优化。这种趋势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文化、娱乐、餐饮和休闲服务的需求，还反映了消费场景从单纯购物向多元体验的转型。

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消费模式正在从传统的基础需求向高品质、多样化方向转变，而社区商业正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体现。同时，社区商业正在成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满足即时需求和提供便捷服务的关键环节。线上网红打卡策略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和话题，吸引消费者前往线下体验，不仅增加了人流量和消费活力，还推动了社区商业的高品质、多样化发展。

社区商业的新消费特征

为适应消费模式的转型和线上线下消费融合的趋势，社区商业正在不断探索更贴近居民生活的新模式，通过强化便利性、提升服务品质和引入多元化业态，满足消费者即时性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然而，在展现新增长活力的同时，社区商业也面临线上平台冲击、客流分散等挑战，需要应对消费者对性价比和品质的更高要求；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社区商业今年的一些转变及其特征。

首先，便利性和即时性成为社区商业的核心优势。2024 年一季度，便利店和小型超市销售额分别增长 11%和 7%，显示出社区贴近消费者“最后一公里”的显著优势。消费者倾向于选择方便、快速的购物方式，这推动了外卖服务和“小时达”即时零售的快速发展，尤其在社

区周边形成了高频次、小额消费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满足了日常食品、饮料、日用品的需求，还通过提升消费体验吸引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

其次，家外消费的复苏显著带动社区餐饮和服务消费。随着文旅经济和夜间经济的崛起，小型餐馆、饮品店等街边业态成为社区商业的重要增长点。居民线下用餐和聚会习惯的恢复进一步刺激了这些业态的发展，使其不仅满足消费者即时需求，也成为商业街和底商的重要吸引力来源。此外，居民对于本地化品牌和服务的偏好，为社区中的中小商家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进一步提升了本地消费的黏性。与此同时，线上平台的快速扩张对社区商业构成挑战。美团、京东等平台凭借高效的配送能力，与传统社区商业直接竞争，吸引了一部分消费者从线下转向线上。同时，抖音等平台通过社交与电商的结合，更高效地触达社区消费者，分流了实体店的客流。此外，社区商业也面临客流碎片化的问题，尤其是年轻消费者更倾向选择线上渠道或更具吸引力的综合购物体验，导致传统社区商业难以形成稳定的回头客基础。

最后，消费价格敏感性对社区商业提出新要求。消费者对性价比的关注使社区商业需要更精细化地优化商品结构和服务模式。而对于高端或非必需品的需求较低，则限制了一些品牌在社区商业中的表现。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价格敏感性与品质体验之间找到平衡，将是社区商业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社区商业发展的阻碍与难题

社区商业作为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角色正在从单纯的购物渠道转型为集便捷性、服务性和多样性为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未来，社区商业需在面对线上竞争的同时，进一步挖掘线下消费的情感和体验价值，通过强化与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深度连接，推动其在消费模式转型中的持续发展。然而，与其发展机遇并存的是诸多结构性问题和运营挑战，这些问题不仅限制了社区商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对其整体竞争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1. 产权分散导致难以整合，经营依赖个体决策

社区商业的产权分散性使得整体规划和管理难以实施。每个商铺的所有者基于自身利益独立运营，导致整体商业区缺乏统一战略。尽管个体化运营能激发商家的灵活性和竞争力，但也使得社区商业难以实现规模化效应，削弱了商业区的协同性和整体吸引力。

相比于统一管理的商业综合体，这种结构更易出现资源浪费、品牌效应不足等问题。社区商业通常包括便利店、小型超市、餐饮店等多种业态，这些商铺的产权往往分散在多个业主手中，类似于底商的产权结构。这种分散性导致每个经营者根据自身利益进行独立运营，缺乏整体性和协同性的规划。虽然市场的自发性可以激发个体竞争，推动创新，但这种模式也让社区

商业的发展更多依赖于个体经营者的判断，而非统一的商业策略。结果是，社区商业可能在定位、服务和品牌塑造上难以形成一致性和规模化的竞争优势。

2. 业态混乱影响商业形象，难以形成统一品牌

缺乏统一规划的社区商业容易在业态分布上出现重复或不平衡现象，例如同一片区可能过多集中某种业态（如餐饮或零售），而其他领域的需求则被忽略。这种布局不仅降低了消费者的整体体验，还影响了社区商业的品牌效应。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商业形象清晰、业态分布合理的购物环境，而业态混乱的商业区往往给人以缺乏专业性和吸引力的印象。而且，社区商业在规划阶段往往缺乏明确的用途规定和合理的功能分区。例如，在一个社区内，可能同时存在多家类似的餐饮店或便利店，导致业态过于单一或供给过剩。而某些业态（如教育培训、文化服务）则可能因缺乏统一规划而严重不足。缺乏整体性规划的社区商业不仅难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还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运营效率低下。

3. 利益冲突导致难以合作，运营协调复杂

不同商家间因业态和功能的冲突导致利益协调难度增加。例如，过于密集的餐饮业态可能产生噪音、交通堵塞等问题，影响周边零售或服务商家的运营环境。而多业态共存的社区商业由于产权主体和运营模式复杂，进一步增加了协调成本。这种利益冲突不仅降低了商业区的整体效率，还可能削弱消费者的体验质量和购物欲望。社区商业的多种业态共存容易引发利益冲突，例如餐饮店的油烟和噪音可能影响周边商家的正常经营；再如，零售店与娱乐设施的客户群体需求不同，导致流量分布不均。产权和运营主体的众多使得协调难度加大，不同经营者之间的竞争甚至可能演变为内部冲突，削弱整体商业活力。这些问题在底商的实践中尤为常见，也成为社区商业运营管理的难点。

4. 外部竞争加剧，流量吸引压力大

在消费习惯逐渐多元化的背景下，消费者更青睐服务齐全、品牌多样、体验丰富的商业场所。社区商业如果无法提供足够吸引力的服务，便容易在竞争中失去优势。尤其是在面对有更大规模、更强综合功能的商业综合体时，社区商业必须通过自身特色或差异化定位来争夺客流，否则容易被边缘化。

5. 同质化问题削弱吸引力

社区商业普遍存在同质化现象，即过多商家提供相似的商品和服务，导致内部竞争激烈，同时缺乏差异化价值。消费者在面对千篇一律的商品选择时往往会失去兴趣，进而转向其他更具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商业选择。同质化不仅体现在业态结构上，也反映在服务模式和品牌形象

上，抑制了商业区整体吸引力的提升。此外，同质化还容易造成资源分散和重复建设，使社区商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建立核心竞争力。

6. 过度注重外观设计而忽视体验与服务

商业空间的开发往往过于追求外观的吸引力，而对内在功能和消费者体验关注不足。购物动线不合理、功能区划分不科学、服务质量欠缺等问题，都会削弱商业区的实际吸引力。消费者在选择购物场所时，除了外观的吸引力，更注重内部体验的丰富性和服务的便捷性。如果社区商业无法在这方面满足消费者需求，即使初期客流量较高，也难以实现长期的用户留存和回访。

社区商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核心策略与优化思路

在社区商业面临的阻碍和难题中，我们看到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局限。然而，这些挑战也为社区商业的创新和转型提供了方向。通过重新定义消费需求、强化用户体验和融入文化元素，社区商业正在从满足基础需求的传统模式向更加多元、高效、体验丰富的方向迈进。接下来，从集约化与精细化并存的消费需求、体验性与实用性结合的消费内容以及文商旅和夜经济同步的消费模式三个方面，我们将探讨社区商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核心策略与优化思路。

1. 满足集约化和精细化并存的消费需求

在后疫情时代，15分钟生活圈成为社区商业发展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整合居民日常需求，将“因圈施策”“一圈多能”和“多圈合一”作为主要目标。例如，上海的“生活盒子”整合养老、托育、医疗、健身等多种服务功能，在一个商业综合体内实现生活服务的多元化布局，体现了居民对消费集约化和精细化的双重需求。这种社区商业模式不仅满足了居民生活的便利性，还提升了资源利用率，减少重复建设，构建了一个高效协作的消费生态。

同时，社区商业正在从“网红化”向“亲民化”转变。在过去，过度依赖社交媒体推广的“网红商业”凭借话题性吸引流量，但由于内容过于炫酷而缺乏实用性，常常陷入“流量高开低走”的困境。而亲民化的社区商业强调长期陪伴居民的角色，关注其实际生活需求。例如，社区内的便利店、早餐铺、小型超市等贴近居民日常的业态，通过提供价格合理、品质可靠的商品和服务，满足居民即时性和基础性的消费需求。这种转变不仅增强了社区商业的黏性，还通过日常化的消费行为，为商业空间注入了稳定的客流。

此外，亲民化的社区商业逐渐成为情感连接的纽带，提供的不仅是商品和服务，还营造了温馨的邻里交流场景。例如，一些社区商业引入儿童游乐区、居民共享空间、邻里文化活动中

心等功能区，鼓励邻里之间的互动，将商业消费与社区生活融为一体。通过这样的功能拓展，商业空间从单纯的消费场所升级为居民社交和情感交流的平台，进一步巩固了社区商业的价值。

2. 丰富体验性与实用性结合的消费内容

在信息化时代，消费者接触了更多的商品信息和消费文化，对消费体验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过去，许多社区商业过度依赖地理位置和价格竞争，但随着消费者更加注重品质、设计和功能的综合体验，仅靠传统优势已经难以满足需求。如今，社区商业的成功关键在于体验性与实用性的结合，不仅让消费者享受高质量的服务，还能在消费过程中感受到情感寄托和文化认同。相比“网红商业”的短期流量驱动，社区商业更倾向于打造贴近居民需求的长期体验价值。例如，一些社区商业引入体验中心，让消费者在购买前能够试用商品或感受服务功能。这样的模式不仅提升了购物的真实性和互动性，还通过实用主义的消费观念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和忠诚。

消费者的实用主义消费观也逐渐对社区商业提出新的要求。年轻一代倾向于“花钱买值，不为品牌买单”，选择具有实际价值和高性价比的商品。这种趋势要求社区商业不仅关注商品的价格与质量，还要优化购物流程、提升服务响应速度，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的购物体验。例如，许多社区商业逐渐将线下购物与线上服务相结合，消费者可以在线预约、到店体验，从而实现“快速决策+深度体验”的双赢模式。

此外，体验性消费也体现在商业空间的设计中。一些社区商业通过引入沉浸式体验场景，如模拟家庭的试用空间、互动式的DIY区域，以及以服务为核心的健康咨询或教育服务，增强消费者与空间的情感连接。这种体验不仅能让消费者更深刻地记住品牌和服务，还通过增加购物的娱乐性和社交性，为社区商业赢得了更多的复购机会。

3. 强化文商旅和夜经济同步的消费模式

文商旅模式是社区商业从传统功能向综合体验转型的重要方向。文商旅通过融入本地文化、旅游资源和商业活动，将社区商业打造成一个兼具文化深度和商业价值的多维空间。与传统零售和餐饮相比，文商旅模式更强调消费者的情感参与。例如，一些社区商业通过引入本地特色文化展览、互动式手工艺体验或社区艺术节等活动，吸引居民参与其中，同时为外来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消费者的情感认同，还通过差异化定位提升了社区商业的整体竞争力。

夜经济是文商旅发展的重要延伸，它赋予社区商业新的生命力。夜经济的兴起，不仅延长了营业时间，还丰富了经营模式，显著提高了商业空间的使用效率。例如，通过举办社区音乐会、露天电影、夜市集市等夜间活动，吸引更多的家庭消费者和年轻人参与其中。相比传统的

夜经济依赖大型商业中心，社区商业的夜经济更关注本地化与亲民化，以轻松的氛围和丰富的内容，满足全龄段消费者的夜间休闲需求。

此外，文商旅和夜经济的发展逐渐去除“网红化”的表面化标签，而更注重与消费者情感的长期链接。过去一些夜经济场所过度依赖社交媒体热点，通过打造“网红打卡地”吸引短期流量，但缺乏实际服务价值。如今，社区商业夜经济更注重多功能融合，例如将夜间经济与文化传播、邻里社交结合，使商业空间成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社区商业的实际使用价值，还通过高质量的夜间服务带动了消费的持续增长。社区商业的发展正在从“炫酷、短期”的网红化模式转向“实用、长期”的亲民化模式。通过优化功能布局、强化消费体验和融合文化内容，社区商业不仅满足了居民的日常需求，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情感归属和社交互动的场所。

无论是集约化的功能整合、实用主义与体验感的结合，还是文商旅与夜经济的同步发展，社区商业都在不断适应现代消费趋势，探索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这种以亲民化为核心的模式，代表了社区商业在消费升级背景下的重要方向，也为未来商业空间的设计和运营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参考资料：

1. 王嘉晨,张瑞瑶.全媒体时代网红打卡地对塑造城市的影响力探究[J].上海商业,2023,(06):16-18.
2. QuestMobile. 2024 城市生活圈消费洞察报告：线上线下消费持续复苏[EB/OL]. 澎湃新闻, 2024-06-13.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717466.
3. 猴哥. 2024 消费与线下零售的 10 个关键变量[EB/OL]. 亿邦动力网,2024-11-25.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4-11-25/doc-incxhqmn4916796.shtml>.
4. 凯度消费者指数, 贝恩公司. 2024 年中国购物者报告, 系列一: 中国市场适应温和增长新现实[EB/OL]. 2024-06-28. <https://www.kantarworldpanel.com/cn/news/China-Shopper-Report-2024-Vol1-CN>.

【第十二届 IPP 国际会议精华回顾】

重塑现代化：中国与全球南方 ——2025 年 IPP 国际会议观点综述

导语：

8 月 23 日，以“重塑现代化：中国与全球南方”为主题的 IPP 第十二届国际会议在广州召开。本次会议聚焦全球学界关心的多个核心议题，特别设置了“转型中的全球发展”“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与全球治理”“多极化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南方”等三大议题。来自中国、美国、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个国家的十余位全球知名学者通过跨领域、跨区域、跨文化的深入对话，就全球发展转型、多极化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多元现代化路径等议题凝聚了新的智慧与共识。

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以“2050 年的世界，一些量化视角” (The World in 2050: Some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 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转型，未来将重塑全球社会走向的关键变化包括：经济与技术的交汇、军事力量的再分布、生态危机的加剧、数字革命的深化，以及人口结构的转变。要应对危机，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社会共同探索更优路径，以实现经济繁荣与社会公正。

他强调，为了更好地整合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需要进行深刻转型，尤其要在能源、农业和城市三个关键领域率先实现技术革新，并推动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协同。一方面，要尽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效的农业模式，并推动城市建设向低污染、保障公共健康的方向转型。如今，中国在新能源、绿色技术和数字城市等领域的探索，已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将在未来助力更多国家实现能源转型与城市更新。

他表示，上述所有变化与复杂过程都需要大量规划，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 (policy coordination)。但目前全球合作水平仍然较低，亟需加快推进区域协作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协同。中国与东盟在能源和经济转型方面的紧密合作，将在未来几十年对区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全球层面，他呼吁重振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不仅应继续维护世界和平，更应在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等全球性挑战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协调作用。

议题一：转型中的全球发展

(Global Development in Transit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任琳发表了题为“国际秩序转型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来自升级版全球经济治理的应对” (Potential Risk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Upgrade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的演讲。

任琳教授在演讲中深入阐述了国际秩序变动需谨防的四大“陷阱”——“新自由主义的内生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和“新马尔萨斯陷阱”。她重点分析了后两者。

首先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一些国家试图退出多边机制，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出现赤字，严重影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然而，尽管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但各类新兴的区域和跨

区域性机制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发挥积极作用，为国际社会克服全球治理赤字注入新希望。

其次是“新马尔萨斯陷阱”。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两面性，虽然未来可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但同时也可能加剧区域、行业、族群甚至性别的不平等。世贸组织等机构的数据显示，就全球数据基础设施的分布而言，高收入国家依然占据优势地位；数据中心的不均衡分布也可能加剧资源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最后，她指出，技术进步应成为推动世界发展和繁荣的积极力量。有效的全球治理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主要大国间的对话合作必不可少。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发表了题为“中国山寨手机如何引领非洲迈入互联网时代”（How Chinese Counterfeit Phones Ushered Africa into the Internet Age）的演讲。

麦高登（Gordon Mathews）教授从人类学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山寨手机如何通过高性价比和广泛可及性，在 21 世纪初推动了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的数字化进程。他指出，21 世纪初，非洲通信条件极为有限、费用高昂，中国手机企业及“山寨手机”进入非洲市场后，极大促进了当地与外界的沟通。

麦高登教授认为，应正视“山寨手机”的历史作用，全球 80% 的人口并不富裕，中国的高仿与“山寨手机”让更多人平等地接触到智能手机和移动通信网络。这种“平等”并非出自某个大国的政策，而是中国供给的结果，可以视为中国在 21 世纪早期对全球化独特且重要的贡献之一。

牛津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发表了题为“气候紧急状态下的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 in the Climate Emergency）的演讲。

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教授指出，随着时间推移，全球南方国家正逐渐摆脱“剥削式”的发展模式，而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则代表了这一进程中的前沿力量。中国和印度在绿色能源领域的积极表现，凸显了全球南方在全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凭借在光伏面板、太阳能等绿色能源技术上的低成本优势，不仅推动了国内能源转型，也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她认为还需要关注绿色能源发展在当地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绿色能源技术的背后需消耗大量资源，例如太阳能面板所依赖的矿产，但这些矿产的开采往往只使部分较为富裕的精英群体受益，这一现象值得深思。她进一步强调，全球南方必须避免重蹈殖民时代的发展覆

辙，而需要依托更加公平、双赢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唯有如此，全球南方才能在崛起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IPP 执行院长郭海发表了题为“超越南北划分的二元框架，重新思考当代全球发展”（Rethinking Global Development Beyond the North-South Divide）的演讲。

郭海博士在演讲中围绕全球南方的崛起与南北划分的二元框架展开了讨论。他指出，“全球南方”是一个极有价值且值得推广的战略概念。但作为学理概念，南北划分依然具有模糊性，未能准确体现全球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此外，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机制虽已取得长足进展，但未来仍需形成具备长期稳定性的制度性安排。

如今，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贸易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许多过去的南北依赖关系已不再成立。例如，中美贸易早已不再是单一的殖民式经济交换，而是复杂的全球经济互动，涉及技术、产业与市场等多方面的竞争。再以澳大利亚与印尼为例，双方贸易关系并非单纯依赖自然资源输出，而是涵盖了制造业产品，这正反映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新动态。

南北划分的二元框架可能使全球南方产生“受害者心态”，过于聚焦于与全球北方的对立与抗衡，忽视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的不平等与矛盾。全球发展同样发生在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其带来的贫富差距、产业空心化等问题，都可能对全球治理产生影响。他呼吁，全球南方应当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推动建立更加复杂、多元的全球合作框架，以实现共赢。

议题二：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与全球治理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Global Governance）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GIIS）执行院长李青发表了题为“全球价值链“大重构”：对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技术与结构转型的分析”（The “Grand Restructuring” of GVC: An Analysis of Geopolitics, Geoeconomic, 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演讲。

李青教授在演讲中深入分析了全球价值链（GVC）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重因素推动下的重大转型。她将 GVC 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战后至 2008 年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 2008 年至 2020 年，第三个阶段则从 2020 年延续至今。

她指出，二战后的全球贸易和生产呈现“两极化”结构，由亚太地区（以美国为中心）和欧洲集团（以德国为中心）主导。进入 2008 年后，GVC 网络逐渐演变为“三级结构”，包括北美、欧洲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后，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并成为引导全球供

应链重塑的关键力量。随着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从而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大重构”（Grand Restructuring）阶段，从以效率为中心的系统性全球化转向韧性、安全和区域化，这一重组不仅改变了企业战略的考量，还重新绘制了全球投资与贸易的版图。

李青教授认为，推动 GVC 经历重要转型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地缘政治，特别是俄乌战争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冲击；二是地缘经济竞争，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贸易战和技术国家主义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三是技术驱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生产和物流的格局。这三个因素形成了互相强化的回路。

她强调，国家应增强核心产业的生产制造能力；在企业层面，需要建立敏捷且具有一定冗余的供应网络，同时保持透明性；在全球治理层面，需要在管理碎片化所带来的成本的同时，继续保持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的合作。

IPP 荣誉教授、全球化智库（CCG）国际研究员、北京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联合国资深经济学家（荣休）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发表了题为“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Economic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的演讲。

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教授在演讲中指出，现下自由国际秩序表现出新的脆弱性。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组织的效能日益受到质疑，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停滞，核不扩散机制被削弱，多边合作的合法性与公信力不断受损。与此同时，美国日益内向、欧洲日渐军事化、日本和韩国经济停滞，都为新的经济和新的领导力量打开了大门。

马达沙希教授指出，全球南方正在迅速崛起，新兴经济体正推动全球贸易模式重塑，并在关键资源与理念输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南方拥有年轻劳动力和日益成熟的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尤其在数字革命背景下，其在移动支付、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展现出极大潜力。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的数字外交以及金砖国家在全球金融和治理中提出的倡议和实践，都代表着我们正迈向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全球金融体系。她认为，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及治理实践，标志着国际秩序出现了结构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涉及新的行为体与机构，同时也意味着对 21 世纪国际权力与合作关系的全新定义。

马达沙希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体现在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领导权转移上。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数字网络治理方面的突破，推动了全球数字化进程的迅速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嘉诚经济学教授柯成兴 (Danny Quah) 教授发表了题为“世界能否在没有‘全球北方’的情况下发展”(Can the world develop without the Global North?) 的演讲。

柯成兴 (Danny Quah) 教授在演讲中提出, 在理解全球南方/北方关系时, 往往容易陷入“二元制”的思维——合作或冲突、美国主导或中国主导。他认为应该在两者间寻找切实可行的模式, 摆脱二元制思维模式, 构建一个“世界秩序-1”(world order minus one) 的体系。他认为, 中国崛起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 尤其在供应端带来了所谓“中国冲击”, 即大量廉价商品进入全球市场。同时, “美国冲击”则体现在需求端, 即美国对外国商品的限制与关税壁垒。两端冲击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 是全球经济多极格局尚未成型、多边主义式微的重要原因。

他引用了 CPTPP 和 WTO 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 机制作为例子, 进一步建立一个“世界秩序-1”的体系, 自愿参与的国家可以在该体系下协商应对产能过剩、产业转移、公平竞争等挑战, 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在开放和自由贸易框架下实现持续合作。他强调, 这一体系不应仅由全球南方国家构成, 只要有遵循规则的意愿, 任何国家都可以被纳入进来。

议题三: 多极化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南方”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Era of Multipolarity)

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埃薇·菲特里亚妮 (Evi Fitriani) 发表了题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对多极化的影响: 印尼的经验”(The Rise of Global South and Its Impact on Multipolarity: Indonesia's Experience) 的演讲。她在演讲中分享了印尼在国际关系与外交实践中的经验。

埃薇·菲特里亚妮 (Evi Fitriani) 教授指出, 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 印尼面临着两股主要力量的博弈: 一方面, 许多国家在努力构建多边主义, 另一方面, 少数国家则试图维持现有的国际格局。印尼通过东盟、G20、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 积极维系和推进与全球南方, 甚至包括与全球北方的关系。

在外交政策上, 印尼始终秉持独立而积极的外交态度。她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印尼外交的几个关键因素: 国内政治、经济与安全问题是核心变量, 不同领导人往往赋予这些因素不同的权重; 外部压力与领导人的认知感知也会左右印尼在国际机制中的参与方式。

最后，菲特里亚妮教授指出，印尼“之”字形外交经验表明，其在保持独立外交政策的同时，通过多边主义框架下寻求合作，推动了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互动与合作。印尼不应仅仅被视为全球南方的一员，而应当被看作是一个积极推动全球合作与变革的“桥梁国”，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或者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

泰国清迈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纳鲁·查伦斯（Narut Charoensri）发表了题为“中国、全球南方与秩序转型期：新兴多极化秩序下泰国及湄公河次区域战略选择再思考”（China,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Interregnum”: Rethinking Thailand’s and the Mekong Subregion’s Strategic Options in an Emerging Multipolar Order）的演讲。

纳鲁·查伦斯（Narut Charoensri）教授从国内层面讲述了泰国及其在区域中的角色。他指出，泰国正努力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自身的生存路径，包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泰国还参与了各种区域性合作计划，如湄公河委员会、湄公河-恒河合作以及日本-湄公河合作等，努力从中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

他认为，区域秩序的变化值得关注，尤其是湄公河次区域及其他区域。这些新兴的次区域秩序为中等国家提供了一个小型的平台，便于它们与当地政府、其他中等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机制，促进中等国家或小国间的合作。

美国恩迪科特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特聘教授维塔利·科济列夫（Vitaly Kozyrev）发表了题为“合作型多极格局：全球南方争夺战中，中国为何需要俄罗斯？”（Cooperative Multipolarity: Why Does China Need Russia in the Battle Over the Global South?）的演讲。

维塔利·科济列夫（Vitaly Kozyrev）教授指出，当前全球秩序正处于从单极到多极的转型期。这种多极化并非回到 19 世纪的传统格局，而是一种复杂的多极格局，其中大国之间的权力争斗和冲突并存，且各国都强调主权。

他认为，为了避免国际秩序陷入混乱局面，需要倡导新的大国概念、新的力量，并且构建更加包容和平等的社会。中国与俄罗斯目前正在共同抵制霸权，推动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世界，以避免多极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突和不平衡。

对于推动新世界秩序的构建，科济列夫教授详细阐述了六个重要领域的机制改革：一是联合国改革与全球南方声音的提升；二是“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减少世界的分裂，推动各国在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三是“金砖+”系统作为替代性的全球秩序框架，增强以政策为核心的导向，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摆脱西方国家的压迫；四是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的融合；五

是全球金融系统改革，特别是加强全球南方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参与；六是建立更为包容的全球安全架构，强调欧亚安全框架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创建新的多极架构时，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可以有更多动态互动，从而有助于优化整个过程。

圆桌讨论：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多元现代化路径

(How will changes in geopolitical constella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affect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圆桌讨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汉斯·道维勒 (Hans d'Orville) 主持。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牛津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尼基塔·苏德 (Nikita Sud)、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嘉诚经济学讲座教授柯成兴 (Danny Quah)，以及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埃薇·菲特里亚妮 (Evi Fitriani) 四位嘉宾，围绕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全球治理变革与南南合作路径展开深入探讨。

汉斯·道维勒 (Hans d' Orville) 教授在开场引言中指出，当今全球南方的发展正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全球北方国家通过关税与援助收缩不断加剧南方国家的压力，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充满挑战。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亟需共享经验、知识与资源，探索“小型多极格局”，并在城市发展、地方合作与新兴议题（如数字安全与资源需求）中积累更多可借鉴的实践。

郑永年教授指出，大国政治将持续扮演重要角色，中美若合作仍可能维持“同一世界、同一体系”，若对抗则会出现“一个世界两个体系”，还有可能是“同一世界多个体系”，如欧洲、东盟和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保持独立。中国并不寻求另建国际体系，而是致力于维护和振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关键在于如何确保大国和平共存，而不是陷入争斗。

他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往往受国内矛盾驱动，中产阶级萎缩导致社会分裂，使其政策缺乏理性；若美国能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对美国、中国乃至全球都是好事。中国同样面临国内发展的挑战，中产阶级的扩大将决定其未来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已形成系统化政策，有着普惠的多边格局、制度型开放以及单边开放“三大支柱”。谈到中国现代化经验，他强调必须有有效的政府、高效的市场和积极的社会，这三者构成中国现代化的“三角形”支柱，关系处理得当才能推动持续发展。

尼基塔·苏德 (Nikita Sud) 教授结合印度视角，强调发展不仅关乎经济增长，也需兼顾社会公平与公共服务供给。她指出，印度在追求大国地位的同时，也面临内部不平等与公共服

务不足的挑战。她认为，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虽存在竞争与分歧，但在气候变化、减贫等全球性问题上仍需团结合作。

柯成兴 (Danny Quah) 教授从小国视角出发，强调“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他指出，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其发展政策都会对全球格局产生外溢影响。在当前多极化与碎片化的格局中，未来国际秩序需要更加灵活与去中心化的合作机制，以避免被僵化的二元对立所绑架。

埃薇·菲特里亚妮 (Evi Fitriani) 结合印尼经验，强调坚持“独立积极”的外交传统，主张不结盟但积极合作。她指出，印尼重视广交朋友、避免树敌，在区域合作和南南交流中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同时，她认为中国在新能源与环境治理领域的政策与实践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杰弗里·萨克斯：重塑全球社会的五大变化

——在第十二届 IPP 国际会议上的主旨演讲

导语：

8月23日，以“重塑现代化：中国与全球南方”为主题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第十二届国际会议在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召开。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在会上发表了题为“2050年的世界，一些量化视角”的主旨演讲。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经济与技术的交融、军事力量的再分布、生态危机、数字革命以及人口结构变化，正以激进方式重塑全球格局。他强调，可持续发展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核心路径，需要在能源、农业和城市三个关键领域率先实现技术转型，并推动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协同。他特别指出，中国在绿色与数字转型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将在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以下内容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而成，略有删减：**

谢谢大家！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受邀参加第十二届 IPP 国际会议，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盛情邀请。我希望与大家分享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即当今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各种变化的时代，不管是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以及国际秩序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所以此次会议也聚焦了“重塑现代化”这一主题。世界正在经历人口、经济、技术、生态、地缘系统方面的种种重塑。因此我想，面对不确定性、面对各种担忧、面对世界各地对当下时代快速变化的各种隐忧，我们都要考虑重塑的过程和方式，有些国家、有些社区或者是社会的人们会偏悲观，有些偏乐观，有些可能兼而有之。

所以接下来我想讲的是未来全球我认为会经历重塑的五大重要变化，这五大变化也会重塑全球社会。

重塑全球社会的五大变化

首先是经济和技术的趋同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所谓经济与技术的趋同，指的是在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经济增长与技术发展存在显著差距，这就会产生经济与技术的趋同。然而，一些新兴经济体正在以较快的增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高收入国家为例，其年均经济增长率通常在 1%—2% 左右，而许多新兴经济体则保持在 4%—5% 左右。尽管不同国家及不同年份之间的增长差异依然显著，但整体趋势显示，经济基础较弱的国家往往增速更快，从而推动了经济层面的趋同。

通常而言，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在技术研发方面投入有限，但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其技术发展也随之提升，进一步加速了技术的交融。当然这不是没有例外，并不是说一旦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它一定在技术投入方面是少的，有可能国家政府非常重视。

中国在 1980 年至 2020 年间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逐步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融，这一过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范式与借鉴。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觉得类似于中国的经济交融会继续成为一个趋势，会继续发生。例如，非洲一些国家目前已表现出较高的增长潜力，若能长期保持，将可能重演类似的“交融”过程。整个非洲大陆的年增速应该为 7%，这是接下来 30—40 年间我的预判。

另外一个发展的趋势是军事力量的重新分布 (disperse)。过去的军事力量是高度集中的。在 19 至 20 世纪，世界超级军事强国逐渐集中并体现为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力量也在不断崛起，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整体国家实力的崛起也带来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它的经济基础也赋能了军事力量的加强。这让我们可以窥见接下来的世界可能发生军事力量的变化。

在过去超过两个世纪，1750—2000 年这个阶段，实际上是西方世界主导了全球的经济、政治和金融。英国是 19 世纪的霸权国家、超级大国，曾不止一次侵略中国，包括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这是 19 世纪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二战之后，这种主导或者说领导从英国转到了美国，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超级大国。

在那之后，一直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末，美国这几十年都是世界上霸权的超级大国，所以美国一直认为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可以延续到 21 世纪。当时的它是很有信心的。当然，时至今日，它仍然是 21 世纪的大国，但是你不能说它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现在的世界正慢慢从过去的少数国家力量集中、主导世界逐渐演变成多极世界（multiplicity）。

例如中国的崛起、亚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都重塑了世界格局，在政治格局上，这样的世界是一种多极化的世界。美国现在还在努力地保持自己对地缘政治的绝对主导，竭尽全力地在维持这种地位，但效果欠佳。在贸易战中，中国的崛起也再次彰显了中国的实力。美国也慢慢意识到它所谓主导力量也好，超级大国的力量也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了。由此，国际格局正由力量集中走向多极化，而这种新格局缺乏历史先例，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下一个重塑当代世界的变化是生态的变化。我们处在面临三大生态危机的时代，而这三大生态危机归根结底离不开全球经济规模性的增长。全球经济在过去 200 年的迅速扩张，导致了多重生态危机。

第一个是人为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目前正在加速和恶化，接下来这个世纪都会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影响，例如气候变化正在加速，极端气候、极端灾害和自然灾害频率都会增加。

第二个生态危机是生态圈，即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的变化。现在生态体系的变化，导致了雨林、湿地系统、河流系统、海洋生态的很大压力，甚至是崩塌。所以这种生态体系的失衡会影响环境，而且会影响全球的食物安全。

第三个危机是塑料、石化化学品和化学物的污染。像杀虫剂、农药当中含有的化学成分与塑料正在渗透到水源、土壤、食物供应链、海洋当中。这三大生态危机是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它们会在接下来的 25 年以及接下来的整个世纪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重塑全球的经济。

第四个主要的全球变化领域是数字革命。过去半个世纪，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深刻变革。这不仅涉及硬件，包括半导体、微处理器，以及构成计算、人工智能和数字系统的物理部件，也推动了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及其他众多领域的技术应用。

所有的技术突破都在不断地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仅仅体现在计算和数字互联领域, 它实际上可以改变所有科学领域、改变科学的组织架构、改变我们创新的方法, 对我们使用的材料科学带来深远的影响, 包括医疗科学、制药等。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能源系统及其设计, 并改变各行各业的生产流程。

这些革命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变革, 且变革的速度还在持续加快。神经网络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这使得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技术变革是极具颠覆性的, 它会颠覆我们的生产流程, 同时也会被军事化, 改变财富的分配和我们的经济结构, 同时也让就业市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教育体系也随之变化, 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因此, 整个技术层面的颠覆非常深刻地与其他领域密切相关, 包括地缘政治还有经济的融合, 所以它是变革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最后一个重塑世界的重要因素是人口。自 1800 年以来, 全球总人口由约 9 亿增加至近 80 亿, 人口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同时在这段时间, 全球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整个社会的中位数年龄, 不管在哪个国家, 都在快速增长, 包括中国、美国、欧洲, 中位数的年龄大概从 40 多岁增加到了 50 多岁。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则依旧保持着高生育率和快速增长。

全球人口的增长趋势也发生了变化, 因为人口已经到达了顶峰。以中国为例,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开始下降了, 中国的人口高峰大概是 14 亿, 很有可能大概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在 10 亿左右。同时非洲的人口将会持续快速增长, 如今非洲是 14 亿人口, 基于我们合理的预测, 非洲的人口大概在本世纪中会达到 25 亿, 到 21 世纪末人口可能达到 37 亿、38 亿, 届时非洲将会贡献全球 40% 的人口——1950 年, 他们仅占全球人口的 7%。另外一个现象是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共存。在中国也是这样, 中位数的年龄在不断增长, 退休年龄也将会持续地被推迟。

全球人口在城市地区的分布也是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 1800 年左右, 全球 95% 的人口都居住在农村地区, 而到今天大概 40% 甚至 45%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近 60% 的人口是生活在城市的。未来, 城市人口将会继续增加, 大概会占全球人口的 70% 乃至 80%。我预计, 大概到 21 世纪后半叶, 这个比例将会实现。

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生态危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 都在不断重塑我们今天的世界, 而且是以非常激进的方式在重塑, 因此治理的挑战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应对这些变化, 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而这个议题是异常复杂的一个议题。

可持续发展是应对全球挑战的核心路径

在我看来，要应对这些危机，我们必须要有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全球社会都应该共同去推进一种更好的方法来达成经济的繁荣、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意味着社会中所有的群体、所有的地区都能够从发展中获益。环境方面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要应对这个生态危机，或者让生态危机得到控制。另外，全球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地缘政治的目标都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以共享利益为导向，并且获得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和平发展。在我看来，这些应该成为我们全球公共政策的共同目标，在未来几十年都是如此。

这点在我们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已经有所表述，包括也有一些气候的协议、生物多样性的协议以及全球范围之内号召停止化学污染的协议等。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整合了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地缘政治的各种抱负，而这应该成为我们全球目标的一个核心、可持续发展以及诸多国际之间的协议。以上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好的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度过这个转型期。

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可持续发展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也就意味着世界的各个国家是可以共享经济繁荣的，而且我们达成这种共同繁荣的方式，也能够兼顾环境的保护，而不是要以环境为代价。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整合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我们需要深刻地转型，需要让我们的经济、各行各业进行转型，改变他们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变化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三个领域特别重要。

第一个是在能源领域。我们必须要从一个高碳排放全球能源体系向低碳排放全球能源体系转型。第二个是农业。我们必须要从低生产力以及粗放型的农业发展，也就是从大量使用土地、低效使用土地的模式转型成高效、集约型的农业模式，尽量利用少的耕种土地。第三个是城市。大部分人会生活在城市，因此城市的建设应该是生态可持续的，这意味着污染水平比较低，公共健康能够得到保障，水和卫生都能够得到保障等。

所以我们在上述领域都需要重要的技术变革。只有实现这些转型，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我可以简短地说，我们还没有达成任何一个目标，因为全球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而目前我们的全球合作水平非常低——特别是在贫穷国家的投资，在上述这些领域非常少。我们要实现的技术转型挑战重重，这些技术转型将成为我们当今的一个重要障碍。

中国是所有这些大型经济体中，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做得最好的。中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经济发展方面有自己的路径，但是在过去这 40 多年快速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也看到这种发

展也带来了大量的污染，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非常高。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已经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且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以及经济规划中重要的一个要素。因此，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多是用低碳的技术以及太阳能、风能、水电、核电等等，所有这些新能源都能帮助中国脱离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粗放型、高碳排放的方式，包括在农业方面。中国也在改变自己的城市环境，更多使用电动车、使用数字的城市经济发展。可以说，这也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生活、通勤以及工作方式。

当然，还有很多亟待完成的工作，但中国正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稳健地前行。另外，中国在绿色和数字技术方面的生产力非常高，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绿色以及数字技术全球重要的供应国，我们相信在接下来的 20 多年，这点将会更加明显，成为中国出口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会不断增长。中国将会不断帮助全球各国去实现能源和农业的转型，同时也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城市设计。

上述所有的变化和复杂的过程都需要大量的规划和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 (policy coordination) 。

要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

最后我想讲两点：第一，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努力包括了不同区域之间高度地方的协调，其中一种协调也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协同，也就是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协同。我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在接下来的 25 年会带来变革式的影响。

另外，东南亚国家，包括柬埔寨、印尼等，都保持着跟中国密切的经济往来，而且是有结构性的链接——这不仅仅是一种东盟国家内部之间经济结构性的链接，也是东盟和中国之间经济结构性的链接。我觉得这会给区域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区域间的这些合作。非盟这种区域间的合作组织，也是希望通过非盟来促进非洲大陆这些国家之间的链接或者协同。

所以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深度协同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推动低碳的能源系统，也应当是一个多国的系统。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举措叫做“全球能源互联” (Global Energy Interconnection)，有一个组织是全球能源合作的协调组织，通过这样的举措，在实际机制的层面促进区域之间在能源方面的协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也提供了很好的方法。

第二，不仅区域间要实现合作，在全球层面也要加强合作。我们需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是强大的组织，目前的联合国受到了削弱，不管是预算还是经济，因为有些国家可能不交会费，或者其他原因使它本身资金支持有限。

另外，安理会的初衷和使命是维持世界和平，但现在有点力不能及。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都有一票否决权，而美国滥用这一权力的行为，使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时候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我们希望不仅要保持世界和平——这是联合国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期待联合国在许多其他层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我们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不仅关乎和平，还涉及众多其他全球性挑战，这些问题都需要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我们现在毫无疑问身处一个深度变革、高度压力又充满机遇的时代。这个时代拥有技术的突破、应用与交汇，同时也充满冲突与混沌。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为全人类的未来找到一条共同而有效的路径。实现和平、减少冲突、达成合作，才能够让世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IPP 动态

(2025 年 6—9 月)

【重要动态】

◆ IPP 获续聘“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

近期，外交部再次向 IPP 颁发牌匾，确定 IPP 为 2025—2027 年“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这是 IPP 自 2022 年以来第二次被确定为“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2022 年 4 月，IPP 首次获聘“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

◆ 郑永年教授参加“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6 月 17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主办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职能部门、相关研究单位负责同志，全国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郑永年教授受邀参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 郑永年教授出席香港特首政策组内部研讨会

7 月 10 日，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受邀出席香港特首政策组内部研讨会，与该组组长黄元山，副组长王春新、欧阳力等香港特区政府政策智囊，就中美关系、粤港澳大湾区的内部统一大市场建设等议题展开政策分析与研讨。

◆ IPP 举行第二季度党支部党员大会

7 月 22 日，IPP 党支部召开第二季度党员大会，学校党委副书记麦均洪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严格按照组织程序，经无记名投票全票通过接收戴明洁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麦均洪代表学校党委对戴明洁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并作寄语。学校党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及 IPP 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活动。

◆ IPP 加入粤港澳大湾区国资国企智库委员会

8 月 22 日，粤港澳大湾区国资国企智库委员会第 7 期沙龙活动在广州成功举办。会议举行了湾区智库委员会首批扩围仪式。IPP 受邀参加本次活动并加入湾区智库委员会，担任理事单位。IPP 执行院长郭海代表 IPP 参加扩围仪式，并以“转型中的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为题作主旨演讲。

◆ 第十二届 IPP 国际会议成功召开

8 月 23 日，以“重塑现代化:中国与全球南方”为主题的第十二届 IPP 国际会议在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个国家的十余位全球知名学者通过跨领域、跨区域、跨文化的深入对话，就全球发展转型、多极化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多元现代化路径等议题凝聚了新的智慧与共识。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发表主旨演讲。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麦均洪、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宣部全国哲社办派员到会支持。

◆ 郑永年受邀参加第十二届北京香山论坛

9 月 17—19 日，第十二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郑永年教授应邀参加“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主题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大国关系走向”主题平行分组会议以及“香山视界·高端对话”的“新兴技术应用与管控活动”分论坛。其间，郑永年教授围绕人工智能对国际安全与秩序的影响、世界秩序的“封建化”趋势、大国关系等话题发表观点。本届论坛主题为“共护国际秩序、共促和平发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100 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及专家学者和各国观察员等 1800 余名嘉宾出席论坛。

【院务·交流】

◆ IPP 赴超级机器人研究院(黄埔)调研

6月11日下午,IPP调研团队郭海、刘金程、蒋余浩等一行7人赴超级机器人研究院(黄埔)进行调研访问,与该院超级机器人研究院(黄埔)执行院长毛爱华教授等就双方合作、举办活动、科技政策建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随后,调研团还赴该院机器人实验室,参观了该院研发的机器人,以及相关人工智能、控制软件等成果。

◆ IPP 赴广东省社科联调研交流

6月12日,IPP调研组成员郭海、刘金程、刘深一行赴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调研,与广东省社科规划办主任、《南方智库专报》主编郑红军等就智库专报、学术期刊、人才制度等业务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认真学习了省社科联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经验。

◆ IPP 赴北大国发院调研交流

7月15日,IPP调研团队郭海、刘金程、刘深一行到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智库中心常务副主任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智库中心副主任王勋进行座谈交流。IPP深入学习了北大国发院在智库建设、人才团队建设、激励机制、跨学科资源整合、智库品牌宣传等领域的先进经验,并就未来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达成共识。

◆ IPP 赴小鹏汇天公司调研交流

7月22日,IPP执行院长郭海、行政主管王焱等一行赴小鹏汇天公司,参观该公司研发的飞行汽车、无人飞行器等前沿成果,并与该公司财务总监戴佳樟等,就小鹏汇天的发展历程、公司的融资与发展、低空经济政策等议题展开交流。双方还就联合举办会议活动、开展低空经济调研等事项达成合作意向。

◆ 郑永年教授在研究院举行学术指导会

7月27日上午,郑永年教授在研究院举行学术指导会。郑永年教授详细分享了他近期关于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并对研究院研究人员的具体研究工作展开指导。研究院全体研究人员参加本次指导会。

◆ IPP 举行全院工作会议

8月3日,IPP举行全院工作会议,研究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莫道明教授就近期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分享,莫道明教授和郑永年教授还对研究院的相关研究工作进行了指导。

◆ 郑永年参加广东省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题会议

8月22日,广东省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第四场专题会议(现代服务业专场)在广州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召开。郑永年教授作为受邀专家,在会上就广东省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问题和瓶颈等议题发言。他建议广东省发展现代服务业必须加强与世界先进的规则、规制对接,做好内部规则统一和衔接,进而以点带面推动大湾区共同大市场建设。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 IPP 国际会议嘉宾赴“小鹏汇天”参访

8月24日,在IPP的组织和陪同下,参加第十二届IPP国际会议的外国嘉宾共同前往广州小鹏汇天公司进行实地参访调研,并与该公司高层和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等机构进行了为期半天的交流研讨。

通过亲身观察中国创新企业的实际运作、中国新经济形态的政策和管理实践等,与会国际嘉宾得以更为深入地体会和理解中国新时代发展的探索实践,进一步丰富全球南方研究田野感知。

◆ IPP 举行全院工作会议

8月29日,研究院在15楼会议室举行全院工作会议。会议对研究院主办的第十二届IPP国际会议的组织流程、后续工作和改进方向等进行了汇总和总结,并对全院下一季度的研究工作进行了讨论和部署。IPP执行院长郭海主持会议,研究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学术活动】

◆ 郑永年教授受邀在莫干山大讲堂作专题报告

6月9日下午，郑永年受邀参加莫干山大讲堂并作专题辅导报告。郑永年围绕“新地缘政治格局下的中国县域现代化”这一主题，以全球视野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秩序与大国关系，深入解读了现代化的内涵，阐释了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并探讨了县域现代化的路径。

◆ 余荔参加科研组织与管理改革学术研讨会

6月14日至15日，“第二届科研组织与管理改革学术研讨会暨科研组织管理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江苏省淮安市召开。IPP研究员余荔受邀参加本次研讨会，并担任分论坛点评人。

◆ 赵巍出席全球汽车产业顶级论坛

6月24—27日，第33届GERPISA全球汽车产业论坛在上海举办。IPP院长助理、研究员赵巍作为本次论坛组委会成员、执委会代表，与主办方代表共同致开幕辞。论坛还邀请多位华南理工大学汽车专家和行业校友与会。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李巍华教授做主旨演讲，华工汽车校友会派出多位行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的行业论坛环节。

◆ “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未来”沙龙成功举行

6月28日，由全球汽车产业研究网络(GERPISA)年度论坛代表团与广东省汽车智能网联发展促进会、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共同主办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未来——新能力、新生态与华南新机遇”主题沙龙在广州市越秀区成功举行。本次活动作为GERPISA国际汽车产业年度论坛上海主论坛的延展，邀请到十余个国家的20余位顶尖汽车产业专家代表团，与多家广州本地汽车行业机构展开深入交流。

◆ 我院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评“优”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公布2022年结题项目的绩效评估结果。由IPP余荔研究员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外来者优势抑或劣势？“双一流”建设高校海归教师科研生产力研究(批准号:71904055)顺利结项，并在结题项目绩效评估会上获评“优”等级。该项目以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综

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探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海归教师科研生产基本规律与影响机制。

◆ IPP外交团队出席第十八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

7月5日至6日，IPP研究员郭海、徐伟钧和陈佳慧在北京参加了第十八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会议期间，他们还到访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及察哈尔学会，与翟崑教授、张建国大使等就区域研究和智库发展进行了交流。

◆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到访IPP

7月18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Richard Yarrow到访我院，并与IPP执行院长郭海等就双方加强研究合作与学术交流进行探讨。Richard Yarrow是美国非政府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的成员。

◆ 李婷副研究员参加中国社会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

7月5—6日，中国社会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在西南财经大学举办，30余位师生现场发言。IPP副研究员李婷参加本次论坛，并就其论文《柔性生产、家庭发展与非正规就业——以康鹭片区日结大神为例》进行了发言。

◆ IPP展开城市更新调研

7月10日至24日，IPP副研究员李婷、助理研究员李明令、助理研究员卢克玲等前往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城中村，开展广东省住建厅城市更新项目专题调研。

◆ 赵巍研究员参加SASE学术年会

7月9日至12日，IPP研究员赵巍前往加拿大蒙特里尔参加社会经济促进协会(SASE)2025年学术年会并作论文发言。他还同时担任三场分论坛主持人。

◆ IPP研究员赴广州多地展开调研

近期，IPP多个课题组成员深入广州一线，就相关研究议题展开基层调研。李婷副研究员赴海珠区、白云区等地开展调研，并参加番禺区时尚产业规划的评审会；戴明洁副研究员先后赴希

音、致景科技、佳都科技、树根互联等企业调研广州产业政策。

◆ 郑永年专著《AI 时代的中国知识重建》出版。

近期，郑永年教授的专著《AI 时代的中国知识重建》在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新书围绕如何在 AI 时代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学术、学科、话语”三大体系以及如何发挥智库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议题展开深入论述。

◆ 李明令研究员主持项目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 202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名单的公示》，IPP 助理研究员李明令主持的“新就业群体参与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研究”项目入选“202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立项名单”。

◆ IPP 举行两场学术沙龙活动

9 月 4 日，IPP 举行 2025 年第一期“学术沙龙”活动，研究助理陈佳慧作了题为《美日韩经济安全合作的趋势和对策》的报告，探讨美日韩三边关系新趋势及其可能对地区格局产生的影响。

9 月 18 日，IPP 举行第二期“学术沙龙”活动，副研究员戴明洁以《隐形垄断与地缘政治化：AI 开源的双重风险及其应对思考》为题作了学术报告。

◆ 赵巍研究员在知名国际学术期刊上刊发两篇论文

近期，IPP 研究员赵巍教授先后在知名国际学术期刊 World Electric Vehicle Journal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发表两篇论文，深入论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关键要素。

◆ 郑永年教授参加国宏大讲堂并做专题讲座

9 月 16 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举办 2025 年第 3 期国宏大讲堂。郑永年教授受邀参会，就“‘十五五’时期中国面临的新地缘政治格局及应对思路”做专题讲座。他在讲座中指出，中美竞争的核心是现代产业体系，并提出中国建设“大科研体系”和“科创特区”等建议。本次活动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主持，100 多位研究人员参与讲座。

研究院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所为中央提供独立决策咨询的国家高端智库,成立于2012年,由华南理工大学知名校友及企业家莫道明先生与华南理工大学共同创办,由国际顶尖政治学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2015年,IPP被中宣部认定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2017年,IPP成功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核心智库”榜单;2022年,IPP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认定为“重点政策研究合作单位”;2025年,IPP被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认定为“中央网信办舆情合作培育单位”。

IPP以决策咨询为“安身之本”,以学术研究为“立命之道”。在郑永年教授的带领下,IPP专注于三大领域的政策研究:大国外交、产业经济及社会治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IPP每年撰写并向相关部门提交高端政策报告百余篇,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成果得到高层重视。

与此同时,IPP大力推动学术出版、国际交流与舆论沟通,与公众和学界保持积极对话,努力向世界讲好公共政策领域的“中国故事”。2021年,IPP与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系列丛书《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前沿》;2022年,IPP又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合作,出版中文公共政策系列丛书。作为研究院的品牌活动,“IPP国际会议”已成功举办十一届,为海内外学者搭建了优质的学术交流平台。

秉持“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开放理念,IPP经过十余年的辛勤耕耘,今天已成长为我国最具政策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的综合型智库之一。



电话: 020-87112324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华南理工大学

官网: <https://ipp.scut.edu.cn/en/>

微信公众号: IPP 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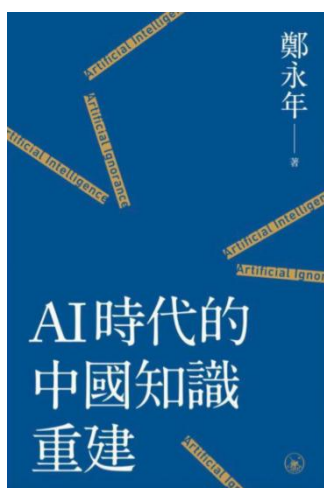


8月23日,以“重塑现代化:中国与全球南方”为主题的第十二届IPP国际会议在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召开。图为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近期,外交部再次向IPP颁发牌匾,确定IPP为2025—2027年“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这是IPP自2022年以来第二次被确定为“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



AI 时代的中国知识重建
作者: 郑永年
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25-6
页数: 320
装帧: 平装
ISBN: 9789620456480



近期,郑永年教授的《AI时代的中国知识重建》在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新书围绕如何在AI时代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学术、学科、话语”三大体系以及如何发挥智库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议题展开深入论述。



联系我们

政策咨询：（8620）87111850 E-mail: liujincheng@ipp.org.cn

公共关系：（8620）87112340 E-mail: media@ipp.org.cn

出版物订阅：（8620）87111856

地址：中国广州天河区五山路381号汽车科技大楼15楼

邮编：510640

官方网站：www.ipp.org.cn

官方微信：IPP-REVIEW

今日头条：IPP评论